

译者的话

约普·登厄伊尔 1919 年出生于一小商家庭。在阿姆斯特丹大学获经济学副博士学位后，当过几年公务员和记者。1949 到 1963 年领导荷兰工党理论机构并担任工党理论刊物的主编。几乎与此同时，即从 1956 到 1962 年当议员。1962 到 1965 年任阿姆斯特丹市政府委员。1965 到 1966 年任经济大臣。此后任工党议会党团团长，逐渐成为工党领袖。1973 到 1977 年任首相。1977 到 1981 年又任工党议会党团团长。1981 到 1982 年任副首相。此后至今任工党议会党团团长。此外，近几年来任社会党国际副主席和欧洲社会党联盟主席。十几年来，在登厄伊尔领导下，工党已成长为荷兰最大的政党。

1978 年秋，为了满足荷兰公众进一步了解登厄伊尔的政治和经济思想的愿望，荷兰佩尔特·巴克出版社首次汇编出版了题为《认识与展望》的登厄伊尔论文集。这些论文虽然只是登厄伊尔从四十年代至今发表的大量著作中的一小部分，但经过选编，确实反映了他思想上许多方面的内容，也反映了西欧社会民主党普遍探讨的问题。因此，我们从中选了十五篇讨论国际政治和经济形势、欧洲保守主义、欧洲自由主义、社会民主党的路线等具有普遍意义的课题的文章，译成中文，供我国读者研究。

在这些论文里，登厄伊尔强调说，西欧“社会主义运动”在五十年代初彻底改变了方针，由此逐步实现了自己的许多“理想”，

例如促进了经济进一步“社会化”，加强了人在生产中的地位，从而赢得了人民的信任。他说，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变得更人道了”，虽然资本主义的力量还很强大，但“资本主义的重要因素已经消失了”。他认为，“民主监督”的重要成果导致了今天“不再有危机”，今天的生产体制已经不是“自由企业的生产方式”，而是“平衡”的生产方式，国家再也不是“资本所有者的工具”，而是“可以被用来领导走向更多的自由和平等的发展进程的机构”。他还说，“经理、高级官员、自由职业者和金融贵族”取代了传统的资本家，但前者并没有构成“阶级”，而是“社会的最高阶层”，“地位”已经代替了财产的作用。显而易见，登厄伊尔上述观点都是典型的社会民主主义观点。的确，战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修改了自己的纲领，从某种意义上适应了战后西欧社会的新变化，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扩大了影响。但是，资本主义社会是否发生了象他所提到的那些根本变化呢？

登厄伊尔自己就说过：“社会主义运动至今确实还没有能够帮助我们的社会改掉一些基本缺陷。”他还谈到，尽管“阶级敌人”不见了，但不能说现代社会是“拉平了的中产阶级社会”，原因在于仍存在的“资本主义力量”不断地使人们“对社会异化”，从而影响了低收入阶层同其他阶层的“统一”，并且致使“实现机会平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他说，因此，福利国家里新问题仍然很多，甚至可以说福利国家不仅没有触犯资产阶级的自由，而且还存在“富裕中的贫困”，现在市场饱和了，能源和原料短缺，1973年后经济大发展终止了，过去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他认为，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国家企业和社会集团的利益进一步交织在一起，导致了生产组织日益庞杂，人们几乎无法认清社会问题的实质，许多社会过程似乎失去了人们的控制，原子技术的发

展所导致的核战争危险就是一个例子。他还说,在国际上,“帝国主义”已经登峰造极,穷国与富国之间的不平等威胁世界的“力量平衡”,苏美之间争夺势力范围和划定经济和军事界限的斗争仍然是占支配地位的因素,而联合国却因权力不足始终未能制止军备竞赛。在国际经济形势方面,登厄伊尔强调说,七十年代初美元贬值和国际货币固定汇率制度的崩溃使世界经济陷入了长期停滞的状况,此外,廉价能源的时代结束了,这一切不仅带来困难,而且宣告了自由经济彻底破产。应当指出的是,登厄伊尔揭露了一些资本主义社会的重大问题,研究他的有关阐述是有意义的。然而,关键问题是如何分析和解决这些问题。在许多论文里登厄伊尔谈了自己的主张。

登厄伊尔宣称,“社会主义运动致力于建立没有阶级矛盾、不再有人剥削人、再也没有一些人由于有财产而统治其他人的现象的社会”,生产要“始终满足人们的需求”,要消除社会上的异化,实现“人类的本质”。他说,应当看到,在工党从一个“工人党”发展成为一个“人民党”和福利国家完善化的过程中,工党不能光搞物质建设,而也应当实现“发展机会平等”和“基本的民主化”,否则就会出现“经济主义”,“社会主义”的墙角会被挖掉。他要求工党党员努力学习理论,说“既要反对教条主义,又要反对机会主义”,要研究福利国家的实质。他说,现在,当务之急是开展反对拥有“权力地位”的人的斗争,而不是开展反对“不劳而获”的人的斗争。他提出,政治家的任务是认清复杂的社会过程和生产过程的实质,发动“普通人、工人、教授、企业家等”开展反对庞杂的生产组织的“革命”,但要抛弃把“阶级斗争”当作“夺取政权的手段”的作法。他主张通过大抓教育来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使他们进入“领导人”阶层,从而促进社会的“民主化”。他主张通过实行“企业改革”和“参与决定制度”来使政府和雇员也

能掌握一部分企业的财产，要监督跨国公司，要通过征税、控制投资、限制利润等办法削弱资本家的地位，还要通过工资政策调节经济。他认为，在“计划和竞争的关系”方面，“计划”是“最主要的手段”，一方面要给自由企业留余地，另一方面要有国家的“协调”，国家要发展技术、服务行业和消费品生产，使经济“缓慢地和有选择性地增长”。他还主张，在国际上必须加强“国际合作”，例如建立类似“欧洲计划局”的各种“共同体系”，要“整顿国际秩序”，例如要靠“第三世界的政治权力”、南北关系和经济增长来制止“两个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在综合考察了欧洲保守党和自由党的特点之后，他还提出，西欧各国的主要政治矛盾是“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自由主义”大大不如“保守主义”，而且四分五裂。他说，战后的“社会主义运动”取胜的原因在于它善于根据不同情况与不同的政治流派建立各种联盟，所以今后还要继续这样做。

总之，登厄伊尔的著作比较全面地阐述了工党的主张，从而有助于我们了解西欧特别是荷兰的一些政治情况，但是，登厄伊尔毕竟是个社会民主党人。他自己也坦率地说过，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国家的许多观点过时了。这在他论述马克思主义的有关文章中尤为突出，因此，读者在阅读登厄伊尔的论文时，应当采取分析的态度。

施 辉 业

目 录

作者说明	1
技术在人人都互不相识的社会里的进步(1947年)	3
作为政治运动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1956年)	9
理论和运动(1956年)	35
明天的世界里的劳动(1956年)	44
基本的民主化(1957年)	62
1959年的马克思主义(1959年)	75
工党新原则纲领里的经济问题——在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之间(1960年)	89
生活的质量(1963年)	98
福利国家的贫困(1965年)	112
社会主义运动和新的社会批判理论(1970年)	122
社会主义和自由企业式生产(1974年)	134
好好读书是创造性的活动(1975年)	153
那种时代一去不复返了(1977年)	164
欧洲市场经济的未来(1978年)	180
展望未来(1978年)	189

作者说明

在1977年荷兰的组阁活动中，关于许多社会问题的讨论很热烈。在范阿赫特内阁^①采取行动之后，人们更加明白了，在组织和领导社会方面，我们面临了具有深刻意义的选择。在国际上，世界经济持续不断的停滞状况和看起来似乎无法解决的失业现象，也都导致人们对我们的社会制度的若干基本方面进行重新认识。

目前正在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这种讨论也是必要的，它的现实意义促使我汇编我在过去的年代里就这些问题所写的文章。汇编的顺序正是这些文章发表的顺序。起初我只想汇编最近几年的几篇文章和几次讲话，但事实很快表明了，今天的问题也是昨天讨论过的问题，虽然所采取的形式有所不同。我从某一个问题的又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当我们正在讨论核电站超离心机工程时，有人提醒我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我就对由社会来控制和管理核能的问题很感兴趣。

因为应当做到知己知彼，选集里也汇编了关于新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各种形式的基督教民主主义的文章。所有这些文章可以被视为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文章。在图书馆委员会成立仪式上的讲话可能有些离题，虽然我希望其内容符合选集的主题。

选集里汇编的文章并不是任意选择的，这种选择主要是由主题决定的。我最充分发挥自己的写作积极性是在1951年集体编写《走向自由之路》^②的时候，但因为该出版物篇幅太大，所以

没有编入选集。选集并不是回忆录，也不是历史著作；在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比选集所反映的要多得多。从内容上看，这些文章中也可能有一个转折。六十年代初以前写的文章的特征是，它们都主张在福利国家结构的范围之内，实行社会主义意义上的改良。从1963年的《生活的质量》起，我的文章更多地主张改造社会结构本身，实现另一种组织形式和重新分配权力。

这些文章是昨天写的，但它们着眼于明天。为了强调这一点，补充了一篇没有发表过的、关于未来社会的政治选择的文章：《展望未来》。

正如所有汇编这类选集的人一样，我也面临了这样的选择，要不要修改和润色这些文章呢？要不要维持原文，从而不可避免地需要说明和解释已经过去了一些情况呢？我选择了后者。我删掉了一些多余的东西，补充了一些脚注。任何一篇文章的内容我都没有改。我希望我当时采取的立场现在仍然有现实意义，尽管这些文章的性质介乎于我同样喜爱的科学的经济论文和政治性的传单之间。

约普·登厄伊尔

1978年8月写于阿姆斯特丹

① 1977到1981年的荷兰内阁。范阿赫特是荷兰基督教民主联盟领导人，他这次组阁没有吸收工党人士参加内阁。——译者

② 荷兰工党1952年通过的纲领。——译者

技术在人人都互不相识 的社会里的进步

(1947年)

所有迹象都表明,在如何防止未来战争威胁方面,我们正在失败。全世界各国人民要求和平的呼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但是各国却都在备战。这些不仅在物质上而且也在心理上的备战活动日夜不停地进行着。几年前还有人宣布要建立“统一的世界”,但现在出现的却不是这样的世界,而是连现存的一些国家也发生了分裂的世界。全世界各国人民曾对联合国寄予希望,但联合国所拥有的权力不够,以致在讨论一些最重要的问题时,人们事实上忽视了这个论坛。军国主义正在全世界猖狂地得到推进。在和平时期武装人员这么多,这是史无前例的。甚至在具有伟大的反军国主义传统的大不列颠和美国,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人也倾向于采用“现实的”解决办法。曾经使德国和日本覆没的普鲁士病开始感染给战胜国(摘自美国原子科学家非常委员会的声明)。

对目前局势的这种描绘太暗淡了吗?它是一项包含着我们早已不感兴趣的、仅供作者们自我欣赏的那种廉价的、耸人听闻的因素的声明吗?然而,发表上述声明的原子科学家非常委员会是由一些责任心很强而又十分谨慎的科学研究人员组成的,他们绝对不会毫无根据地发表影响这么大的见解。另外,这个声

明也得到了美国各个领域的一系列科学家组织的支持。但谁要是
是对科学家们的政治表态还有半点怀疑，那谁就应当搞清楚原子
科学方面的情况。在很短的时间中，原子弹曾引起了很大的
不安。数以百万计的人都已经承认这样的事实，即任何一项技
术发展都有其阴暗面，现在他们突然猛醒了。在很短的一个时
期里，情况似乎是这样的，即由于人们认识到全世界应当为对付
这种可怕的危险而团结起来，人们力图打开通向迄今为止未获
成功的国际合作的大门。然而，这种恐惧已经在一些新的耸人
听闻的事件中消失，不安的心情也由于人们对这么多的危险习
以为常而消失。虽然进行了两年多的努力，但人们在原子能
的使用进行国际控制的道路上，还是没有能够前进一步。因此
世人心中的不安消失了，世人再也不迫切寻求一种解决办法。

或许原子能专家们自己对于这种灾难性的发展趋势并非完
全没有责任。或许他们由于把原子能问题孤立起来了，从而过
多地和过分片面地强调了一点（而这一点却只是一个包括许多
方面的问题的一个方面），所以从一开始就引起了这些问题。在
一个几十年来允许其生产力和技术发明经历灾难性的发展过程
的世界里，不能指望，人们会在这种事态发展中，在一个新的关
键问题上，突然把利润和自身利益置于不顾而达成理智的妥协。
在错误道路上发展了一个多世纪的事情，人们是不可能只用两
年时间就矫正过来的。解决原子弹问题是同解决我们这一代人
所面临的政治与社会不协调的问题分不开的。

现在可以看到的灰心丧气和漠不关心的情绪，其形成的主
要原因在于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为实现所有国家都接受的解决
办法的努力失败了。因为各种提案一再地遭到否决，在普通人当
中也就很自然地产生了这样一种心理：“原子弹的遭遇同裁军和
其他所有美好的理想的遭遇是一样的——事实上只有战争才能

裁军，也只有核战争才能“解决”控制原子弹的问题，但请注意，这种控制只能维持到下次战争爆发之前。这种心理是正在毒化全世界的毒气，只有消除了这种毒气，才存在略有成效地完成任
务的前景。目前，我们在完成这项任务方面却正在失败。

如果拿我们社会控制这一类问题的能力来衡量的话，应该说，发明原子弹是今天最不幸的事情了，其原因在于我们社会出现了所谓“强调经理的作用的趋势”。这种趋势使我们社会的骨架更加不清楚，人人都互不相识，其成员的责任心越来越淡漠。美国的詹姆斯·伯纳姆教授^①在他的题为《经营管理革命》的著名小册子中，分析了这种现象。他尤其认为，现在有这样的现象，即掌握对社会的领导权的不是工人阶级（象社会党人所希望的那样），也不是政治领袖（象自由党人所认为的那样），而是支配生产部门的经理阶级（即组织者）。他把组织者接管权力的现象称为“经营管理革命”，他在1941年出版这本小册子时认为，在所有工业国家里，尤其是在俄国、德国和美国，都在进行这场革命。现在我并不想谈伯纳姆的这些论点以及人们对这些论点的不同意见。然而，他最主要的观点并不是新的东西，至于那些观点的主流，它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当一个人现在对原子问题的事态发展有意见时，他实际上不知道应当向谁提出自己的抗议。

人们习惯于指责“资本主义”，但控制原子能利用研究和原子弹生产的到处都是国家。在这方面美国并不比苏联差。

另一些人会指责“俄国”。但是，苏联并没有发明原子弹，而在表现民族主义方面，各国并不互相让步。

第三种人会说，应受到指责的是“那些制造了原子弹的科学

^① 1902年生，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译者

家”。然而，这些科学家一般都是一些好心的实验能手，他们除了为人类服务之外别无他求。

当前事态发展的特点正是人人都互不相识的这种状况及其影响，即缺少责任心的状况。阻碍问题得到解决的，不是几个唯利是图的无耻之徒，也不是某一个罪恶民族，而是那些神秘莫测和隐匿的制度、组织、办公室和委员会。正是这一点使得局势没有希望了，并使公众寒心了。人们已习惯说，道德觉悟的发展赶不上技术的发展。我们可以说得更具体一些。效率标准处于支配地位的状况、对更大规模的生产和更高利润的追求，以及关于永无停顿的进步的幻想，这一切都把我们拖进了那些不以公民意志为转移的、过着自己生活的庞大组织中去。这种组织是在起作用的，但这种作用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却不得而知了。发明工作在继续，但其目的又是什么呢？组织者作出决定——又是以谁的名义呢？民主变成了一种信仰，一种包治百病的万应灵丹，但有多少人实际上还能对社会施加一点影响呢？那些作出决定的集团，起码是那些认为自己是在推动着自己的组织内部作出决定的集团，都会很自然地陷入孤立。这些集团都有自己的词汇，其成员是通过各自的眼光和动作互相认识的。不论是企业领导人、将军，或者是党的领袖，一概如此。在现阶段里，说出自己看法的平民百姓已变成了有点可笑的稀罕玩艺儿，他的言论成了值得收听的广播内容。在这样的情况下，关于“要么统一世界，要么不要世界”的呼声没有起到使人积极起来，而是使人瘫痪下去的作用。平民百姓可能还可以说出自己的看法，但他们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这毫无用处。

这种灾难性的事态发展只有通过平民百姓、工人、教授或工厂主针对它进行一场革命才能加以制止。在封建时代作出重大决策的也只是少数几个人。但是，那时的决定的意义还没有当

今大企业中随便哪一个企业领导人每天作出的决定更重要。当工业革命使社会结构更严密和人口猛增的时候，争取政治民主的斗争点燃了这样一丝希望，即相互负责的制度将会清除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危险。事实证明，十九世纪孕育的政治民主没能使以后的技术发展和人类的幸福协调一致。由于社会不协调的发展，由于这个社会只寻求蒸汽机和发电机的物质利益而忽视了它们包含的破坏作用，所以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原子能问题只是其中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当蒸汽机的使用使得生产力能够获得很大的提高时，人们的生活水平的确也得到了改善。但人们却没有预防同样是这些生产力引起的危机和失业。当电的应用使人们有可能生活得更加舒适时，人们购置了冰箱和收音机，但人们并没有估计到会出现轰炸机和 V-2 型飞弹。原子能的发展使我们面临着同样的可能性，但这时的情况要比过去严重得多。目前已经出现了世界性的粮食短缺、一盘散沙的欧洲和原子弹。如果我们继续走这条道路，那么要是过去让科学家们去钓鱼，而没有让他们去搞什么原子裂变，现在可能确实会更好一些。

1948年美国用于陆军和海军的支出将达九十亿美元，其中近一亿美元将用来进行对原子及细菌的研究。据估计，马歇尔计划范围内的对欧援助在几年中将每年需要五十亿美元。只有唤醒世界人民已经麻木了的责任心，才能使这种荒唐的局面得以改观。科学研究人员们应该懂得，如果他们把自己的工作成果泄露给第三者，如果他们对这些成就所造成的后果不闻不问，那就是在犯罪。诚然，荷兰有一个议会外交委员会——然而，如果成立一个议会科学委员会，后者的重要性将会远远超过前者。在本文开头引用的那一段话中，谈到了全世界人民对和平的向往。如果各国人民不要求对有关人类文明的继续生存拥有参与

决定权,那么制止目前的事态发展也就毫无希望了。政治家们的任务是,应当想方设法消除各种组织的隐匿状态,并重新认识那些目前正在秘密地起作用的各种力量的面目和责任。认识到自己对人类文明肩负责任的政治家的任务是,要使人民深刻地领会这样的真理,即如果不事先保证国际力量的平衡和对原子能发展的公开监督,那么,连为和平而发展原子能的工作,也是毫无意义的。

如果我们不把原子弹问题的事态发展当作对我们的警告(它警告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并且只有当每个人都承担这种责任时,我们才能成功,才能对事态发展施加影响),我们就不会很好地完成任务。

作为政治运动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

(1956年)

政治领域里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作为政治运动的自由主义似乎已告结束。在西欧国家，战后进行的最初选举给曾经盛极一时的各国自由党残余带来了极为可怜的结果。看来，本世纪初开始衰落的自由主义政治运动正在走向谷底。自由主义的追随者们一部分在保守党里，一部分在社会党里找到了栖身之地。

第二次大战结束十年之后，如果说局势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那至少也可以说发生了变迁。如果说自由主义已经复活，那就太夸张了，更确切的说法应当是，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福利国家制度的广泛反抗使自由主义政党和派别感到自己可以起重要作用和获得新的机会。1952年，美国共和党人获胜；1951年和1955年，英国保守党人获胜；从1950年至1955年期间，在大多数欧洲国家选举中出现了向“右”转的局面。提一提这些事实就足以说明上述反抗。

自由党领导人觉察到年轻人有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想，从而鼓起了勇气。英国自由党主席说：“二十年前还是社会主义堡垒的机构现在已悄悄地改换了招牌，成了热情的自由主义的堡垒。如果说，1945年社会党人的胜利是由二十年代初的知识分

子作好准备的，那么可能还需要十五年的时间才能使自由党的反革命达到顶峰。”

“右”这个词需要加引号这件事表明了局势的复杂性。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是“左”的，两者在历史上和意识形态上有着不可否认的联系。在现实政治中，它们在比利时组成了联合政府，在法国组成了联合阵线，共同开展围绕学校问题的斗争。与此相反，我们从荷兰的情况出发，在围绕如何组织社会的重大斗争中，习惯于把自由主义划为“右翼”。在我国国内，有人致力于实现一次突破，以便使政党结构更加纯洁，这些人通常认为，自由民主人民党^①有可能成为集中保守派力量的政党的前身，它将发现自己的对立面是工党，该党集中了进步的力量。奥特律师^②于1954年指出，应当把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对立视为目前政治发展中的主要因素。他当时就已经看到了类似的情况吗？然而，教派党却喋喋不休地指出，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差别是微乎其微的，是还不够繁荣的社会里的枝节现象，两者将来会完全合二为一的；这种说法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应该预料到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融为一体的事态发展吗？还是说，正相反，将发生的是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互相渗透吗？或者说，是否有第三种可能性，即政治自由主义在政治领域里发挥自己的、多少是独立的作用呢？这种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有可能巩固自己吗？

目前，对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关系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的正是这些问题，本文将对此作进一步论述。

自由主义是在保守主义慢慢失势和社会主义运动开始兴起

^① 战后，荷兰的政党基本上分三大类：工党、共产党等被称为“左翼党”；天主教人民党、基督教历史同盟和反对革命党被称为“教派党”；自由民主人民党被称为“右翼党”。——译者

^② 荷兰自由民主人民党在五、六十年代的领袖。——译者

的时期达到其政治发展的顶峰的。目前，在民主体制内，在政治形势中占主导地位的还是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因此，如果不清楚地了解保守主义的表现形式，那么确定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地位便不大可能了。下面将详细地谈论这一点，因为我觉得，象社会党人多次所做的那样，即过于肤浅地把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等同起来，是使政治局面模糊不清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我认为，由于我象班宁^①一样指出了自由主义思想内容的不同意义，我现在可以不再描述作为政治运动的自由主义。试图下定义没有多大前途，我宁愿试图通过描写自由党的发展及其地位，为对作为政治力量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进行客观的比较铺平道路。我选择的这个方案还意味着，我几乎无法研究作为普遍思想原则的自由主义的政治意义。（象弗·沃特金斯^②那样的作者把现代自由主义说成是“西方文明的世俗形式”，他们认为，自由主义是一个普遍的思想原则。）

一般说来，自由党是在自由主义原则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很长时间之后才产生的。在若干情况下，自由党是为了反对保守党的行动而产生的，而保守党尽管其组织形式很松散，但它是在对自由主义的思想影响的反抗中建立起来的。

十九世纪中叶，自由主义达到了高潮。自由主义当时发动的自由民阶级的解放斗争现在仍然是我国政治民主的基础。自

^① 班宁：《今天的社会运动的背景和原则》。

^② 弗·沃特金斯：《西方的政治传统——对现代自由主义的发展的研究》，1948年英文版。

由主义通过伟大的立法工作制定了成文的宪法，并为个人普选权和议会选举奠定了基础，它创造了部长负责制，并建立了政府和议会互相制约的体制，这个体制作为“议会体制”仍然是我国现代民主的骨架。

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了一些困难，日益觉悟的、信仰各种宗教和持有各种人生观的派别要求发展自己文化。假如自由党没有能力解决这些困难和面对这些要求确定思想自由的内容，那么自由党便会开始失去力量和重要性。最近半个世纪的事态发展表明，自由主义进一步被夹在社会主义和正在复活的保守主义中间。在英国，否认工人阶级的贫困的做法导致了工党的出现，在荷兰和若干南欧国家，对思想自由的否认促进了教派党的兴起。

自由主义失去了它作为自由民阶级解放运动的历史意义。尽管如此，随着社会结构的复杂化和工人阶级觉悟的提高，自由党明显的阶级性质和行为与自由派主张解放老百姓各阶层的思想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成为自由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

应当根据这个背景去理解自由党的一再分裂。自从自由联盟于1885年建立以来，荷兰已经至少有了七个自由派别。主张普遍自由的思想 and 由一种代表机构来保证资产阶级中间阶层利益的制度的矛盾日益严重，自由主义内部的对立同这种情况是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对立不可避免地导致自由主义派别内部产生各种不同倾向，即一方面有亲保守派的倾向，而另一方面也有亲社会主义理想的倾向。

除了社会发展所导致的矛盾外，还可以看到由意识形态决定的矛盾。早在上个世纪初，自由主义就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严格的理性主义，它很有生气，可以说是后来的激进派的先驱；另一种更重视历史，更多地依靠民族和民族主义感情，它包括非

理性主义派别,并且后来几乎完全同化于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的政党一直是典型的、内部分为几翼的政党,在这点上它们肯定不亚于今天的教派党,其原因之一是自由主义政党的自由思想基础。分裂和合并的过程仍在继续。

纵观目前自由主义的政治组成,便可以概括地发现下列情况。^①

英国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国家和自由主义的古国。但由于选举制度的作用,在议会政治中,自由主义者已被击退,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小组。自由党拚命试图在保守党和工党之间强调自己的本质。但是,使自由党有自己意义的不是它在议会中的地位,而是它在思想工作方面的活动。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里,它在这方面的贡献是不小的。自由党关于英国工业状况的报告和在战争中发表的关于卫生保健工作的报告都起了有意义的作用。这里无须详细介绍象贝弗里奇^②这样的人为就业政策和社会保险所做工作的价值了。但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自由党很少主动提出自己的倡议。大部分自由党人赞同主张扩大企业主自由的保守党政策。克莱门特·戴维斯对此提出了这样的抱怨:“奇怪的是,政府和它的追随者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在解决全国问题时,实际上走的是彻头彻尾的自由党道路。”同保守派相反,英国自由党顽固地维护自由贸易的立场,并且毫无疑问比工党和保守党更重视国际合作,只是在这两点上,英国自由党表现了自己的面目。

^① 自由党在政治力量的格局中地位变化很大。1978年,在英国和联邦德国,自由党都同社会主义者合作,虽然背景不同。这个事实非常说明上述说法,而同本文阐述的关系相矛盾。

^② 1879年生,英国著名经济学家。1942年制订了英国的社会保险计划,该计划构成了1946年生效的英国社会保险法的基础。——译者

在德国，实际上从来没有真正的自由党。甚至可以说，德国的不幸在于，德国的自由主义一向只局限于少数人和从未产生过重大影响。事实还表明，由于德国既没有展开又没有克服自由主义关于要从个人出发和面向个人自由的思想，对德国的社会主义来说，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也是很困难的。德国的自由主义是由于家长制作风的顽固性而未能深入人心的，路德教加强了而不是削弱了这种家长制作风。德·席德尔在描写十九世纪德国自由主义的失败时写道：“在德国，由于自由思想同民族统一的思想紧密地相结合了，而自由派又认为自己是民族统一的卫士，所以自由资产阶级甚至更加顽固地认为，自己是‘总等级’，因此可以垄断政治权力。这就是德国自由主义的特征，在意大利也有这种形式的特征。此外，在德国，自由主义的民主化仅仅部分地或者说完全没有获得实现。在更早的阶段，德国的自由主义未能扩展到其他社会阶层和控制新兴的无产阶级。在后来的阶段，它也未能使自己转变成一个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德国自由主义从未能完全适应广泛民主的现实。”^①

因此，经过艰难曲折之后，自由民主党于1948年才成立，这是不足为奇的。这个自由党内有一个强大的、实质上是反自由主义的侧翼，这同样是不足为奇的。显而易见，在战后的德国，保守派把自由党当作了避风港。

在法国，自由主义的基础是强大的理性主义传统。因此，法国的激进党现在分裂成为两个互相激烈争斗的进步集团和保守集团；只有共同的狂热的反教权主义才能使他们统一起来。激进党在自由主义如此受到非议的条件下还能继续生存，这只能

^① 德·席德尔：《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自由主义和现代社会的结构变化》，在1955年2月举行的国际历史讨论会上的报告。——译者

由这个事实来解释；同英国不同，法国的选举制度使自由主义派别仍然有活动余地。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与我国战前的自由民联盟非常相似的法国民主社会抵抗联盟很有生命力。此外，在1956年法国大选时出现的进步激进集团同社会党人的联合和富尔集团同保守党的联合，也都在很大程度上是法国自由主义的状况的特征。同时这不只是法国一个国家的自由主义的特征。

由于瑞士这个可爱的国家在精神和政治方面富有忍让精神，所以就可以从这个国家的变化很好地估计欧洲政治关系的变化。瑞士现在还有一个真正的十九世纪式的保守党。我们可以看到瑞士自由党用十九世纪的风格同天主教保守人民党进行斗争，特别在各州的政治舞台上更是如此。在瑞士广泛出现的这种情况实际上对其他国家也有效；在国家范围内和工业中心，社会主义和保守党之间的斗争占支配地位；在省和地方范围内，保守党和自由党之间的斗争占支配地位。

同欧洲国家相反，美国的封建保守传统要少得多，在那里，“自由主义”成了致力于使宪法所赋予的形式上的自由和平等获得实际内容的运动的名称。这个运动反对的是实际的保守主义。然而，这种保守主义与其说同欧洲的保守主义一致，倒不如说同自由资本主义更加一致。年轻的、强调原则的保守主义是在战争^①之中和战争之后产生的，它将对未来具有重要意义，它既反对自由主义，也反对实际的保守主义。

欧洲自由主义处于矛盾的状态，我国的自由民主人民党也有这种状态，这个党仍然被视为我国当前的自由主义的典型体现。在社会经济方面，自由民主人民党通常和教派党保守派的观点是一致的，但是它顽固地拒绝——从理论上讲是正确的——

^① 指第二次世界大战。——译者

赞成保守主义，而力求根据自己的自由思想在荷兰政治生活中建立起独立的地位。自由党企图在国际范围内提出自由政策，这也证明了自由党要努力在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保持自己的特色。1947年，十九个国家的代表在牛津成立了自由党国际（名誉主席是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这种国际性的组织建设可以说是社会党国际组织建设的翻版。自由党国际每年组织代表大会、暑期学校、专家会议等等。同迄今为止自由党国际的成果相比，社会党国际可以说是政治力量和影响的典范，社会党人可以为此聊以自慰。

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

上面的概述已经表明，在保守党的实际政策面前，今天的自由主义对当代的重大问题提不出自己的东西。但是，把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混为一谈，那对自由主义也是不公正的，并且不利于深入了解政治关系。

我在这里使用保守主义这个概念，并不是指正式词义上的保守主义，即在政治上致力于维持现状的运动。尽管保守主义概念常常是根据这种含义使用的，但这样做还是从政治上抽掉了这个概念的意义，因为现状每天都在变化。

有人拥护以保守和进步的矛盾为基础的两党制；有人正确地向他们指出了，根据政治激情的差别来建立政党是没有意义的。尽管政治家性格方面的差别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但却有充分理由坚持说，从以上意义上讲，每个党里都有进步派和保守派。在一些地方，维护停滞状态的力量已发展成为一种政治力量，这样保守主义就表现出来了。我认为，在这些地方，几乎总是存在一种比保持现状更为严重的事情。换言之，进步思想绝非

仅仅是对变革的要求，它也受关于另一种社会的某种概念的支配。保守主义也同样地从一个社会观念得到支持和营养，这个社会观念几乎总是含糊的，但并不因此而不那么起作用。下面就对保守主义的这股暗流作一评价，以便更好地弄清从前是保守主义的对立、而现在常常混同于保守主义的自由主义的面目。

现在已经很清楚，无论在政治思想上还是在政治实践中，都很难给保守主义潮流下定义。这是因为，保守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传统主义和无意识地坚持已经形成的现状，保守主义潮流的特点是它从来不愿发表过激的言论。如果寻找保守主义潮流的公式，那就会找到许多为维护中世纪等级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的理论和学说。

中世纪末，贸易和交通开始发展起来，自然经济的束缚被突破，公民们开始提高觉悟。这时，不仅仅自由主义从一开始就要同拥有很广泛的理论和哲学基础的天主教社会结构进行斗争，而且，谋求自由的公民们也遇到了维护封建结构的力量的反抗。事实表明，即便在没有这种理论和哲学基础的情况下，这种力量从公元几世纪来直至今天一直是一种重要的政治力量。

与自由主义自始至终坚持自由思想的情况不同，保守主义只提出了有限的自由。自由权利是专制君主的特权，甚至在没有人相信上帝派遣圣君的今天，仍然存在着把自由看成是一种恩赐的观点。

当自由主义内部出现平等思想（它同自由思想有距离）时，保守主义依然坚持等级制度的思想。即使在认为等级制度是上帝安排的信念已经消失时，保守主义思想仍然象中世纪那样坚持等级和地位，并原则上坚持主人和奴隶的关系。

同自由主义的理性主义相反，保守主义是面向历史的，但其含义不在于保守主义是根据历史上的形成过程来解释社会现

象，而在于它承认历史上已经形成的东西。保守思想是一种静止的思想，它认为凡是历史上成长起来的东西就是正确的，它还激烈反对合理的社会结构、乌托邦和世俗的对幸福的欲望。

保守主义思想有其非理性主义的根源，而且还一再受到非理性主义流派(德国的浪漫主义)的培育，它认为直觉高于思维。它的人生观相当悲观，它无论如何不相信人有可能提高自己的道德品质，而相信人和集团的情欲是不可改变的。

同自由主义相反，保守主义在政府与公民的关系中总是充分强调国家的重要性。面对关于社会契约和人民主权的理论(伯克^①、德迈特尔^②、斯塔尔的理论)，它为国家本身的权利而奋斗。

由于保守主义把强调国家权力、培育非理性主义因素和把广大人民群众置于从属地位(这是保守主义喜欢等级和寡头制度造成的)结合起来，它格外适合于表达民族主义感情。同总是面向国际和主张自由贸易的自由主义相反，保守主义是主张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在自由主义同民族主义有着紧密联系的地方，比如在德国和意大利，这种结合使自由主义灭亡了。

如果说，自由主义扎根于市民之中，它作为一个运动体现了正在兴起的市民阶级的解放斗争，那么保守主义就是扎根于农村和土地所有制关系之中，保守主义的环境的特点是对农民生活的崇拜和对大城市的憎恨。

在现代工业化之前的时代，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的对立大大削弱了，但出发点和社会基础方面的差别在当代仍起作用。通过把今天的保守主义和现代自由主义的特点进行比较，可以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

① 1729—1779年，英国政治家，反对法国大革命。——译者

② 1753—1821年，法国哲学家，反对启蒙运动。——译者

现代保守主义的特点是：

一、保守主义原则上坚持教会和国家的统一，尽管这种统一没有多大内容，无论在英国保守党那里还是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都是这样。在政治实践中，保守党人在全国范围内接受了自由党的国家中立原则。在地区一级和象瑞士这样的小国家，关于国家和教会统一的原则常常还会导致激烈的冲突。

二、保守主义带有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特点。只要国际一体化会导致超国家的权力机构和限制国家主权，它就要到处反对这种国际一体化。

三、保守主义维护垄断资本主义和不相信作为调节原则的竞争的作用，而同意私人企业里的等级制度。它以保护个人自由为理由维护私有制。

四、保守主义只有在国家应当保障最低生活水平这一点上才承认国家的管理作用，而不同意让国家承担重新分配国民收入的任务。它拒绝以“平等”为目标，主张以“法律”为目标。这种“法律”应当考虑到因为存在着不平等，社会才能被维持和被推动前进的。

五、保守主义用法制国家的公式反对福利国家，而且把福利国家同对人的“国有化”^①和最终将导致专制政治的国家统治等同起来。

六、保守主义从根本上反对普选权，尽管在法西斯主义的阴影下，它在实际生活中不会对此谈得太多。它把普选权看作是一个学究的理性主义的错误，是“理性的独裁”。这可以用厄特利1955年1月发表在英国杂志《观察家》上的、关于英国形势的文章加以解释。他写道，“几乎所有关于当前的政治的学术论文都

① 意即人人都失去了自由，而完全受国家控制。——译者

• 认为，我们目前的困难都来自十八世纪的发展和政治理论中的理性主义传统；而这里最普遍的命题认为，少数服从多数的制度不断地和日益严重地倾向于导致独裁或破产，或两者兼而有之。”沃尔特·李普曼^①也在他最后的著作《大众哲学》中把矛头指向了他称之为雅各宾派的民主概念的制度、少数服从多数的制度和人民权力。

七、保守主义激起和实现反对计划性和社会结构的非理性主义感情，它指责这种计划性和社会结构是理性主义的方案。诺埃尔·安南在1955年的美国杂志《政治季刊》第三期里说：“从事政治的人是在有传统的家庭和环境里成长起来的人，因为在这种家庭和环境里世代都懂得政治涉及到什么；粗野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不适合从事政治，因为只有完全不懂政治的人才会相信这些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的方案和改革社会的方式是会成功的。”

这种保守主义可能是革命的，正如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可能是革命的一样。当保守主义采取革命立场时，我们习惯于称它是反动的，但是，把这里所说的保守主义流派看成是典型的不革命的是不正确的。这些流派一般都采取了反对革命的立场，但最近在保守主义的内部也有革命倾向的例子（例如戴高乐派）。至于保守主义同法西斯主义有种种联系的问题，这里就不必进一步加以阐述了。

作为同这种保守主义相对立的现代自由主义的立场可以描述如下：

一、自由主义在保持距离的情况下观察民主原则在社会主义运动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和国际领域里的作用。例如，可以

^① 美国记者。——译者

看看荷兰自由民主人民党对职工发言权和印度尼西亚问题的态度。

二、自由主义仍然把个人自由放在首位，但从原则上接受福利国家。但在实践中，自由主义是挖福利国家的墙角的，特别是当自由主义是社会党政府的反对派时，情况更是如此。

三、自由主义接受政府为保障就业机会和社会安全实行的干预。但是，自由主义坚持采用利润动机作为刺激社会的因素，它也没有其他方案来代替依赖个人利润动机的竞争性社会的心理。

四、自由主义借口反对危害消费自由来反对使私人支出进一步减少而政府支出进一步增多。

五、自由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愿意创造机会平等，尽管在这一点上社会主义运动的观点要明确得多。

六、自由主义反对干涉财产关系的结构，也就是说，它反对限制继承权和社会化。它越来越强调分散财产，这就是自由主义为解决社会问题所提出的典型解决办法。自由主义一般主张改进现存机构，反对建立新的机构。

七、自由主义愿意进行国际合作，但是对国际秩序和建立有权力调整秩序的国际机构持怀疑态度。

如果对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特征的这种描写是正确的话，那么从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从历史还是从实际政策来说，把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混为一谈是错误的。同样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由主义已经远远脱离了它在政治形成过程初期强调的自由与平等。也许英国自由党原则纲领的前言可以最好地说明自由主义对这个问题的立场：“自由党的目的是建立一个自由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里，每个公民都将有自由、财产和安全，任何人都不会由于贫困、无知和失业而依赖别人。它最关心的是

个人的权利和发展机会，在所有方面它都把自由摆在首位。”自由、财产和安全取代了“自由、平等和博爱”。平等让位于财产，博爱让位于安全。奋发向上的公民的进取思想不得不为拥有财产的公民的安全保障让位。

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

因此，从原则上说，即使在今天的关系中，在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仍然存在着一道鸿沟。在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中，有没有一致性的因素呢？人们原来以为，工人阶级的解放可以导致两者互相接近。如果工人解放后成为名符其实的公民，那么公民阶级解放运动和工人阶级解放运动还会由什么东西互相分割开来呢？在这方面，人们也就进一步指出了自由社会主义和社会自由主义之间，在社会经济政策，特别是在就业政策和总政策方面所存在的一致性的程度。

我认为，在现代自由主义和现代社会主义之间可以指出三个方面的区别，这些区别的根源在于两者的出发点不同，这反映在政治实践之中。

一、自由主义的理性主义的和非历史的思想方法，使自由主义看不到作为福利国家基础的调节和政府领导所具有的根本和长远的意义。简单地说，自由主义对于福利国家已经加强的干预是这样看的：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它没有看到在从工业化之前到工业高度发达的时期里，国家必须通过帮助、照顾和调节来干预社会，以便使处于无力和无权地位的无产阶级免遭灭亡。特别是社会主义纠正了这个错误，只是由于国家更繁荣了，现在才有条件来限制国家的任务和让个人或集团在自愿的基础上照料自己。例如，天主教教徒科林·克拉

克主张根据这种精神取消国家的社会福利部门，大力限制政府开支和改造福利国家，使国家的任务与十九世纪国家所行使的职能没有根本区别。它的基本思路是：一个有广泛权力的领导和社会生活的管理制度都是临时性的，因此应当回到自己管理自己的社会。虽然自由主义政党的纲领和宣传再也不提“无形的手”^①和自由贸易，但是对国家的怀疑和对个人和集团自然的自我调节的信念却依然存在。

相反，社会主义认为，有意识的调节和政府领导是一项积极的社会任务，这个任务不是临时性的，而是必要和可取的，可以在技术水平很高和规模很大的经济中实现个人和集团的物质自由。社会主义运动在历史上同十九世纪无产阶级的绝望处境有联系，因此，社会主义运动的思想不管它变化多大，总是选择了在受民主监督的政府领导下控制和调节社会力量的办法作为自己的出发点。

有许多例子说明这一点，其中的一个是，在议会里，就政府税收政策、公共企业组织、农田价格管理、工资政策、对贷款的监督和解雇法方面的调整任务，工党和自由民主人民党之间一直存在矛盾。不过，围绕每一项调整措施的争论似乎只涉及到调整的幅度，而事实上争论的当然也是政府应有多少权限和如何制定管理社会的规章制度的问题。尽管如此，争论中的不同立场常常反映出各方对政府的任务和无人问津的社会力量将产生的结果所持的观点完全不相同，换句话说，它们反映出社会观方面的分歧。

在这方面，那些估计在国家日益繁荣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和

^① 自由主义者过去都不承认经济是有自己规律的，他们只主张自由竞争，说经济是由“无形的手”控制的，反对对经济进行任何干预。——译者

自由主义会融为一体的人是没有根据的。这是因为对计划和领导的需要并不首先取决于繁荣的程度，而取决于社会经济生活比例失调的程度，比例失调的情况无论在繁荣程度较高还是在繁荣程度较低的情况下，都是可能发生的。美国 1929 年的经济危机的后果甚至可以使人们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繁荣水平较高和缺乏政府计划的情况下，比例失调比起在繁荣水平较低的情况下与其说更轻一些，不如说更严重一些。

二、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对于社会的评价是有分歧的。在反对中世纪教会和等级制国家的专制组织的过程中，自由主义从来没有找到实现法国革命天才地提出的博爱口号的道路。自由主义虽然经历了许多种变化，但它始终以个人为出发点，而反对把社会作为思想的出发点。与此相反，社会主义是对十八和十九世纪的个人主义的反应。马克思关于人本身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异化的提法已经包含着对富有生气的社会团体和人与人之间的真正关系的消失的抗议。社会主义运动的整个历史是渴望建立一个新社会的历史，空想社会主义者们的实验也已经体现这种愿望。

在实际政策上，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在出发点和性质上的这个差别，特别表现在分配和文化问题上。

在分配问题上，社会主义运动从平等的思想出发提出了团结一致的思想，从而不断地同自由主义的贵族个人主义立场发生冲突。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把资产阶级看成是“包括所有公民的等级”，因而是唯一有权代表人民利益的阶级。从理论上讲，自由党相当明显地朝民主自由主义方向发展，这种民主自由主义表示愿意平等地为一切集团进行斗争，但在政治实践中，自由党无法抹煞表明它们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烙印。

从议会政治上说，这个矛盾近年来表现在围绕工资政策、非

平均化和税收政策的斗争中。(奇怪的是,泽尔斯特拉教授 1948 年的论文里的第五个观点主张把经济政策方面的分配问题作为“基督教经济”的基础。如果能够知道这个基督教的经济分配理论到底是自由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或者干脆是保守主义的,那将是很有趣的。)

在文化问题上,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出发点的分歧特别表现在社会主义很愿意为了建设社会和参加社会文化机构而承担动员、鼓动和领导的任务;相反,自由主义通常推行一种旨在拖延建设社会的政策,这两种态度实际上也往往具有程度差别的性质,但归根结底根源于对社会和公民的意义不同评价。

自由民主人民党在处理涉及到宗教界的问题时,通常仍然从国家不干预宗教,即自由国家的立场出发;这种自由国家不妨碍任何人,只要他不危害公共秩序;同时这种自由国家对任何人也不给予真正的鼓励,即使这种鼓励对某一个宗教流派会有意义。对任何一种“值得尊重的”信念的尊敬同这样的认识联系在一起:光从信念来说,谁也不比谁更好或更有价值。在这一点上自由民主人民党和工党没有分歧。但是,由于自由党人的出发点是个人主义的,他们反对承认,一种道德信念的具体化本身就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积极因素,从而应当得到政府的支持。工党在这里反对国家不干预宗教,并且承认政府应当有意识地支持把维护自己成员的宗教利益作为宗旨的私人组织。

三、现代自由主义是以思想自由的原则为基础的。这种思想自由具有一种人生观的性质,并且可以追溯到自由主义形成时的决定性要素:理性主义、启蒙和理性信念。自由思想的概念是从反对受教会束缚的思想的斗争中产生的,在自由主义的环境里仍然起着主导作用。自由民主人民党的科学机构特尔德尔基金会的章程规定,它的任务是根据自由思想原则进行研究。人

们谈到自由的选兵团、自由的中产阶级和自由的政党，在自由这个概念中包含着现代自由主义的精神气质。这种自由的具体化是把自由作为政府和社会思想特定的自由标准放在首位。这种自由观把“普遍性”作为鉴别忍耐和宽容的标准来使用。“普遍性”的内容是由大家都接受的文明价值构成的。

致力于实现突破的社会主义运动原则上拒绝把在宗教信仰和人生观之间走钢丝的自由思想作为组建政党的基础。它承认说，对于持不同人生观的各个派别来说，自由的内容必然有差别；从这点出发，这种社会主义在信仰自由方面，根据具体情况寻求能尽可能使各个派别根据自己对自由的理解实现自由的形式。致力于实现突破的社会主义在这方面尊重以宗教和意识形态信念为出发点的派别，认为它们是文化的力量源泉；它还认为，基于宗教和人生观信念的社会主义观点的推动作用使社会主义的内容更加丰富，发展人民文化的可能性更多了。

因此，这种实现突破的原则的内容不同于而且也超过了自由党关于不同宗教人生观的信徒在党内都有自己地位的公式。自由民主人民党在我国所表现出来的现代自由主义坚持宗教信仰是私事的观点，这是无可非议的。现代自由主义承认，在政治判断中，宗教有发言权，但是自由思想的原则，在这里即自由党的自由原则，被置于大大超过宗教原则的地位。

由此不可避免地要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自由民主人民党原则上不可能接受象工党那样的包括人生观工作小组在内的联盟结构^①。奥特曾正确地对要求自由民主人民党建立这样的组织结构的年轻自由党人说，他们对自由主义的实质理解得太少了。

^① 联盟结构的含义不是说工党是由或多或少是独立的团体组成的(大约百分之十的党员参加一个团体的工作小组)，而是说这些团体的活动被视为党内的共同负责的意见和决议形成过程的一个条件。

现代社会主义和现代自由主义在建党原则上的分歧最后当然会导致实际政治中的不同行动。从“自由思想”的原则出发，自由民主人民党主张办公共学校，与工党的主张正好相反；自由民主人民党从个人自由原则出发，多次表示，它不会容忍其他人生观派别那样理解的自由。因此，自由主义在围绕学校问题的斗争中所施加的压力并不是对自由原则的偏离，而是把自由思想概念绝对化的后果，这种绝对化在我国和其他国家都有表现。

由于它的联盟结构，现代社会主义当然最终又要面对各教派党对宗教自由的解释，人们应当指责这些教派党是有步骤地在谋求使自己受宗教束缚的自由观在政府政策中占支配地位。这样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战后，工党在议会中讨论宗教自由问题时，有时会同自由民主人民党一起反对教派党（例如在斯托克曼关于宗教工作、人权方面的帮助、神父训令以及教会的广播权的提案问题上），有时却也会同教派党一起反对自由民主人民党（例如在火葬法、星期日法的问题上），或原则上总是单独地既反对自由民主人民党，又反对教会党。它的出发点与自由民主人民党和教会党是不同的。

流派和政党

前几节先后对保守主义及自由主义，对自由主义及社会主义进行了对比。这种对比难免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质。如果寻找这里描写的流派在西欧和我国现存政党中的表现形式，就会更加感到这种对比是意识形态上的对比。各党的状况比以上所述的情况要复杂和多样化得多。就社会主义运动来说，这种说法的有效性可能最小。因为至少在党的名称方面，社会主义政党还是相当容易被辨认出来的。但就各国社会主义政党来说，

也同样在思想、组织和纲领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自由主义的状况又复杂得多了。有些人长期抱怨说，思想上的自由主义者在一个国家里常常分成不同的党派，而名义上的自由党在欧洲大陆上却常常已变成保守主义的堡垒。这些名义上的自由党在实际政治中又采取很不同的行动，而这些差别又如此大，以致相比之下社会党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显得十分微小。

然而，在确定哪些党属于保守主义政党时，人们似乎陷入混乱。在英国、斯堪的纳维亚和瑞士，存在着名义上的保守党。人们对它们有一定的把握，它们至少有这样一个优点，即不伪装进步。此外，保守党人存在于许多典型的利益集团（农民、中产阶级、店员、反纳税者的集团）、民族主义的和区域性的派别（例如保皇派、独立派、地区利益维护者的派别）中。在教派党里，保守派多半同自由派和有社会主义思想倾向的人结成了反常的联盟。

鉴于教派党在荷兰政治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必须说明一下它们在上述西欧各大政治派别的斗争中所处的地位。首先要说明一下，这种解释一定很笼统，因为不管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情况下，各党之间的影响和联系都极为复杂和多样化。特别是在篇幅不大的文章里，不可能正确解释罗马天主教和卡尔文派对作为政治运动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深刻影响。此外，使情况更复杂的是，不管是罗马天主教党人还是卡尔文派党人，都在教派党里工作，但又自称为独立的政治运动。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罗马天主教和卡尔文派毫无疑问主要是影响、加强和维护了保守主义的。其结果是，新时代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这些宗教力量源泉之外发展起来的，有时甚至是和它们相对抗的。虽然在整个十九世纪都有宗教自由主义（德·拉芒

内^①)的痕迹,但封建主义的垮台、立宪民主制的产生和工人阶级的初步解放大部分都没有受到基督教社会学说的影响。只是在最近几十年,同社会主义的严重对立才使罗马天主教和卡尔文派部分地摆脱了保守主义思想的束缚。在我国工党内形成的新社会主义是这种对立的产物。这也意味着,我们不能把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同突破^②和党的建设及组织互相割裂开来看。

至今仍有三种思想在互相比量。这三种思想是维护旧秩序的保守思想、主张公民领导下的政治自由的自由主义思想和主张建立具有宗教多元论色彩的福利国家的社会主义思想。我国的教派党在这三种思想之间徘徊,法国的民主共和党、德国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和意大利的基督教民主党也是这样的。在如何组织社会的斗争中,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的矛盾是当代的基本矛盾,不管保守主义是否带有自由主义色彩。

人们并不需要到韦尔特尔、杜因斯泰、格布兰迪、格莱特松那样的“极端分子”那里去找到真正的保守主义提法,只要看一看罗默在战后不久发表的关于新宪法的出版物,或者只要去享受范德芬教授的《现代主义思想的阴影》(1951年)描写得很美的怀古主义,我们也可以找到真正的保守主义言论。^③认为保守主义是正在死亡的一代人的事情和保守主义不可能再发展自己令人精神振奋的意识形态的想法同样是错误的。在这里我首先

① 1782—1854年,法国神学家,最初主张把教会建成“人民的教会”,后来却主张政教分开,最后自己退出了教会。——译者

② 指工党通过修改战前的一些原则和通过同其他党(保守党、自由党)的合作而在政治上实现的“突破”,即执政或参政。——译者

③ 这里提到的人物都是荷兰五十年代的保守势力代表人物。格布兰迪是1939年的荷兰司法部长,从1940年到1945年是荷兰流亡政府的首相。罗默是天主教政治家,多次任荷兰政府大臣。——译者

想到的不是新法西斯主义潮流——在这里谈到的保守主义是从事反极权主义范围内的思想和行动的保守主义，尽管从定义上来说，保守主义是在反极权主义范围的边缘领域活动的。为了了解意识形态色彩很强烈的保守主义，人们可能联想到象穆勒、范登布鲁克、容格尔和德国的冯·萨洛蒙那样的保守作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在德国所起的作用。我们现在把他们列入纳粹之前的作家的范畴，但假如希特勒没有成功，又该怎么办呢？尽管是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美国在这方面的发展不是毫无意义的。正如已经谈到的那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出现了一个思想倾向非常保守的流派。在年轻的保守党人中有著名作家柯克（1953年发表《从伯克到桑塔亚纳^①的保守主义思想》，1954年发表《保守派的纲领》）和维里克（《再论保守主义——反对革命的革命》）；我们绝不能把这些人同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右翼的实际政治上的保守主义混为一谈。柯克是意识形态上的保守派，他主要推崇伯克的思想，他的观点十分接近欧洲新自由派的思想。“真正的保守主义的原则利益和旧式自由民主现在开始融为一体。在过去十年里，而且可能在今后很长的时间里，保守党人将维护立宪民主，以保障传统和秩序；聪明的民主党人将欢迎保守派的哲学，并把它作为可以用来反对新秩序计划者的唯一的思想体系。”维里克却力图实现“米尔^②和伯克在美国的结合，也就是自由派的自由和保守主义的历史连续性的结合”。他既激烈反对诺兰的资本主义的保守主义，又激烈反对“自由党人”的庸俗的左翼进步主义。如果把年轻的保守主义的范围划得广一些，象德鲁克尔这样的人物也可以算作该派的成员。这

① 1863年生，美国哲学家。——译者

② 1806—1873年，英国古典经济学家。——译者

种年轻的保守主义的特点是它拥有一种政治和社会理论，这种理论把贵族制度、社会和谐、社会意识、宗教、社会安定、尊严、秩序和传统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而把谋求平等、进步的信念、少数服从多数的制度、个人主义和实利主义视为敌人。换句话说，这种年轻的保守主义想用保持自由主义的许多成就的办法来消除现代主义的阴暗面。这种理论中包含着形形色色听起来不让人反感的東西，当然，也可以说，接近我们的保守派的言论中也包含这些东西。

但是，不管保守主义如何软硬兼施，不管它用什么样的政策伪装自己，在为解决当代重大问题（对付共产主义的问题、对觉醒的亚洲的态度、欧洲社会和政治的一体化、对核能的控制以及自动化）的斗争中，保守主义一般导致分裂，对共产主义运动有利，它如果能保持不行动，那就最好了。

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斗争中，不管现代自由主义是作为独立的党行动，还是同保守主义联合，它是进行有效斗争的障碍。这一点很明显地表现在我国的关系中，本文最后一节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

工党、自由民主人民党和党的建设

在叙述了现代自由主义同保守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之后，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具体地说，工党在什么情况下应当把自由民主人民党视为盟友或敌人？从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对立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工党在政治斗争中仍然会常常同自由民主人民党站在一起反对教派党。自由民主人民党越是不忘本，这种情况就越是会出现。在实现机会平等这个重大问题上，工党可以更多地寄希望于自由党的觉醒，而不是寄希望于

教派党的觉醒，因为只有经过艰难困苦的过程，后者才会摆脱保守的等级制度思想。与此相反，教派党（前面已经说过，从基本上讲它们受到保守的基本结构的约束）已经深深受到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而且特别是在战后，曾表现为党内有保守派和进步派的奇特的对立统一。此外，教派党同重要的工人阶层的联系使它们失去了阶级性和代表某种利益的性质，自由民主人民党却有不断滑向这种性质的危险。

但从原则上讲，工党对同自由民主人民党和同教派党进行通常意义上的合作是一视同仁的。工党只能把自由民主人民党和教派党的建党原则都视为这些党必然具有两重性的一个原因，并把这些原则视为明确政治关系的障碍。因此，从自由民主人民党目前的结构来看，必须对该党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能否起一种独立的、有益的作用的问题给以否定的回答。

以上所述清楚地说明，根据我们的见解，由于自由民主人民党目前的形式，它既不能参加进步派的中心，又不能参加保守派的中心。由于它具有半意识形态的性质，它也不能取得中心地位。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自由民主人民党在战后的政治中表现得象一个找不到自己地位的党，即它有时追随右派，有时向工党讨好。几年来，自由民主人民党兜售了关于自己是第三种力量的思想，这是想取得中心地位的投机取巧的思想。这种投机的基础是一种天真的想法，这种想法以为，反对革命党和基督教历史同盟^①的领导人不会认识到他们同自由派的联盟必然会带有保守色彩的。这种联盟会使所有关于反对进步力量的突破的言论失去力量。

^① 这两个党是荷兰战后主要教派党之一，在七十年代后期已和天主教民主人民党一起联合组成了天主教民主联盟。——译者

自从关于第三种力量的想法破产以来，自由民主人民党便试图通过强调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对立来壮大自己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它很喜欢扮演思想自由的特别保护者的奇怪角色。与此同时，它也否认，自由民主人民党和工党对宗教信仰和党的政治选择之间的关系的认识是不同的。这种观点显然受到了各个教派党的一致赞同，因为它们始终说，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具有“同样的根源”。使奥特教授和《忠诚报》^①联合在一起的东西是，通过维护这个观点可以阻止各党实现走向更纯洁的国际关系的突破——这正是保守主义的利益所在。从这个角度看，天主教人民党和天主教民族党的合并不是韦尔特尔先生的投降，而是一位英明的保守政治家采取明智政策的举动。韦尔特尔懂得，教派党的强有力地位，对我国保守主义最为有利。向右的突破，即保守中心的建立，将会使人们的注意力从无数次要问题转到主要问题上，因而促成工党的突破。

无论自由主义在哪方面有什么不同的打算，它不可避免地在加强保守主义，这是当代自由主义的必然命运。

以上的对作为政治运动的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比较谈到了很大的差别。看来，在荷兰的政治领域里也只能如此。

让我们把结论归纳一下。如果社会主义运动能理解不断变化的社会关系，继续发展进步的人民运动，那就很难理解自由党还能起什么有益的作用。自由党人中的激进分子大多数都在已更新的社会主义运动中找到了地位。事实上，在（欧洲）大陆上，各个自由党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大企业主、大农场主和中产阶级的利益集团活动的。它们几乎在任何地方都没能同解放了的工人阶级建立联系。这些政党由此所具有的明显的阶级性使它

① 荷兰反映教派党观点的报纸。——译者

们越来越保守，虽然自由党人对此并不愉快——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国自由民主人民党的思想自由阻止了真正的保守中心的产生，这种中心本来会促进党际关系进一步纯洁。出现这种中心的前景还没有达到令人激动的程度。政治中的宗教思想是一种顽固的现象，不管它是产生于正统教会、天主教还是自由教会的思想。工党可以通过正确对待自由主义的立场加快思想和社会的成熟过程，这个成熟过程必将导致更纯洁的党际关系和更大的政治力量的建立。鉴于国际上和我国内部的力量关系，自由主义的发展意味着保守主义力量的加强，自由主义的复活意味着保守主义的复活。

理论和运动

(1956年)

社会党的理论还存在吗？是存在的。我的确知道许多书柜里堆满了这类书刊。在社会党国际的周报里，在以《社会主义理论》为题的相当可观的目录里，列举了许多题目。然而，这方面的情况却同战后荷兰的文艺创作完全相同，各类选集源源不断地出版，过去有意义的著作（我们称之为“经典著作”）出版了精致的再版本，偶尔才有一些胆怯地进行新尝试的作品。

战争刚结束时，在我国还有这样或那样的东西是值得记录下来的。当时发表的有：霍夫斯特拉的《社会党的税收政策》、范登特姆贝尔的《作为社会主义阶段的秩序建设》以及吕尔斯的《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思想》。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社会观进行补充或革新的研究报告，它们显然是法西斯占领荷兰的时代的产物。自那时起，除了一些小册子和文章论述了突破原则的意义以外，这个领域令人吃惊地保持了平静。《社会主义与民主》^①编辑部在一系列详细的文章和谈话中论述了社会主义的状况，其中也不可避免地谈到了关于社会党人的社会观的若干问题。但是，我的印象是，我们自己阵营对这种做法的支持不如政治反对派对它的兴趣那么强烈，这种印象对吗？

从国际上看，社会党理论很少受到重视也是十分突出的事情。我们可以点出一些研究变化了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党对此的

态度的出版物——这些出版物并没有发表什么新鲜的东西。朱尔·英克^②的巨著《对抗》(1952年)的确是对社会主义思想内容提出新提法的最重要尝试。尽管这部书是十年劳动的结晶,是内容十分广泛的,是由一位可以权威地论述技术革命对社会影响的工程师兼政治家写成的,但它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1952年出版的《新费边文集》更是如此。这些文章反映了比较年轻的英国工党知识分子的能力,然而,这些文章如此不统一,又如此深刻地沉溺于社会各个部分的事态发展,以致作者们没能实现该文集的标题所表达的目标。

这一论断使我们触及到了战后社会党人精神生产的特征。关于社会各部分的许多重要作品出版了,但并没有一次成功的进行新综合的尝试,完全没有什么东西能在影响方面与二十、三十年代亨利·德曼^③用自己的文章所掀起的那一运动相比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观方面的最重要文献不是来自社会主义运动,至少是在社会主义运动范围之外产生的。我这时想到的是伯纳姆的《经营管理革命》(1943年)和法国学者福拉斯蒂埃的《机械化与福利》(1947年)和《二十世纪的伟大期望》(1949年)。这两位作者提出的一些想法至今仍支配我们的理论。可以说,他们的看法的积极内容已被纳入社会主义思想之中,但也不能否认,社会主义运动的社会理论看来已经达到了一个饱和的阶段,或者说,它表现得再也没有多少动力了。

同时,就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继续发展这一点而言,应当保留一个重要意见。在这个领域里,前几年发生了巨大的发展。在这方面,尤其可以想到,除了计划以外,还对竞争和价格机制作

① 荷兰工党理论刊物。——译者

② 1894年生,法国社会党人,1947至1950年任内务部长。——译者

③ 比利时社会党领导人和理论家。——译者

出了新的评价。早在大战以前，拥护社会主义的作者就开始研究价值机制在完全集体化了的国民经济制度中的作用。尤其是认为即使在生产资料全面国有化的情况下，市场机制也可以发挥实质性作用的思想，为重新评价价值机制和竞争留下了余地。在这一方面，我们可以想到这些社会主义经济学家：英国的米德（1949年发表了《计划和价值机制》和《自由社会主义的解决办法》）、法国的阿莱（他提出了计划竞争的公式）以及德国的席勒（1955年发表了《社会主义和竞争》）。就这方面来说，在我国可以提出廷贝根^①、德容和哈尔托赫。

用席勒当作指导方针使用的公式可以对这些社会主义经济学家的立场进行最好的总结。这个公式是：“要根据最大的可能性进行竞争，要根据最迫切的需要制订计划。”显然，对竞争的这一重新评价，以及这些经济学家为缓和秩序和自由之间的对立所作出的努力，都对这一领域里的社会主义社会观是有深刻意义的。从理论上讲，应当说，承认竞争的意义与赞成某种所有制关系毫无联系。尽管如此，人们还是难以否认，上述社会主义理论家把至今仍被许多社会主义者视为一种过渡性制度的混合性经济理想化了，这种混合体系里，除了强大的私营部门以外，还有公共部门，既有政府领导又有企业主自由。虽然《走向自由之路》这个社会主义纲领所强调的毫无疑问是加强对私人企业主的控制和可以掌握投资的财产的问题，但是该纲领的观点在许多方面都和这些经济学家的观点相接近。

因此，的确可以说，社会主义者的经济见解经历了一种演变过程。但至今几乎还谈不上把这些观点整理成一个完整的社会理论。这种忽视理论的情况应归咎于什么呢？十年来，工党理

^① 1891年生，荷兰著名计量经济学家。——译者

论讨论成效甚微就意味着社会主义思想贫乏吗？社会主义运动能够在没有一个象以前那样为它服务的有效理论机构的情况下继续蓬蓬勃勃地发展吗？对这些问题，我将在下面力争作一简明扼要的回答。现在看来，特别是投身于社会主义运动的许多人，不可否认地经常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体会到，战后社会主义理论研究效率低是一种缺陷。从这种情况来看，这些理论探讨也许不是没有实际用处的。

在费尔维夫人为《纪念阿尔巴尔达^①》所写的那篇至今仍然值得一读的文章中，她论述了三代荷兰社会主义理论家之间的区别。她把库佩尔和维鲍特^②称为第一代社会主义理论家在荷兰的代表人物。这一代人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保障，向社会主义的发展是一种必然性。第二代在理论上已经脆弱得多了，但还没有丧失对社会主义将会实现的信心，尽管这种信心与其说是一个科学信念，倒不如说它已变成了传统方面的事情。社会主义与其说是一种信念，倒不如说是一种信条。第三代已对社会主义失去了信心，这一代没有共同的社会观，一般说来，他们对这种社会观也缺乏兴趣。他们强调分析和评价事实，不管什么样的人的分析或评价，他们都会接受。费尔维夫人认为，这是一种贡献，也是一种不足。因为，若没有始终连贯的概括的社会理论，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终究不会成功。如果把第三代理论家看成是失去信心的人的话，那么，人们就应当把战后产生的那一代理论家看成是沉默派。因为，这代理论家的最大特征就是

① 1877年生，荷兰政治家。1925至1939年为荷兰工党的前身社会民主工人党的领袖。1939至1945年在荷兰流亡政府里任水利大臣。1945年任国务委员。——译者

② 1864年生，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维鲍特(1859—1935年)，荷兰工党的前身社会民主工人党的领导人之一。——译者

社会主义社会观的问题在他们脑海中已无声无息地消失了。他们不仅对此缺乏兴趣，而且不再把没有社会主义社会观的情况看成是一个问题。在这一点上，人们不应当对诸如“新道路”和“政治社”这些社会主义青年组织中有时还出现的一些情况感到大惊小怪。一种神秘的规律决定着有组织的政治性青年运动往往都是深受过去的激进主义的影响的。我也不认为，可以把对一般性的文化社会学论文和理论的确切关心与对长期以来人们认识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兴趣等同起来。对一种正在流行的社会观的需要消失了，这种现象和一系列的现象是联系在一起的。

第一，同战前的情况相比，现在的社会主义运动更加普遍地参加了建设性的社会政治活动，这种活动不仅使官方机构和企业界中的，而且也使社会机构中的大量社会主义者都意识到必须执行具体的任务，同时，战后脑力劳动的神经病般的发展速度肯定使得人们深入考虑社会观的需要减少了。

第二，人们从心底里讨厌同意识形态——用冠冕堂皇的词语表达的上层建筑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相似的一切东西。特别是在荷兰，突出地面向意识形态的德国哲学、文学以及科学也都对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在战后，荷兰的社会主义运动同英国的经验主义建立了联系，使自己从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人们把实验置于理论之上，总之，把实验置于想超越分析并同意识形态相似的理论之上。

第三，社会矛盾缓和了，许多过去的理想实现了，这一切都对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的需要产生了致命的作用，因为社会发展的理论正是必须在人们改变社会关系的愿望中找到动力的。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段时期所产生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实现，对社会发展这个概念的理解也变得更加灵活了。

从其实质来看，象中央计划局或者皇家国家计划局这样的

机构，都在相当程度上是关于社会主义秩序的思想的产物，以致人们几乎无法想象这些机构会有不符合社会主义方向的职能。相反，无数的经济学家、法学家和社会学家虽在这种机构里工作，但却没有感到与社会主义理想有任何特殊关系，尽管他们都投工党的票，而且因为他们的父亲都是工人或者也往往都是工党党员。社会主义的具体事务化与这一点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关于突破的思想意味着党抛弃作为人生观的社会主义，它因而肯定使作为社会观的社会主义再也不能发展。在社会主义历史中，作为意识形态的社会观正是在它同人生观和世界观这些因素联系在一起时发展得最快。在荷兰，关于突破的思想是工党与一切进步人士合作的政治基础，这种思想已产生了很广泛的影响，以致人们对一种比较完整的社会观的需要必然变得不那么迫切了。

费尔维夫人认为，社会主义理论家的任务就是要向社会民主主义提供一个有着未来目标的社会观。在工党存在的十年^①中发生的事实已经表明，这种看法既有正确之处，也有不正确之处。沉默的一代人对任何意识形态的反感代表着具有重大价值的成就。在不迷信福利国家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情况下干一些实际工作，对能完成小小的任务的幸福感到深为满足，这是德军占领荷兰的时代的产物；它为我们的社会的顺利发展和我国社会主义运动的作用比任何乌托邦展示了更加美好的前景。的确，没有理由对缺乏理论推理感到有些担心。人们更有理由感到高兴，对理论推理的需要已经变得越来越少。人们甚至可以指出，西欧社会主义运动最紧迫的问题始终是，要清算对完成具

^① 荷兰工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但其前身社会民主工人党早在十九世纪末成立。——译者

体改革工作构成障碍的那些众多理论和乌托邦思想。

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接受现实和开展具体的改革工作都不能没有长远规划，费尔维夫人这一点说得有理。现在，战后恢复工作的紧张状态正在消失，社会福利国家的轮廓日益明确，社会主义运动因实现了自己的理想而面临着消失的危险，特别是因为下面这几个原因，上述说法就更有道理了。尼布尔^①根据工党的失败，对社会主义运动的这种状况作了如下描述：“工党政府最伟大的成就是奠定了福利国家的基础，这些基础已成为任何现代国家社会公正的标准，当保守的反对派重新执政时，保守派并没有触犯这些标准。事实上，工党和美国的民主党一样，由于社会政策方面的成就，自己为自己在竞选中的成功奠定了基础。这些成就却削弱了构成工党政权的基础的社会积怨，并助长了关于公正和保障的感觉，这就瓦解了工党自己的政治支柱。这已成为西方民主国家一切进步政党的讽刺般的命运。”（摘自1955年6月20日的英文出版物《新领袖》）

人们可以把这位曾经信仰过社会主义的美国进步思想家的这种见解——几乎所有善良的美国人对欧洲社会主义的看法都是如此——看作是过于夸张的。不能否认，现在所有的西欧社会党正在讨论尼布尔提出的问题。瑞典社会民主党最主要的理论家维格福斯在瑞典社会主义青年代表大会上的演讲中是这样阐述了这一问题的，“福利国家由于解放了无产阶级，已使社会主义变得没有基础。社会党人挖掉了自己的墙角吗？”从这一点上看，荷兰工党处于什么样的特殊地位，也就一目了然了。荷兰工党非常有意识地完成了从工人党转变为人民党的跃进。按照工党关于应当集中进步力量的概念，这一跃进仿佛对自己所面临

^① 1892年生，美国基督教神学家。——译者

的这一问题已做出了回答。人们可以幸运地断定，所有西欧社会党都在程度不同地经历着由工人党转变为人民党，即由一个意识形态上受束缚的党转变为一个在人生观上是开放性的党的过程。

但是，这样一个党除了要求四十小时工作周、一大笔养老金及每个家庭有一辆汽车、一台电视机和一个电冰箱之外，现在也需要内容更为丰富的前景。正是这种思想导致了英国工党最近的一次代表大会决定制订新的社会纲领。在荷兰，也是这种思想促使人们提出了《走向自由之路》的主张。按照这种主张，人们至少已开始指明社会主义运动应当走的道路。这条道路远远超出了现存福利国家概念的界限。这些福利国家概念的内容有以下几点：一、关于机会平等的无阶级社会的理想——但这不是说要从一开始就实现财产方面的平等，而是说要培养每个人，使他在社会上能完成最合乎他的性格和才干以及意志和愿望的工作，这样就深刻得多；二、基本的民主化，也就是说，在承担责任和作出决定方面，首先要消除巨大的鸿沟，因为它至今仍使很小的领导阶层脱离广大人民群众；三、为了使人们在工作中和下班后都能自我负责，要在社会和文化领域里，克服我们的合作能力远远落后于我们的技术能力的状况，要有目的地掌握技术发展；四、为了永远消除战争危险，要为实现各国人民生活条件上的平等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合作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

在围绕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局势所进行的讨论中，人们已经指出，在战后，工党主要是根据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的年代里起草的纲领的核心内容开展工作的。虽然不能完全相信这种说法，然而，还是存在着这样一个事实：1945年以后，西欧的社会主义运动——当它还没有参加政府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已经实现了许多有关生活保障和社会主义公正的理想，

这些理想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使它赢得了千百万人民的信赖。如果社会主义运动今后要重新领导社会的发展，就必须更进一步弄清社会结构中许多新的问题——经理、工会运动的地位、政党的地位、个人的状况。也就是说，对“理论”的更大的需要将再度出现。

社会主义运动必须不断地致力于实现实际结构改革工作同生气勃勃的社会观的统一以及承认客观事实同乌托邦主义的统一。随着局势的变化，着重点也必须有所不同。我认为，在过去的十年中，在这一问题上，荷兰工党可以说自己干得很好。假如社会主义不想遭到许多人现在已经充满嫉妒地和充满仇恨地为它设想的僵化厄运，那么，随着社会矛盾的不断缓和，随着社会公正的理想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承认，随着政党更加制度化并在民主社会里承担规定得更准确的_一任务，社会主义应该更多地想到它是来源于乌托邦的梦想和期望的世界的。

明天的世界里的劳动^①

(1956年)

在我们的时代，常常可以听到人们抱怨说，乌托邦思想所剩无几了，曾经是我们以前几代人的精神力量，即对另一种更美好的世界的信仰的鼓舞力量，现在不复存在了。所以，应让我立即告诉期待我象一个魔术师那样在一个早上就把一个乌托邦，即一个大家梦寐以求的理想国变出来的人们，我将不得不使他们失望。我不是先知，也不是占星家，但是更有意义的是，我深信，在明天的世界里，人类将必须用类似的方法为和平与自由、为找到私人与社会之间的正确的平衡和为自然与文化的和谐而斗争。在我看来，没有理由丧失勇气或失去信心。相反，使世界适宜于人类居住和使人们可以生活得有意义，这是每一代人的任务。我坚信，无论我们怎么制定计划和应用巧妙的手段，我们的下一代人将用自己的方法来理解这项任务，而且我祝愿他们能够获得幸福。

我把这一点摆在前面，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我们不必考虑在我们周围的世界所发生的迅速变化和明天的世界将展示的轮廓。情况幸亏是这样的，即在我们好多年把注意力几乎完全放在战后恢复工作上之后，我国现在已经醒悟了，并觉悟到了我们在我们社会的技术和科学基础方面所达到的革命形势。我知道，一旦有人说出第二次工业革命这个术语，总是有人做好了准备

把手放在其肩膀上，以使他镇静下来，并雄辩地说，新的发明、自动化和原子能，仅仅是进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这些只涉及到逐步的变化。是的，只要花足够的时间猜谜语，那么就可以把每种新现象简单归结为一种非本质的区别。但是，对英国考文垂市的斯坦达德厂里由于生产过程的自动化而被宣布解雇的二千六百名工人来说，这到底是一种演变还是一种革命，目前没有什么区别，他们暂时流落街头。

的确发生了一场技术革命。就好象事情发生在昨天那样，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战争快要结束的那晚上，英国电台报道说：“一枚新型的、至今还不知道其结构的炸弹，被投到日本广岛，并炸毁了该城市。”在战争年代，起决定性作用的秘密武器得到了发展，这种情况曾象一场恶梦那样折磨交战的双方。原子裂变和由此而产生的不可想象的力量已经可以被人类掌握。人类已迈出了走进天堂或地狱的巨大的新步伐。

但是，不管用于毁灭性的和和平的目标的原子能是多么不吉祥和多么引起轰动，它只是许多技术革命中的一个方面，我们这一代人往往几乎觉察不到这些技术革命。在战争中和通过战争，人们有了一系列的新发明。许多疗效奇特的新药物，例如青霉素被运用了，它们有不断提高人类平均寿命的作用。从1900年到1950年，我国男人的平均寿命从四十六岁提高到七十岁。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提高人类的寿命已经达到了顶点。无数新的人造原料被合成了；现在，塑料和合成纤维代替了天然原料。原子能补充或代替了作为能源的煤炭和石油，而太阳能的利用看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大规模向海水要粮也是如此。交通和

① 在荷兰工会联合会（即当时荷兰最大的总工会组织）1956年6月8日举行的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译者

通讯工具可以说是以无与伦比的速度获得发展的。美国只是战后才创立电视事业的，现在美国却已有三千万人拥有电视机。

电视机的使用已经把生产过程的机械化变成自动化过程。事实表明，生产的自动化过程将比本世纪任何其他现象更多地促使劳动发生革命。目前，大规模采用自动售货机比任何其他问题都更引起美国工会运动的注意。

列举几项新发明已经足以说明这种论断：不承认发生了技术革命的人也得承认技术发展的速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它引起的许多问题并不是新问题，而是一切技术进步的固有特点。然而，以很高的速度运用新发明的情况，倒是新现象。过去，新发明被运用的速度是缓慢的。棉纺工业的最初机械化花了大约七十年时间；经过一个世纪的机械化，工业部门才比较普遍地使用蒸汽机。正如英国科学和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所指出的那样，“目前，具有类似重要意义的技术发展，例如航空工业中的喷气式飞机发动机和纺织工业中象尼龙那样的合成纤维的发展，只花了上述时间的一个小部分。”

人们同样没有理由推测，在因战争年代的急需所引起的狂热发展以后，可望有一个发展缓慢的或稳定的时期。英国哲学家怀特黑德曾指出：“十九世纪最伟大的发现是发明艺术的发明。”美国汽车制造厂工人工会主席沃尔特·鲁瑟补充说，“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发展之一是把发明艺术变成了一个标准化了的经营手段，即常规活动。”现在，研究部是任何一个重要企业的固定的组成部分，同时各国政府也组织大规模的研究工作，并把其成果应用于企业生活中去。

这种发展对增加福利来说意味着什么呢？长期以来，经济统计学家有这样的出发点，即认为从比较长的情况来看，因技术进步而引起的生产率的增长，每年达到百分之一到百分之

二,这是值得注意的稳定的平均数,这样,它就似乎说明,从比较长的时间来看,经济进步的稳定程度是很高的。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根据比较新的数据对这种论点采取必要的怀疑态度。美国最大的调查机构之一国家经济调查局,在最近的出版物上断言,生产率发展中的这种所谓稳定现象,是一种假象。调查局证实,美国生产的发展情况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生产率每年提高百分之一点五,在两次大战之间每年提高百分之二点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年代里,每年平均提高百分之三点五,而在1954年和1955年,甚至每年提高约百分之四。美国生产率的提高同战后我国和西欧其他国家生产率的提高相比还要慢一些,当然应当考虑到,我们这里所处的局势是生产机构处于迅速恢复之中的局势。如果现在在美国观察到的数字能够继续保持很长一段时间的话,那么,人们就得在经济思想上,实现原则上的极其重要的转变,即为了适应生产率年复一年的较大提高,要以消费,因而也以工资标准调节经济。

从重要性来说,人们对资本和收益比例的新认识同这些新资料密切相关。最近进行的对投资的资本和收益比例的许多调查表明,随着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单位生产所需要的资本并不象人们经常考虑的那样越来越多,而是在缓慢地减少。也就是说,资本的生产率也在增长。所以,要在技术前进的情况下,保持相等的生产,所需要的资本不是更多,而是更少。尽管运用这条规律必须有许多保留,而且存在着和这条规律不相符合的无数情况,但是,这种见解也对经济政策,特别是对投资和消费问题的关系,有重要的影响。

我们在这方面碰到经济学上调查得相当少的一个领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那个时期中,经济学家的注意力绝大多数都放在经济的综合局面中的现象上。现在人们才看到经济学

家们重新关心对实现经济增长的条件和对经济增长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的调查。由于这种落后情况，人们不能有把握地说，生产率的不停的和加速的增长的可能性能真正导致繁荣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必须等待总的经济形势的继续发展。旨在防止总的经济形势遭到干扰和旨在克服这种干扰的经济政策手段——特别是保持高水平的国际贸易往来方面的——是否会表明自己是有效的，这仍然没有把握。尽管1949年和1952年美国的经济衰退相对来说没有影响世界，但是，这并不能保证充分就业的情况持续下去。由于没有拥有足够经济权利的超国家权力机构，所以一旦世界经济的关键地区形成了具有相当规模的经济萧条发源地，人们还是应当担心会发生最严重的事情。

正如1950年朝鲜危机告诉我们的那样，政治危机同样可能是阻碍繁荣发展的一大障碍。世界上落后国家和处境优越的国家之间，生活水平日益不平等，可以对经济的稳定增长产生严重的威胁。因此，经济能否得到发展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大问题。

但是，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我们无法左右的经济和政治情况，而同样取决于我们实现经济增长的愿望和意志。阿瑟·刘易斯教授这位英国工党当前最主要的经济学家，把关于人类努力建设高水平繁荣的社会的愿望的一章，作为他写的关于经济增长理论的书的开端。如果经济增长，社会也会象人一样，倾向于变得“又胖又懒”。尽管如此，我觉得暂时不必把西欧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估计得太大，虽然引诱人们实现这种情况的因素肯定存在。

首先，苏联经济实力的巨大发展迫使自由世界至少要拿出同样大的力量来努力提高繁荣水平，如果西欧不甘心于一步一步落后的话。

其次，人口的增长产生一种强大的刺激作用。从纪元开始

到大约 1750 年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世界人口只是慢慢地从大约一亿增长到六亿。而在最近两个世纪期间,世界人口异常迅速地增加了。在不到两个世纪的时间中,世界人口增加到四倍,现在一共达到了二十六亿人。

尽管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人们有理由推测,由于出生率的下降,一些西方国家的人口增长率可能下降,但是,在战争中和战后人口增长率的提高,使得今后时期人口的进一步增长变成了一件确定无疑的事情。由于欠发达国家地区的死亡率下降,人口专家们认为,到 2006 年,世界人口将达到约为现在的两倍不是不可能的。

在我国,最近五十年中,人口已经增长了一倍以上。1980 年,我国的人口大约将达到一千四百万人,这就是说,大概比现在多百分之三十。我们不知道,1980 年以后我国人口将有多少,因为今后的二十年中的出生率将对它起决定性的作用。

第三,由于通讯工具的大量增加,人们的需求可望继续增加。在这方面,不仅应当考虑到客运工具,也要考虑到交流思想的工具;电话、电报、电台、电影和电视。这些通讯工具为社会的大批人进入社会事态发展的新领域敞开了大门。由于人们了解了这些新领域,人们提出了新的需求,这还导致了人们采用另一种生活方式。请注意,我这里并不是在为永久性不满情绪,即老是要求新的和更多的东西的情绪,进行辩解。但是,我倒要指出,在现有技术能力的情况下,旨在压缩需求和旨在实现稳定和安定的机构,对就业和生活水平构成最危险的威胁之一。未来时期的经济只能是扩张性的。

我强调思想交流工具的意义就足以清楚表明,我主要是在社会和文化领域中寻找需求的增加和对需求的刺激的。因此,我的出发点是这样的思想,即致力于增加繁荣的努力是健康的。能

不能够实现繁荣的增长，部分地取决于无法预料的因素，部分地取决于我们在今后的时期里的行动。

第一次工业革命曾经给千百万人带来极大的贫困，他们在不能进行任何反抗的情况下听任工业发展的摆布，工业使他们变成了雇佣奴隶，使他们突然脱离原来的生活，而不给他们任何报酬。如果我们不及时地认清现在起作用的力量并且引导它们在人道的社会的范围内起作用的话，那么第二次工业革命就可能导致大规模的失业、贬低劳动、扩大繁荣的差别和垄断权力地位的增强。在回答为此需要采取哪些措施的问题以前，我们首先要详尽地研究今天的发展的性质，特别是自动化的性质。

“自动化”这个词可能是福特汽车工厂的副厂长首先使用的，对迄今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的现代化大规模生产，就是这家企业在将近半个世纪以前首先采用的。这种自动化指的是由机器代替人来操作机器和监督机器的功能这一技术发展。一般说来，机械化的目的在于由机器代替人的体力劳动，而自动化的目的在于用自动工作的仪表来代替人的观察、通报、信号和控制。

自动化的原理不是新的。人们正确地指出了，以前就已有运用过该原理的机器，例如1801年的雅卡尔纺织机、早就存在的可调整机器转动速度的调节和控制机制、可自动调节温度恒温器、1925年已经用于航空方面的自动导航器以及其他许多例子。但是，电子技术的应用，却是新的，由于战争中和战后现代物理学的巨大进展，它已经使大规模自动化成为可能。战争中的导弹和火力指挥采用自动化技术以后，人们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即如果人们能够操纵一个快速运动的炮弹的话，那么用电子辅助手段控制生产过程也必然是可能的。从这个设想出发，产生了电子计算机和反应迅速的、大大减少了人工控制生产过程

的必要性的控制手段。

在最近七、八年间，自动化首先在美国获得了迅速发展。根据现存的许多资料可以认为，在苏联，自动化也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同已知的和现存的机械化和自动化控制的形式相比，现在的自动化到底是一种进化还是一场革命呢？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争论这个问题是毫无意义的。

在企业界中占压倒优势的呼声是，天下没有新事物，一切都将逐步地进行，人们完全不必担心出现什么干扰，工人的生活水平不会碰到困难，而且人们最好不要过多地赞扬正在发生的事情。英国政府的报告也有点反映这种精神。尽管这个报告提出了若干具体的指导方针，但是人们还不能消除这样的印象，即报告的主要目标是加剧英国工会运动内部的不安的风波。这种思想甚至达到如此强烈的地步，以致确实没有过分同情工会运动之嫌的英国杂志《经济学家》问道，科学家先生们是否也悄悄地进行了某些政治考虑？其实，在荷兰，人们有时也针对所谓的科学报告提出这样的问题。

同企业主们的意见形成明显对照的是美国一些学者和美国工会运动的评论，这些评论在敲警钟，并主张采取深刻的措施，以对付自动化的结果。沃尔特·鲁瑟在其向负责调查自动化的美国国会经济委员会递交的说明书中，谈到了美国雇主联合会发表的一篇文章。那份题为《一切职业都会有自己的位置》的小册子说：“在电子技术的引导下，在原子能的推动下，在适应了自动化的完美作用的情况下，我们自由经济的魔毯将把我们带到遥远的、做梦也想不到的地平线。通向那里的道路将是世界上最大的耸人听闻的事件。”对于这种无稽之谈，鲁瑟指出，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不肯相信自由经济魔毯。自动化包含着关于不断增长的繁荣、更多的业余时间和更大的文化和道德方面的机会的

诺言。但是,为了履行这个诺言,人们将有必要去对付许多严重的和困难的问题,对本来不适应自动化的社会,也将提出掌舵艺术方面的很高的要求。

说到这里,大家也就明白了,围绕自动化问题将开展很大的一场斗争,以实现保障就业和调整劳动的必不可少的措施,事实表明,企业主们激烈反对这些措施。只要满足一系列的条件,自动化未必导致持久的失业。

第一,将来必须控制自动化的速度,以防止一部分人失业。过去技术上的进步并未导致持久的失业,这是对的,但是,它确实使某些企业部门暂时产生了就业不足。就想一想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我国矿业和制雪茄工业的情况吧!

所谓的补偿理论说,机械化导致费用和价格的降低,从而导致销售的扩大和产生新的就业机会,但如果没有足够的购买力来购买扩大生产的产品,这种理论也要失败。就这一方面来说,我请你们回忆一下我早就说过的关于所投资本的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话。在这里,投资和消费之间的平衡受破坏的危险确实存在。

用经济政策的术语来说,控制自动化的规模和速度,意味着控制投资的规模和方向。我们都知道很多人很反对有关这方面的具体控制办法。这并不否认,据我看来,同我们所看到的美国的发展情况相比,在投资方向方面,我国政府的手段确实是不够的。

这里涉及到哪些措施,还不能确切地说。关于自动化的规模、速度和效果,不清楚的东西太多了。但是,指明这方面的社会政策应当朝什么方向运动,确实是可能的。我们首先将研究就业机会方面的问题,接着再研究由于劳动性质的变化而产生的若干问题。

第二，企业主分担了由于自动化而被解雇的劳动力所引起的社会负担，具有最重大的意义。美国工会运动坚持这样的立场，即企业必须保证工人们有至少一年的工资，而且同支付安装新仪器设备的经费一样，必须支付工人重新学习的经费。

第三，企业应当分担因企业迁移到新地区而对社会所造成的负担。将来，核能和自动化的同时发展可以吸引人们把几乎完全自动化的企业迁到尚未开发的地区。因为，如果这些企业利用核能的话，它们至少在选择厂址的过程中可以自由得多。对于我国来说，这无疑是1975年以后的事情，估计到那时核能进入了更容易掌握的发展阶段。对于美国来说，这件事现在已经有可能做到。同时，它也可能意味着现存社会的衰落和解体。

除了就业问题以外，我们也要注意劳动性质在技术不断向前发展的情况下所发生的变化。在这里也可以看到乐观的思想和更为悲观的思想同时存在。人们普遍地相信，自动化将对雇员的训练和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无论在生产过程中，还是在管理中，熟练劳动将几乎完全消失。需要大批人员进行准备和调试电子仪器的困难的工作，同样也大量需要会操作仪器的工人。这是有利的方面。

但是，必须小心谨慎！对老工人来说，改行往往没有什么好处，而智力不足以从事所要求的高水平的劳动的人应当安排什么职业呢？

现在来谈谈才干稍差的人参加劳动过程的问题吧！有一种答案，这个答案说，“自动化的结果，将是占人口一半的有才干的人必须拼死拼活地干，并缴足够的税，以便让另一半人能够吃闲饭”。这种情况似乎是一句笑话，但弗·雷·波拉克教授严肃认真地向我们指出这件事。他认为，社会这样分化为能充分发挥作用的有才干的人和被拒之于门外的没有才干的人，是现代技

术发展的致命性的总结果。因此，他提出，未来社会的一大矛盾将是工作的和不工作的人之间的矛盾。

波拉克是针对法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弗拉蒂耶的乐观看法提出这种意见的。在我所知道的对明天世界的看法中，我把弗拉蒂耶的看法算作最有价值的。从统计学家科林·克拉克的数字出发，弗拉蒂耶根据各个经济部门采用节省劳力的技术和由此解雇劳动力的可能性，把经济生活区分为三个部类。

在第一个部类中，技术进步是缓慢的，农业技术的发展就是其典型例子。

在第二个部类中，技术发展迅速，其典型事例是工业技术的发展。

在第三个部类中，完全没有技术进步。这个部类包括知识分子和手工业者占压倒优势的服务性行业。其中当然也包括自由职业、教育、法律、医疗保健、社会工作、科学、商业、管理和艺术。还包括手工业者和象理发行业这样的服务性行业。统计数字表明，在第一个部类里，就业人口的比例迅速减少。在工业革命以前，各国从事农业的人数都是百分之八十左右，这种情况在世界欠发达地区仍然存在，而在现代工业化国家中，这个百分比已经下降，比如说在英国下降到百分之六。在荷兰，这个百分比同样在迅速下降。1947年，它还是百分之十九，而现在男人只是百分之十三，连妇女包括在内也只是百分之十五。有人预料，几十年以后，在我国，这个百分比也将要下降到百分之五至七。

在第二部类中，在该部类工作的人所占就业人口的百分比，起初大大提高，比如在英国达到百分之六十以上。但是，现在，在机械化和自动化的影响下，在工业部门工作的职工所占就业人口的百分比下降得相当快。从1920年至1950年，美国的这一百分比从百分之三十三下降到百分之二十六。人们多次引用

的英国政府报告也称,在自动化的影响下,英国也有这种事态发展。弗拉蒂耶预料,从长远看,将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在第三部类中工作,而只有百分之十到十五的人在自动化占压倒优势的工业部门工作。

我不愿象弗拉蒂耶那样作那么长远的估计,但我还是应当说一句心里话,即我对人们如此不重视他的看法常常感到奇怪,因为实际发展如此明确地证明了他是正确的。在这个问题上,他没有遭到波拉克的反对,虽然波拉克认为第三部类也将在很大程度上机械化。我不相信这一点。相反,随着劳动性质在工业和农业中的提高和对人类的要求的提高,对第三部类的服务性工作、教育、社会工作、娱乐、艺术、体育和尤其是通讯(报刊、电影、广播、电视)的需要也就将增加。扩大我们社会中的服务性行业本身又产生对许多新职业的需要,在新职业中,才能低的人和缺乏才能的人也有地方可以安排。人们可以想到维修保养行业、娱乐、体育、旅游和新的娱乐形式。在美国,从事业余爱好已经导致出现一门新的科学,即“业余爱好学”。

但是,将增加的不仅仅是对第三部类的服务性工作的需要。人们训练和全面发展的水平越提高,对具有严格私人性质的服务——由于人类精神是无限多样化的,这种服务也将包括形形色色的内容——的需要也越将增加。在这里,机器没有地位。例如,使外语教育高度自动化(通过使用电唱机和录音机),是有可能的。我甚至可以想象一种自动化的教学工具,它可以自动地纠正学员的用词错误和发音错误。但是,培养艺术感、鉴赏力、批判精神、逻辑思维、集体精神以及责任感都不能实现自动化,这就是说,不能没有人,不能脱离人去搞。而正是这些事情,是明天的社会的关键。这同时意味着,对第三部类提供的这种服务的需求将来会达到多大的程度,这完全可以由我们自己掌握。

我提请人们注意的自动化的最后一个方面，是自动化设备极难改装的问题。这种设备昂贵，因而需要大量投资。这种机器设备的装配是同一定规模的生产 and 一定种类的产品相适应的，是从某种需要出发的，进行改装是很困难的。自动化对大企业一般有利，因此有这样的危险存在，即大企业将变得更大，并且——由于安装好了的设备带来的持续负担——将从事不健康的活动。象几乎全面自动化的生产过程那样所涉及到的投资规模，需要国家和国际机构来协调。这同核能的发展显然是相同的。人们广泛地认识到了，核能利用、工业、农业和卫生保健事业的 投资都具有如此大的影响，以致不能根据私人利益作出有关的决定。所以人们才主张建立国家机构和超国家组织来控制裂变物质所有权、研究裂变物质的应用的可能性以及管理核反应堆。

现在，在许多方面自动化的状况不同了，但是，我认为，荷兰当局主动实现如下行动是当务之急了：

一、研究我国自动化相对于外国的发展速度；荷兰有非常好的自动化的例子，由于销售量大大增加，这些例子无声无息地实现了。但是，自动化的速度将同时也对我们未来竞争力起决定作用。

二、在计划大规模地采用节省劳动力的办法的地方，促成雇主和工会之间进行磋商。

三、根据外国的经验，研究我们教育有必要实行的调整，在这一研究工作中，要同时考虑让人们重新受教育的可能性。

至于应当用什么样的组织形式实现政府的这些倡议，我现在不能肯定。当然，这个领域不是新的。技术的进步也是近几年来使人们谈论往深度的投资、充实和改善我们的低等、中等和高等技术教育的必要性的根本原因之一。但是，关键问题在于，技术的发展已经明显地进入了如同万马奔腾的一种日新月异的局

面。因此，协调这方面的努力同协调核能方面的努力一样有必要。

在讨论了扩大繁荣的条件和手段之后，我现在想就如何花钱谈几点意见。战后我们大家上的宏观经济课确实如此之多，以致我们懂得了，它涉及到了一系列的选择。幸亏我们的处境不同于荷兰中央计划局，该局不得不把为满足完全相对立的人的不同欲望所需要的费用加在一起。但是，必须和可能作出选择这件事本身，是令人高兴的，因为它是有价值的形式，它使我们作为一个民主的社会承担一部分责任。我没谈到改善社会福利设施和扩大社会保险机构的问题。这并不是因为我认为这些事情不重要或不紧急，而是——用荷兰工会联合会^①纪念册作者^②的话来说——因为，“二十世纪中期存在的社会问题已不同于1900年前后的社会问题。同以前一样，这是一个人类与社会的问题，但这是从更加广泛的意义上说的。这是自由和组织的问题，它同对人格的评价有最密切的关系，因此就是一个精神问题。”

因为它关系到人格问题，所以对工会运动来说，延长和改善教育也应当是一项首要任务。这既是增加物质繁荣的条件，又是我们已经增长了繁荣的结果。前些时候，卡尔斯^③大臣就说，他预料在几年之内，教育预算将从七亿增加到十亿以上。我希望是这样的，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应当改变我们对教育的态度。为什么说我们今天的教育完全不能满足需要呢？

① 原来是荷兰人数最多的工会，受工党的影响，现已同荷兰原第二大工会荷兰天主教工会合并为荷兰工运联合会。——译者

② 该纪念册作者为弗·德容博士。纪念册名称为《论劳动的地位——对荷兰工会联合会的诞生和发展的历史总结》，1956年出版于阿姆斯特丹。

③ 荷兰政治家，曾代表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前身天主教民主人民党从1965年4月至1966年10月任荷兰首相。——译者

首先是因为，同更发达的国家相比，我们的教育没有用足够的知识把我们的青年武装起来，以致他们不能很好地完成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提出的各种不同的经济和技术任务。很明显，我们繁荣的增长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有没有技术专家。实现自动化的进步则需要更多的东西。自动化要求人们受到更广泛和更普及的教育，以促进工人的流动性和增加工人获得再教育的机会。这多半是个态度问题。明天的世界更需要的是精通各行各业的、能更加出色地适应新形势的人才，而不是只会背诵书本知识的人。

为了维护和发展我国的民主制度，也需要有更加广泛的普及教育。事实表明，只要在人数较少的特别有才干的及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比如说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和人数广泛的受教育不充分的人之间存在着鸿沟的话，众所周知的“领导人员”问题原则上是不可能解决的。如果每个青年男女不能在学校里稍微了解企业是什么，在经济和社会立法方面，正在发生一些什么事，那么，对于广大工人群众来说，企业内部的社会事务和经济事务方面的共同发言权，将毫无生命力，而本来这种发言权也是这些群众的权利。如果学校不能使每个人懂得，自治是怎么回事，民主有哪些规则和我们是如何接受领导的，那么，我们的政治民主就将倒退。任何一位母亲如果没有在学校里学过，在精神、政治和组织方面，社会上都兜售一些什么，那么，她也不可能在明天的世界里教育好自己的孩子，并为了对付明天和后天将存在的艰难困苦武装他们。

如果学校不训练和锻炼青年人来积极参加文化生活，那么，在明天的世界里，人类的个性也不会得到发挥。青年人必须在学校里学会登台表演、演奏音乐、欣赏图画、看小说、用自己的双手制作一些东西和用自己的双手干一些事情。只有这样，青年人

才会作为一个自由的人利用更多的空闲时间——青年人肯定会得到这些时间的。

这意味着要尽可能快地对未满十八岁的青年人实行义务教育制度。如果要专门学习技术或其他职业，必须至少利用学习时间的一半进行一般教育。

在《劳动之声》杂志^①创刊纪念号上，我回忆了当选美国总统不久的艾森豪威尔的讲话，他说：“每个青年男女至少必须有两年时间进高等专业学校（美国大学的预备学校）学习，这就是说，他们在二十一岁之前将获得普及教育，这为期不远了。”

我们现在离这样的要求还相差很远，不仅距离这样的教育，而且距离这种思想，还相差很远。在美国情况如此不同，这是由于美国更加注意缩短劳动时间，也由于更注意缩短劳动年限。在关于实现自动化的讨论中，人们反复提出希望让雇员晚一些参加生产过程，而提前退休。此外，各工会组织还明确指出，实行少于四十小时的工作周是可能的，它们尤其提出，高度自动化的企业部门实行每周工作四天和三十小时工作周的制度是可取的。当然，拿美国的情况同我国作比较的时候，特别是在劳动时间方面，应当极端谨慎，因为美国工人的工作条件就是完全不同的。

实行上述工作周制度取决于未来几年中生产率提高的速度，生产率的提高同样对什么时候和到什么程度进一步缩短劳动时间的问题，也起决定性作用。

自由时间的支配问题是存在的，它将不会因为实行五天工作周制度而发生深刻的变化。我从中央统计局的一份调查报告中看到，1955年，在大城市工人子女中有不少于百分之七十在放假期间离开自己所居住的地区的时间没超过一天，这才使我

^① 荷兰工党的刊物。——译者

明白,我国大量缺少娱乐场所和娱乐的可能性,人们大量缺少好好度过假期的资金,而尤其缺少的是充分利用现有可能性的诚意和认识。我国城市人口过多的情况使这个问题更加尖锐。如果每个荷兰工人到一定的时候买得起一辆家庭用汽车,情况就会使人们感到宽慰了。但是,到那时候,大规模改善交通,将成为让工人们到更远的地方去进行娱乐活动的条件。

刚才已经指出,延长和改善教育是积极利用业余时间的一项条件。另一个条件在于使人们对工作感到满意。社会学方面的研究已经足够清楚地说明,在人们对工作不满意的地方,积极利用业余时间的问题几乎总是难以做到。自动化创造了减轻劳动强度的可能性。但是,随着进一步繁荣和最低收入者生活水平超越最低生存水平,应当更加注意组织企业内劳动的问题,以增加工人在工作中发挥自己的可能性。人类在劳动中寻求着使自己的生活的意义和实现自己思想的办法。生产过程的组织必须适应这种情况。就业机会、对生存的保障和合理的繁荣水平越得到保障,努力方向越应当是增添乐趣。

目前,一些社会学研究所正在就人们的工作条件问题进行很多研究工作。关于使人们对工作本身满意的问题,很遗憾还没有解决的前景。库拉尔斯博士等人认为,通过扩大任务,可以使很少需要脑力的劳动得以变得更令人满意。看来,正是由于自动化,这种思想注定失败。自动化使得操作机器的劳动成为多余,它使工人们开阔了眼界,但是它又最终使工人同工具和产品相异化。

显而易见,对关心其成员的个性发展的一个工会来说,就在工作和通过工作使人的生活有意义这个问题,仍然有大量的工作可抓。

在明天的世界里,工会运动的工作将在许多方面改变其性

质。如果弗拉蒂耶对第三部类的看法被证实是正确的话，那么，也应该使工会在服务行业领域里获得重点发展。工会运动必须以警觉的目光密切注视自动化的发展。正如三十年代全面经济危机最终导致了人们承认工会在国家一级有充分的经济参与管理权一样，加速机械化势必导致在企业部门一级的充分的经济参与管理权。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工会运动被纳入了社会制度，而在本世纪下半叶，将出现的是工会运动的经济任务在国际、国内和企业部门一级的扩展。这样，工会运动接受共同参与负责的情况，不仅将在雇主的繁荣方面，而且将在全体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发展方面，表现出来。

的确，这是一项伟大的任务和一个光辉灿烂的前景！我只是简明扼要地谈了如何利用未来繁荣的各个方面，但是，我们所看到的今天和明天之间的联系、扩大繁荣的条件、技术发展以及在更高的繁荣水平情况下的生活方式，这一切都表明，国家、生产过程、集团和利益，将进一步交织在一起。

在明天的世界上，一个人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依赖另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未来社会必将在自己的建设过程中，反映这种日益增长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和社会性越来越强的责任。

基本的民主化

(1957年)

思想革新

一位英国批评家最近断言，社会党人都需要新思想，这是五十年代的特点。荷兰工党由于早在1949年就提出了制订详细的未来纲领的任务，再次证明它比其他兄弟党先进。这项任务的产物《走向自由之路》于1951年出版。从那以后，西欧各国社会党便开始发表类似的出版物。英国工党正在出版十篇纲领性论文。德国社会民主党召开的几次代表大会提出了新的提法。它明确地摒弃了普遍贯彻社会化的原则，并在强调计划安排的同时，还强调竞争和价值规律的作用。社会党国际举行了几次专家会议，虽然国际会议的固有特点是语言上的混乱状况，但是这些会议至少明确承认了重新思考问题的必要性。产生这种必要性的原因可以归纳如下：

一、社会福利国家在战后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社会党在两次大战间隔时期的纲领已经实现了。随着无产阶级的解放，社会主义——就体现这一解放斗争的社会主义来说——面临着失去其存在的权利的危險，至少面临着失去其推动力的危險。因此，就产生了这样的问题，即如果充分就业和社会安全已经得到保障，社会主义运动可能发生什么情况呢？

二、在朝鲜危机克服以后开始的并一直持续至今的时期里出现了不断繁荣和持续幸福(尽管欧洲小国荷兰限制开支)的局面。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出现了各国社会党纲领至今没能充分估计到的若干现象,其中一部分是新的社会现象。这些现象同经济上的幸福有关系,但同福利国家本身的特点的关系更为密切。福利国家的这些特点是:政府的影响增加了,出现了新的统治集团,对失业、贫困和社会组织排挤个人的情况的担心消失。

三、技术的发展——自动化、核能——同社会和经济改革(集中化、一体化、服务性行业的扩大)是并驾齐驱的,这些改革要求重新检验旧的原则。如果纵观这些要求人们重新确定方针的复杂原因,便可以明了,工党的先进性也使工党有困难。在撰写《走向自由之路》的时候,我们正处在由短缺转为过剩的过渡时期。当时可以归纳的战后头五、六年的情况,几乎完全没使人们估计到会出现使1945年后的第二个五年的情况完全不同于第一个五年的那些特殊的与经济繁荣有关的问题。自动化当时还处于幼年时期(最近一份文献目录列出了一千种有关的书和杂志——希望作者们能长期保持这种积极性)。和平利用核能似乎还是遥远的事。因此,从表面上看,有充分理由把这项工作再做一遍。但是,有了新鞋之前不要扔掉旧鞋,这是已经得到证实的真理。因此,我们有理由先研究一下,《走向自由之路》的基本思想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实现,或者说,它在多大程度上有能力抵制迅速的社会变革的淘汰过程。

作为社会主义准则的自由和平等

《走向自由之路》是在一个资本主义特征已不鲜明的社会中

检验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第一次尝试。其出发点是把人的自由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的政治准则。把自由列为首要准则当然包含着有意识的选择。在极权主义国家以社会主义的名义所干的一切可恶的事情发生之后,这种选择意味着,民主社会主义把人们的自由放在首位,尽管这是有限的自由。这种自由是一切人的自由,是共同的和负责的自由。虽然人们以这种选择继承了社会主义的老传统,但把自由放在首位的这种做法,除了受到带有点怀疑地接受这一挑战的局外人的批评外,也受到了自己人的批评(这些人说,作出这种选择的目的是把工党搞成一个“穷苦人的自由民主人民党”)。这样,同人人平等的思想有密切联系的社会公正也就被视为社会主义的最高准则,同时也被视为把自由思想绝对化的做法的对立面。

这种对立是不对的。这两种思想不但在历史上互相联系,而且自由发展所表示的平等思想的意义在于最缺少天赋的人应当同最有天赋的人一样有机会根据自己性格发展自己。用英国的克伦威尔军队的誓言来说就是:“我真的相信,在英国,最贫困的人也要同最伟大的人一样过日子。”反过来说,如果通过强制手段和通过使人人失去真正的自由来实现这种平等的话,那么,建立在每个人都“具有无限的价值”基础之上的基本平等思想也就失去了任何意义。那样,平等虽然还存在,但是人却失去了尊严。

不管怎么说,我认为,把自由作为纲领的指导路线是正确的,因为现在仍然需要那些以社会公正的名义扼杀自由的人采取明确的立场,同时也是因为平等寓于自由这一概念之中。更有甚者,只有实现了宣称人人都有无限价值的人道主义时,自由才具有内容。我这样郑重其事地表明自己的观点是必要的,因为只有把自由与平等联系在一起看,才能对当今的社会阶段进行

结构方面的批判。

已经实现的和未实现的愿望

《走向自由之路》中所遵循的顺序相当简单。它从自由准则出发，检查了在我们当今的社会制度中，在经历了近几十年的变革和改良之后，还存在着哪些东西阻碍人们感到安全和自由、履行自己责任和尽量享受我们称之为文化的那整套价值体系。

有人断言，解放工人的历史已经完成了很大一部分。贫困大部分消失了，劳动的法律秩序的基本轮廓已经形成，政府的工具也已经足以提供防止失业和克服困境的一定保障。社会矛盾已经缓和，在基层，开始有共同发言权，在上层领导（指社会经济委员会^①）开始有平等。企业内的劳动条件变得人道了，企业主表现了新的精神面貌。在农村和城市政策方面做了许多事情，以改善社会中弱者作为人的命运。这些事情包括卫生保健和社会工作以及人民住房建设。图书馆事业、公共教育、对艺术的资助等使文化部门的大门已经向广大群众敞开了一些。情况确实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在福利国家里，那些认为新发展威胁了自己原来的权力地位的人，比起走进了一个崭新世界的广大群众来说——群众是骑着摩托车进入这个世界的——更加强烈地表现出革命的情绪。

《走向自由之路》论述了这一切，称赞了它，而且继续阐述了各种发展路线。这个纲领同时打算使机构和职务尽可能多样化，以避免集中化和鼓励它们都承担自己的责任。

但是，《走向自由之路》在几个主要问题上主张针对结构问

^① 荷兰最高的经济决策机构，其成员包括政府、企业主和工会的代表，还有经济学家。——译者

题采取一些措施,在这些主要问题上提出了“建设性的批判”。这些批判是针对我们社会制度的缺点的,尽管已有那么多进步,但这些缺陷对现存的社会制度是一种威胁,因而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些缺陷同财产占有关系的不平等有关,这种不平等严重影响收入关系,并且始终是使人们感到被剥夺了权利和导致冲突的根源。与此有密切关系的是垂直接流动很少和发展机会不平等的情况,这种情况部分地是财产占有和收入关系不平等的结果,部分地是我国社会集团界线的僵化造成的。机会不平等只是我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教育和发展严重落后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这种落后本身又对民主的良好作用构成了一个潜在的威胁。不平等的财产占有关系、不平衡的发展计划、教育和发展的落后,它们既是我们社会的不平等的权力分配继续存在的结果,又是它的前提。

为改善这些关系,《走向自由之路》提出了一整套措施,但同时应当指出,近几年来朝这个方向发展的事情特别少。至今最能使广大群众发动起来的是机会不平等的情况。另外,人们的印象是,我们的教育大军慢慢地活动起来了。在中央统计局的出版物《荷兰青年和他们的教育》中公布了下列统计数字:

十五岁至十七岁和十八岁至二十岁继续深造的青年在同龄人中所占的百分比

	年代	15—17岁	18—20岁
全日 制教 育	1930	15.4	5.2
	1940	32.1	6.8
	1951	27.9	9.0
	1954	30.2	9.0
非全 日制 教育	1930	14.4	6.3
	1940	10.4	6.0
	1951	16.0	11.4
	1954	18.6	12.4

但是，与这种令人鼓舞的现象相反的是，也存在着表示相反方面的事实，例如，自 1953 年开始执行有关政策以来，反对拉平收入的倾向大大增强了。此外，公共部门衰退了（例如荷兰皇家航空公司股票跌价），在现有关系中，这将加剧财产分配上的不平等、破坏有领导的工资政策和加强社会领域中各种倒退趋势。

人们不妨根据上述问题的相互联系，把它们说成是我们社会中坚固的寡头政治结构的自我维持。遗憾的是，提出这种术语虽然要承担重大责任，但是我觉得它是有用的，因为经济繁荣阶段的许多新现象增强了这种结构。在这个问题上，英国理论家克罗斯曼谈到了“寡头政治时代”^①。

财产和权力

在有关财产形成问题的讨论中，各教派政党特别强调，必须通过个人积累财产来完成无产者的解放过程。社会党人始终对此另有看法。他们过去和现在都认为，非无产化要根据工人在生产过程所起的作用，使工人在事业中拥有同等权利。反对有产者的权力地位的斗争，比反对不劳而获的斗争更是社会主义斗争的重要因素。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这个斗争是由国家已获得的支配财产方面的权利所决定的。象股份公司中正式规定的那样的财产占有和管理的分离，似乎又使人们更有理由从国家内部的权力关系的角度，把财产关系看成是无足轻重的。但是，现在这方面还应当提出几个问题。

首先，由于经常运用寡头政治的条例，股份公司中财产占有

^① 参看克罗斯曼 1956 年发表的《社会主义和新的专制主义》。

和管理的分离事实上已经取消了。由于寡头政治条例的运用，只拥有很少股份的人可以行使实质性的管理法。

第二，只有进一步的调查才能证明，大企业的少数经理和大部分董事是否就是那些占有全国整个财产近一半的，而在人数上只是全国户主的约百分之二的人。

第三，荷兰学者芬克的一个详细调查表明，选拔股份公司的经理和董事的圈子还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芬克对交易所登记其股票的三百家股份公司中的二百九十八家公司进行了考察。他还对资金达五十万荷兰盾以上的九百四十四家股份有限公司中的三百零九家公司进行了抽样调查。芬克主要调查了经理和董事的父亲和祖父的职业。他发现，一半以上的经理出身于上层社会，而出身于占荷兰就业人口百分之七十的下层社会的，还不到百分之五。他认为，这些数字对于那些根据少数引起轰动的现象，认为在荷兰的大康采恩里，人人都有机会当经理的人来说，包含着一种警告。“选择经理确实和社会地位有一些关系。”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事实表明，股份公开公司的经理同股份有限公司的经理相比，出身于上层社会的人更多。因此，股份公司的公开性决不是解决裙带关系的办法。

我们应不应当根据这种情况得出结论说，企业主是一个闭关自守的阶级？这样说肯定太过分了。当代企业主们的动机千差万别，因而不能把他们纳入马克思和韦贝尔所说的阶级，即维护一个集团的经济利益的阶级。现在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认为，这种意义上的阶级概念已不那么重要，因为地位观念取代了它，地位观念是建立在履行某一社会职能基础之上的。在企业界的经理们那里，地位观念的确很起作用，到适当的时候，它就会同经济上的阶级意志的残余携起手来。企业的经理同高级官员、一部分从事自由职业的人以及金融贵族一起，构成了我们社会中

明显的新的最高层。雷蒙·阿隆^①认为，同极权主义国家的权贵阶层相反，西方的权贵阶层的特点是，它是分裂的权贵阶层，并且在我国还有宗教分界线在其内部起着作用。但是，尽管如此，不能排除这个权贵阶层仍然始终具有可怕的闭关自守的性质。

教育和权力

社会上流动性极少的不光是企业界的经理。库佩尔在一个有代表性的抽查中调查了自由职业者的出身。他发现，在二千七百十四名医生、专家、牙医、兽医和律师中，父亲是工人的只占百分之零点七。他的结论是，流动到这些职业上去的机会是很小的。值得注意的是，医生职业的流动性比律师大，尽管学医的费用更高，并且一个年轻的医生必须有一点资金才能开业。范黑克对此补充说，“虽然购买诊所的费用很高，但看来借钱还是比建立社会联系容易。”^②

尽管范图尔德尔在一次调查中发现，自1919年以来，无论是受过教育的还是未受教育的工人都越来越善于提高自己。但确实没有必要把这样的数字列出来，这些数字能说明工人子女要在一代的时间里使自己提高到大学毕业生水平的职业，在现在情况下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这不仅是一个钱的问题。福利国家中的地位感的兴起代替了阶级障碍，这种地位感使社会阶层之间有了一个门坎，它使想往上爬的人很容易绊倒。作为这种象征，英国创造了“幸运的吉姆”这样一个出身卑贱的青年形象，他靠奖学金学习，顺利地通过了考试，很快有了职业，但后来发

① 1905年生，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译者

② 1956年举行的全世界社会学会议资料汇编：《荷兰的垂直的社会流动性》。

现,英国上层社会还是排斥他的——这样,他充满愤怒和仇恨跑到保守党的无情的商人那儿去碰碰运气。

实现机会平等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唯一真正有效的办法是延长义务教育时间和扩大普及教育。这样,受过最低教育的基本群众更多了。奖学金和学校心理工作只能是补救办法。这正如在收入分配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即把领取最低工资者拉上来,是实现缩小收入差别的最有效的办法一样。一旦共同基础扩大了,社会交往的性质和各社会集团本身之间的关系,也将因此而发生变化。1945年以后这种情况还很少见。建设新型居民区的思想几乎没有什么生命力,现在已经消亡了。我们和从前一样又分别专门为不关心社会的人、没有受过教育的工人、受过更好的教育的工人,以及事务所职员和中等阶层建设一个一个的居民区。最高的阶层则自己给自己建设住宅区。

在我们的社会中,权力构成的情况是,现在管事的这一代人中,有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只上过小学。除了少数有才干和有能力的人以外,这百分之八十五的人除了参加选举外,什么政治活动都不参加。他们(还不到这部分人的百分之一)有时也参加政治会议,但他们的报纸充满他们看不懂的名词,发言人的讲话也充满他们听不懂的名词,虽然发言人努力避免这样做。在余下的百分之十五的人中,有百分之四至五的人受过中等教育,百分之一的人受过高等教育。受高等教育的人中,四分之三出身于较高的社会阶层。这就是权力分配的关键所在——关键不是结构问题,而是我们的民主应当包含什么内容。

有人抱怨说,企业委员会这样的机构陷入半瘫痪状况,这当然主要归咎于工会无能为力、工会没有人来抓这项工作以及工会没能使人们热情支持这项工作的情况。如果考虑到,企业委员会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工作,必须由只上过小学的人(通常是

老工人)来干,那么,仍有如此多的工作给搞好了,是一件令人惊奇的事。但是,只有在最终填平了使狭小的领导阶层同广大民众分割开来的可怕鸿沟之后,共同发言权才有内容,政权建设才有新的前景。有人或许要问,所描述的这种景象是否同社会党人在政府、省和市行政机关、工会、新闻、广播、社会及文化工作中所处的重要地位相符合。这种地位的确重要,但它主要局限于政治和行政方面,虽然无疑可以说,1945年以后,社会主义的影响已强烈地渗透到了社会党人从未起过作用的部门中。然而,在一些部门(例如私人企业)里,社会党人仍然几乎完全处于局外人的地位,而在另一些部门里,社会党人的影响则远远小于他们在人民群众中所占的比例。以上所述是对此的解释。只有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解放过程才能够完成。

垂直的社会流动性的扩大

从上述观点产生的方案包含着这样的内容,即《走向自由之路》提出的进军道路仍应当被认为是正确的。目的在于增加垂直的流动性,加速流动,以制约太明显的地位感。这是一种制约,而不是一种保证。在迅速的流动过程中,地位差别也可能会突出出来,美国就是一个例子。但是,如果以为社会主义在此阶段缺乏强有力的道德上的号召力,那就可以在这个领域里大有作为。

实现更大的垂直的流动性必须从两个方面来采取措施,一是用改善教育的办法,二是用改革财产占有关系的办法。把这两种办法结合起来,可以实现权力关系中的变化,这种变化本身又是扩大社会流动性和实现彻底民主化的先决条件。改革财产占有关系必须通过提高继承税、实行一项旨在还清债务的预算(和

税收)政策以及积累个人财产来实现。从改善权力关系的角度来看,后者几乎毫无意义。但是,由于我们的出发点主要是要分散权力,所以重点也将是(大型)企业的结构改革,这些改革将使政府和雇员获得控制企业财产的权利。应当通过把国民收入的更大部分用于设备更好和时间更长的训练来改善教育。在目前情况下,这只有通过政府,也就是通过提高税收才能办到。这就是社会党人政策的最大困难之一。很高的直接税是对产量和节约的压力。很高的间接税不引起这种麻烦,但它在技术上是难于实行的。另一种办法是根据承担这种税的人的不同能力征收金额不同的税,但这种办法只能部分地有效。如果收入分配好一些,很高的间接税不会引起什么麻烦。目前,消费者通过价格向私营企业主支付间接税,私人企业主用它来扩大自己的企业,如果收入分配更好一些,消费者就能够通过价格向政府支付间接税,政府就可以用它来扩大公共福利事业(例如教育)。只不过,为了实现更好的收入分配,我们现在不能没有很高的直接税,保守党人和维护等级制及寡头政治结构的人们正是无情地利用这种办法。如果纵观解放后的这一时期,我们不能不看到,集体开支落后于私人支出,而私人领域浪费了集体行业所缺乏的大量资金。最能说明集体福利事业这样短缺资金的例子是住房建筑和教育事业。即使考虑到了,为了实现工业化,强烈的收入刺激和很高的利润率是可取的;无数人能拿出六千至一万荷兰盾来买一辆汽车,却买不起一套舒适的住宅这种情况,仍然是不光彩的。当然,汽车运输业的发展实际上是没有人过问的,这也是福利国家的一种畸形发展。请不要忘记,美国每个家庭所拥有的私人汽车数量仍是我国的六至七倍,而我国每平方公里拥有的汽车数量大约已经是美国的两倍。

这样的说法并不是主张加强政府监督本身的辩解词。德国

社会党人卡尔·席勒提出了这样的公式：要尽可能地发展市场经济，要根据最大的需要制定计划。我也认为，这个公式对我国的情况来说是有效的。这也就是说，要认真对待相互联系的自由与平等。

富裕时期的社会主义

上文几乎没有论述开始时所说的社会党人需要提出新纲领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原因。这篇文章没有、也不可能有这种意图。只有一点可以当作例外。许多从本身来说并非不同情彻底民主化的作家认为，象上文所说的有力措施是多余的。他们认为，在福利国家旨在使人人都富起来的经济制度继续存在的情况下，更大的垂直流动性会“自动”出现。随着繁荣的发展，收入差别将缩小，地位差别变得不太突出，社会流动性将增加，权力集团将处于均衡状况。说到这里，人们常常要提到美国，在那儿，尽管教育处于更重要得多的地位，但国家还是同样严格地干预财产关系。

这时，除了不说例如美国的遗产继承税比荷兰高得多这一事实之外，人们还忘记了美国是诞生于一场深深地打上平均主义烙印的自由革命。在整个西欧，等级思想在我们大家的头脑中还是根深蒂固的。作为历史背景有一个完备的等级制社会结构。就其大学生的等级性来说，法国、西德和荷兰是记录的保持者。

但是，同上述这一切无关的一件有效的事情是，以上建议的改革是极其需要的，以对付旨在扩大繁荣的经济政策所带来的附带现象。寡头政治倾向不局限于企业界。对我国社会规模越来越大的组织来说，流动性和民主的相互作用是迫切的需要。

受到组织排挤的个人，要求有更大的活动范围；他要造致力

于社会保障的国家制度的反，这种国家制度很容易使他感到厌倦；在“职工参与管理企业的时代”里，他冲向了繁荣的社会送给他的一切东西；他对实质上只是应急关系的各种形式的集体主义有反感。只有当我们给他们以承担责任的机会时，他们才不会起来造反。

1959年的马克思主义

(1959年)

在斯大林逝世后的最初几年，在赫鲁晓夫还认为揭露斯大林的罪过有助于自己夺取独裁统治权的斗争时，苏共中央出版了一份小册子，宣布说，在斯大林的晚年，反党集团一些成员曾参加过放荡的活动，而斯大林却知道这些情况。在因参加了这些活动而被罢了官的人们中，有多年任苏联科学院哲学部主任和马林科夫政府文化部长的亚历山德罗夫教授。小册子说，在这位公认的“共产主义道德”问题专家座落在莫斯科郊区的别墅的图书室里，有本厚厚的、精装的书，从封面上的金黄色大字看，作者是马克思。而书的内容却是大量的黄色照片和图片^①。

有意义的不是苏共中央是否破例地说了实话，而是历史极其准确地证明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主要方面是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篡改，虽然看来亚历山德罗夫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比斯大林和赫鲁晓夫给马克思主义增添的内容更可取。当然，不能因此就不坚持努力分析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解释，以找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学习马克思分析社会的方法。不过，我觉得，把一再被提出来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观点拿到社会发展的现实中进行检验，比起花一个下午的时间来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不知第多少次的解释，会更有益一些。

我所指的一再被提出来来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是那些在局部范

圈内不可否认地复活了的、互相联系在一起的看法。持这些看法的人认为所谓福利国家的成就只是相对的，坚持说我们现在的社会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的，即由资本家和无产者之间的矛盾决定的；认为收入差别越来越大；怀疑国家是资本家的工具；主张搞阶级斗争；认为当前的生产制度仍然遭受其严重程度不减的经济危机的打击；主张大规模的社会化。

这类观点不断伴随着社会主义运动，即使在该运动的主流抛弃了这些观点之后也仍然如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社会秩序发生了基本的变革，从很多意义上说，在变革的影响下，争论似乎最终解决了，看来社会党人普遍承认了西欧现代工业社会的资本主义后期性质。几年前我曾指出，这个阶段的特征是人们对社会主义理论^①的兴趣大为减少，我还把战后的一代社会党人称为“沉默的一代人”，他们在为具体任务埋头苦干，但并不认为自己需要完整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体系。

毋庸置疑，对形势的这种描绘现在需要补充。在五十年代后半期，社会主义理论战线非常活跃。其表现是几乎所有社会党都对其纲领进行了修改。它们一方面彻底清算了已过去的时代的思想内容，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对已失去的有社会主义保障的乐园的向往，这样，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又被提出来了。英国、奥地利和瑞士的党都已经修改了纲领，在修改过程中，这些党都热烈地讨论了晚期马克思主义的看法。

这类马克思主义观点又得到人们的某种重视，这怎么解释呢？其原因首先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头十五年中，社

① 鲍里斯·尼科拉耶夫斯基在1958年10月13日的英文杂志《新领袖》里发表文章描写了这件事。

② 参阅收在本选集里的《理论和运动》一文。

会发展进入了死胡同。大体上说，福利国家的基础是在1940年到1955年之间建立的。在所有的现代化国家里，这十几年就是大大扩大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制定明确的就业政策、大规模扩大社会福利设施以及让大批人享受高等教育和参加文化活动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社会主义纲领的重要部分都付诸实施了，在社会党人没有参政的情况下也如此。五十年代中期，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都很动荡，这时的问题是：福利国家到底是一个中间站还是一个终点站？在这种不安定的局势下，不但新理论，而且旧理论都获得了起作用的机会。

除此而外，还有保守派对社会变革的反应。保守派向往恢复没有约束的社会和特权。随着社会财富的增长，高速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典型特征再度突出了。超级百万富翁（例如奥纳西斯^①）、豪华的宴会、极度的奢侈（火箭式汽车尾巴反映这种堕落的背景）、王宫的古玩，它们都使人们回忆起充满欢乐的二十年代或甚至回忆起1914年以前的时代，因为那时生活也好像是一个漫长的圣·尼古拉斯节^②的夜晚。如果把广大人民群众非常朴实的生活与此相对比，那么也就找到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复活提供了营养的一部分土壤。

人们对社会主义变成了道德和伦理学，甚至“变得肤浅”了，感到不愉快。人们向往政治和社会行动被纳入一个科学体系，这个体系应该使人们对这种行动的结果不是没有把握，而是把这种结果置于固定的发展规律的范围内。这种不愉快和向往同社会矛盾的加剧并没有关系，它们甚至更主要地是对具体任务的日益模糊的认识及其所包含的矛盾的结果。因此，如果谈得上

① 希腊船主。——译者

② 荷兰每年12月5日的民间节日，这天晚上圣·尼古拉斯回到人间，对每个人进行奖励或惩罚。——译者

有新马克思主义，那么其最明显的特征是其自信和说教式的语气，新马克思主义的老师和学生都表现这种真正的教条主义特征。过去几年出版的《政治学》和《社会主义前景》这两种刊物^①所载的文章就充满这种教条主义。

最后，在寻找正在复活的马克思主义萌芽时，不应忽视苏联集团因其经济迅速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实力总是容易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如果苏联及其卫星国的经济增长比西方的更快，那么这种马克思主义经济总应该包含一些好的地方吧。对具有某种性格的人来说，从感兴趣到赞同只是一步之差。特别是阿本德罗特教授和被德国总工会开除出工会的维克托·阿加尔茨博士周围的小组这类西德新马克思主义人物，在辩论中很少不把苏联集团的经济扩张作为自己的论据。

指出马克思主义复活的原因等于同时也点出了今日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几个弱点。尽管福利国家有一些成就，但收入分配和财产分配方面的不平等还是巨大的；从社会公道的角度来看，每个人的发展机会的不平等也是令人吃惊的，而且生气勃勃的力量不被利用致使经济畸形发展；大企业权贵阶层的统治地位同基本的民主相矛盾；社会主义运动的成果以令人害怕的方式局限于一些国有化单位。换句话说，社会主义运动至今确实还没有能够帮助我们的社会改掉一些基本缺陷。

由于社会主义运动疏远了作为世界观的历史唯物主义和作为人生观的社会主义，毫无疑问在其拥护者的某些部分中出现了至今尚未被填补的真空。共产党国家经济势力的发展使西方社会主义运动面对着这一事实：在西方存在着允许浪费和经济危机出现的经济关系。但是，现在条件下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弱

^① 荷兰的学术刊物。——译者

点还远没有全部列出,最主要的弱点还没有列出。更重要的是,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不但不能克服以上提出来的缺点,而且还妨碍我们认识社会主义运动本来的任务。我将稍微更详细一些讨论最重要的新马克思主义观点中的几个观点。

马克思主义者强调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社会观。它是关于社会发展过程的学说,关于人在社会中的地位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者相信历史有规律性并认为由于他们了解了这些规律就掌握了“关于将要发生的事情的科学”(德·沃尔夫^①语)。他们根据马克思关于社会阶级的存在和资本所有者对非所有者的剥削的认识过程解释现在的社会。他们认为现在的社会受资本主义运动规律(集中、积累、贫困化、经济危机和灾难)支配。一切新出现的社会现象,例如新中间阶层的成长、经理的行动、服务部门的扩大、国家作用的增多、经济危机的没有到来和工人福利的增长都被“解释”和说明,直到它们符合上面的框框。小小的纠正是允许的,但基本原则是不可触犯的。不管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以下的情况不会变:生产关系决定着社会存在;阶级矛盾不断尖锐化;必须进行阶级斗争;呼吁工人阶级完成其救世主任务;只要全面的社会化还没有成为事实和财主还没有被剥夺其财产,就不可能有和平。

现代的社会主义既不是学说也不是意识形态。它是这样的社会观,这个社会观认为,随着社会的变化,社会将由其他力量来支配。在我们西方社会里,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矛盾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其他矛盾也是同样决定性的。生产关系和公共领域的规模很重要,但居民的教育水平、宗教信仰和民主传统的存在也同样重要。现代社会主义没有完整的世界观,它不相信

^① 荷兰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家之一。——译者

历史有可探索的规律性，它不相信我们可以根据这些规律把明天的社会画成一幅图，并根据这幅图调节我们的政治指南针。作为政治运动，它不自封对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任务能说一些权威性的东西。换句话说，它是反意识形态的。它从各个宗教和社会潮流（包括马克思的）借用社会行动的动力和认识。它也有自己的动力和目标，它们来源于社会主义运动在历史上的形成过程，来源于维护弱者以及受压迫和落后的人们的斗争，来源于为实现平等和实践自由的努力。它有自己明显的精神，但它可以根据对社会的进一步分析改变自己的社会观。对许多人来说，现代社会主义的虚弱恰恰在于它缺乏象马克思主义者自认为可以提供的那种有规律性的、包含对未来世界的预计的社会观。1958年下半年，工党原则纲领委员会把一份原则纲领草案提交全党讨论。对该草案的评论表明，许多人觉得，不应当把原来的纲领中“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成长过程”一章删掉。那一章至少是扎实的理论，与此相反，新草案只提出一些关于道德的空话，这些话颇似星期日教堂里给小孩上宗教课时所讲的话。

即使不考虑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的内容和这个理论所包含的决定论（在政治实践中，持决定论观点的人认为，如果让马克思主义规律起作用，大变革可以更快地到来，所以他们为了能让这些规律充分起作用，对社会进步进行反抗），也需要提出进一步的论据，以证明为什么必须拒绝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信念。

如同其先驱那样，新马克思主义者也认为，这个社会是注定要灭亡的，它将由于它自己引起的矛盾而灭亡。

马克思自己是一个被驱逐出国的人，是一个被流放国外的人。他提出了一个预言新社会将会到来的理论，在这个社会里不仅资本家没有地位了，而且社会所建立的各种机构也被铲除

了。为了能理解我们的社会，就要认识到这样一件根本性的事情，那就是，在我们的社会里，社会主义的思想和愿望也落实了，社会主义本身已成为这个社会的一个社会事业。晚期马克思主义者齐声叫喊：“这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化了的社会主义。”他们还说得对哩。社会主义已经资产阶级化了，这是应该的，这正如工会运动已长入社会那样。在最近半个世纪里，许多社会主义因素渗入了社会生活，而1940年以来，这个过程加快了速度。这不光是国家政府、工会运动的力量和社会主义政党的影响的事情。基于技术的进步、人口的增长和繁荣水平的提高，社会的组织更严密了。我们社会的手段比一百年前不知更灵活多少倍，要让社会能起作用，它也应该是这样的。谁要是在考虑今日资本主义时就想到烂摊子、暴力革命或无产阶级专政，谁就是在弄巧成拙。

现代社会主义运动只有在抛弃对现实的认识的情况下，才能使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改造社会的简单化说法。这是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再也不适用的主要原因之一。

新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是生产的不断集中、财富在少数人手中的积累以及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不断尖锐化的矛盾。应该首先明确，这个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最主要障碍之一，甚至就是最主要的障碍。《走向自由之路》正确地把这个问题摆在中心位置。私人财产的分配情况没有表现任何平均化的倾向，而维持着惊人的不平等。它对收入分配起着不利的影响，对以民主方式行使权利构成威胁，并且是实现机会平等的巨大障碍。但它同时也是说明我们社会还是具有同过去一样的资本主义性质的证据吗？

按照马克思主义者的思路，有了资本就可以加入统治阶级，通过占有剩余价值可以使资本成为不断扩大财富的源泉，资本

也是控制国家的手段。在我们的条件下，对大资本的占有还起这样的作用吗？回答在很大程度上应当是否定的。随着股份有限公司的成长，已经出现了更有意义的情况，即对财产的占有和对财产的管理互相分离，打破了对资本的占有和统治阶级之间的原有联系。也许人们还可以认为，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大的资本所有者阶层的很大一部分就是“统治阶级”，然而，不再根据对财产的占有情况领导企业的大企业领导人的出现，已导致新领导阶层的产生并破坏了过去的情形。由于累进税制度等措施限制了人们从财产得到的收入，已经不同时是企业领导人的大资本所有者的影响已大大减少。在最近的几十年中，不同时是大资本所有者的企业领导人被迫把其一部分权力分给大的社会机构及组织的领导人和在规模及影响方面都已大大扩大了的国家机器的代表人物。作为统治阶级的大资本家已变成虚构的东西。与此相反，对大企业经理缺少监督的问题正在日益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资本所有者的发财致富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战后，财产的收入相对地大大下降了。这是起初使股息、利息、房租和地租保持低水平的政府措施的结果。1952年，国民总收入是二百零四亿荷盾，工资总额是九十三亿荷盾，同时，私人财产的收入是十一亿荷盾^①。在此后几年中，财产收入毫无疑问表现了重大的相对增长。然而，扩大资本财富的主要来源是利润。股份有限公司通过保留利润，小企业通过节约，都扩大了自己的财产，从而也就扩大了未来的潜在收入。这里，集中和分散的两种倾向是互相交替地出现的。尽管可以说，在当前的财产分配情况下，已谈不上不断扩大的“剥削”，但是，不平等的财产分配肯定是人

① 《关于荷兰收入分配的若干资料》，中央计划局 1958 年出版。

们试图通过调整基本收入分配的途径扩大雇员收入在国民总收入的份额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一份额在较长的时间内表现出程度很高的稳定性，这是众所周知的现象。这一现象驳斥了财产持续积累的说法。在最近的几十年中，通过不分红而建立自己企业的财产的办法用得越来越多。企业在很大程度上自己解决扩大企业的资金，股东们获得了不断增长的财产的所有权，但因为企业把保留利润变成了一个永久性的制度，这些财产只是部分地作为升了值的股票和更高的股息还给股东的。这样建立起来的企业财产本身就构成了一个机构，它被制度化了。用这种办法，国民财富的大约百分之二十获得了“集体”的主人（即股份有限公司）。伴随着这种发展发生了企业主行为的演变，在最好的事例中，这种行为接近了对公共机构的管理。这时，社会主义运动的任务大大超出剥夺企业主的范围，而变成了对这种公共有限公司的民主管理。

虽然现有财产关系如此不可接受，但它们也并没有阻碍雇员的财富迅速增长。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顽固地认为，马克思关于贫困化的预言是正确的。马克思所指的究竟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贫困化？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共产党宣言》发表后，有人预言说，节约劳力的技术的发展将使工人的工资下降。但所发生的是正好相反的情况。《资本论》说，工人们可以得到技术进步的部分成果，但不能指望这一部分会很大。实际上，工人们获得的部分是很大的。收入差别仍然是人们无法接受的，但对工人的生活水平起决定性作用的并不是现有的差别，而是总的财富的增长。这一点是由以下的情况暗示的：如果按照 1954 年的收入分配情况，把所有挣一万盾以上的人的收入（在没有征税以前和没有考虑各种基金的扣除部分的收入）拉下来，并把多余出来的钱分给所有收入在一万盾以下

的人，那么后者的工资平均只增加了百分之十二。如果把这种情况同所有雇员从1952年到1956年平均达百分之二十的实际收入增长额^①相比的话，就可以清楚看到，就提高雇员生活水平来说，从长远来扩大国民总产值比起重新分配财富更有意义。

此外，这种不可避免地是任意选择的例子也只不过是问题的暗示。但的确应当指出，认为财富的重新分配完全不会带来好的变化的许多说法，一般都忽视了国民收入中被政府占据的部分要大得多，即多好几倍。在我国国民收入中，税收部分已从1938年的百分之十七增长到近几年的百分之二十五。除了直接的救济收入（各种补助、物价补贴等等）外，已增长的政府开支的很重要部分（教育、保健、社会工作、体育和娱乐）也是有益于最穷的人的。

在我们的社会里，国家不是资本所有者的工具，而是可以被用来领导走向更多的自由和平等的发展进程的中央机构。对国家和国家干预的不同看法使马克思主义者和拉萨尔主义者、正统派和改良派、理论派和实践派至今处于分裂的状况。自从实行普遍选举权制度以来，社会党人可以通过议会工作最有效地对国家机构施加影响。在有效的议会民主制度里，政府成了不让阶级利益占支配地位的保证。托尼^②说：“对成百万的普通男人和妇女来说，法律已成为自由之母。”在议会民主制国家里，特别是社会党主张扩大政府在社会和经济领域的权限，与此相反，私人的利益集团不断致力于拆散国家。这种现象的背景就是前面所说的一切。在最近的半个世纪里，政府影响的扩大是一个

① 但这里还应考虑到，1952年每个雇员的实际工资收入还低于1938年的水平。

② 1880—1961年，英国经济学家，专门研究资本主义发展史和平等原则。
——译者

不断出现的现象。这种政府影响使一个提供货物和服务的重要的公共部门产生了，使私人财产的使用权受规章制度约束，创立了旨在实行充分利用生产力的政策手段，实现了对可以掌握的收入得更平等的分配，还奠定了劳动的法律秩序的基础，在这种秩序里，企业主和工人被承认是平等的伙伴。

在美国，联邦政府在国民总收入中的份额从1900年的百分之七增长到了1950年的百分之二十，政府雇员的份额从1900年的百分之四增长到1950年的百分之十二点五^①。在所有的现代国家里可以找到类似的数据。

保守的政府当然可以将如此扩大的政府影响用来损害社会上较弱的集团的利益。但在民主制国家里这种可能性是有限的。艾森豪威尔的几届政府确实取消了罗斯福的“新政”和杜鲁门的“公平施政”的一些成就，但并没有能够从实质方面触动这些政策。英国的各届保守党政府也没有能够推翻1951年由工党政府奠定的福利国家的基础。

因此，经常发生的一些马克思主义派别同反动的小组手挽手地反对维持或扩大政府在工资政策方面的权利，是一场奇怪的表演。因此，社会党的政策也就应当以争取参加有了更大的权限的政府为目标；也因此，新马克思主义者阵营必然要不断发出的关于应当对政府进行反对派活动的呼吁就是对真正的社会关系的否认。

对把国家仍然看作为“大资本”服务的工具的那些人来说，各个社会集团的社会和经济地位的变化毫无意义。他们说，所有没有财产的人客观上属于工人阶级；因为他们是依赖于出卖

^① 参看法布里坎特所著的《1900年以来美国政府活动的趋势》（1958年由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出版）。

自己劳动力的嘛！按照这种说法，中间阶层，即职员、技术员、国家雇员的人数的巨大增长，只能说明马克思的看法的正确性。独立职业者相对减少了，雇员增多了。马克思是多么天才地预言了这一切呀。

所发生的事情事实上完全不同于马克思的预言。虽然受蒙蔽没有自然的界限，但是，要在这一点上相信今天模仿马克思的那些人的诚实，是很困难的。马克思预见，作为技术发展和剩余价值在资本所有者那儿的积累的结果，农民和手工业者将被消灭并加入“工业后备军”，而伴随着这一过程将发生大规模的贫困化。在本世纪，在所有的工业化国家里，就业人口中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的比例都大大减少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发生了一个贫困化过程，所发生的是日益重要的服务部门（政府、教育、保险、艺术、娱乐）的发展过程，随着这一过程，新中间阶层更加发财致富。

新中间阶层的社会地位既不是由于它没有财产，也不是由于它依赖于资本所有者，而是由于它在社会组织中起的作用所决定的。许多人多次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同我们现在的社会关系毫不相干。这里可以举一个来自大家想象不到的来源，即从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朗格教授那儿来的证据^①。朗格说，社会主义社会也有社会冲突，“因为除了有社会阶级之外，还有社会阶层。社会阶级和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别是，社会阶级的基础在于生产关系，而社会阶层的经济基础在于社会组织结构的特殊形式。举例来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是一个阶级，而银行家、商人、律师、神父、国家雇员则构成社会阶层。后者的基础在于组织结构，而不在于生产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

① 参看 1953 年出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的发展中，经济发展所提出的要求和经济政策的方法及政治结构等方面的已经过时的形式之间的矛盾，也能够引起某些很难适应这些变化的既得利益阶层的反抗。但这些阶层并非社会阶级——这儿并没有发生阶级斗争。”

朗格这里就社会主义社会提出的看法，对我们西方的社会几乎完全有效，虽然我不甘愿把我们的社会称为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西方的社会充满着冲突，这里不断有利益集团对社会改革的反抗，但对财产的占有和管理的相互分离、政府已扩大了的影响以及社会组织的成长已使我们的社会丧失了其阶级性。谁现在想开展阶级斗争，谁就是用一百年前的手术刀给病人开刀，以治疗这个病人早已愈合并结疤的伤口。这类手术容易产生致命性的危险，总的来说，它们不能用来解除病人真正的病痛。

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政策的意义主要是历史性的。今天被提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很少包含着可以使人们更清楚认识各种社会力量的因素。它激起过去的情绪并突出地、勉强地企图在不放弃旧理论的情况下，为新的现实不断找到新的解释。正统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循环式的发展总要引起经济危机的；然而，这种危机并没有爆发，对这种情况的解释可以作为上述企图的最新的例子来提出。美国在1949年、1953年和1958年的衰退既没有表现战前的经济危机那样的深度，也没有表现那样的广度。其解释在于国家增加了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对整个经济局面起作用的力量已被控制了。用奥斯卡·朗格的话来说，“经济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作用和它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作用之间的根本差别在于，在后一种社会里，经济规律的作用范围是由社会组织以明确的方式确定的。人们可以让经济规律按照人的意志起作用。”作为社会组织中的变化的结果，特别是作为国家机构中的变化的结果，西方社会已有可能比以前更好地控制经

济局势的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者方面对持续的高速发展的独特解释(战争经济、为社会动乱的恐惧、经济帝国主义)是多余的。

一味抓住过时的假设不放的恶果是，它使人们丢掉了发现真实情况的机会。坚持上一个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概念，使新马克思主义忽视了当代的重要的政治矛盾。西方的防务，东西方关系，援助不发达地区的问题——它们都被马克思主义者的经济主义所歪曲。如果把财产和收入的更平等的分配、对大企业的民主监督、雇员的发言权、平等机会的创造、文化和教育在整个人口中的普及、各种民族的同化、落后地区的繁荣，简言之，如果把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大任务置于阶级斗争和反对垄断资本的斗争的范畴之内，那么，必要的、持续不断的社会改革也就受到阻碍。以坚信必须被捍卫的成就的价值不低于必须被争取的改革的价值这一信念去完成社会主义运动的任务的事业，同样是一个伟大的事业。

工党新原则纲领里的经济问题 ——在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之间

(1960年)

把经济问题这节从工党新的原则纲领^①中拿出来单独讨论，不是没有风险的。这样的讨论容易为认为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本质在于对社会经济结构进行改革这样一种可以常常听到的误会提供根据。经济改革是社会主义纲领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纲领的本质却寓于其他一些方面。这种本质可以在对各种生活领域的问题的统一解决办法中找到，人们已经认识这些问题的相互联系和互相交织在一起的情况。

只有通过统一的解决办法，人们才能够避免“经济主义”，即把一切社会问题都归结为经济问题的方法，这种方法过去往往阻碍了社会党采取富有成果的措施。只有通过一种统一的解决办法，原则纲领才可能超过试验室的蓝图水平，换句话说，超过乌托邦主义的水平。因此，新的原则纲领正确地把阐述社会的一般原则和政治体制应当达到的要求的一段内容，放在经济问题一节的前面，而在讨论社会经济秩序以后，接着描述了我们文化和国际社会的看法。

这意味着，新纲领把对生产和分配进行有计划调整的要求同对民主的可监督性和摆脱官僚主义的要求一起提出来了。它同样意味着，在国家一级集中经济决策的程度，必须同我们实现

统一的欧洲社会的愿望相平衡。对进一步的社会化的有效性的评价，不能离开“不断关心各个集团和每个人的责任”。雇员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发言权和自治权必须置于文化政策的背景上来考虑，这项政策既标明创造性的本职工作，又标明创造性的业余活动的界限和前景。在经济、文化和国际政策中，竞争作为调整秩序的原则，有时使各种力量发生互相对抗、有时却互相补充；假若要在竞争和合作之间划清界线的话，就重新需要承认各种不同的社会领域和在其中起作用的力量之间的相互影响。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社会主义运动曾详细总结过自己的争取民主的目标和方法、自己的机构以及自己的准则的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说，上述的一切都不是新鲜东西。抛弃作为夺取政权手段的阶级斗争，意味着接受在半资本主义的或完全资本主义的社会中存在的发展的可能性，这样一来，建议对经济改革进行民主效果方面的监督这种看法，也就在原则上被提出来了。1945年以后，无论由于社会的变化，还是由于被强加于自由世界的斗争，这种监督已获得更大的成果。

新的原则纲领在第二十六条中谈到，“在已改变了的社会中也仍然存在强大的资本主义力量”。这样，社会经济秩序就被摆到在经济制度中已发生的变化背景上。

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些重要因素已经消失。同时也是生产资料占有者的企业主的权力地位已经瓦解。在长期的斗争中，工人已经获得了权利，劳动时间缩短了，劳动条件都有法律规定了。繁荣程度提高了，贫困被击退了。当他们不能劳动或者必须少劳动的时候，一种广泛的社会保险制度确保了工人们最低限度的生存条件。特别是因为政府重新分配了国民收入，以致

① 指1959年的工党原则纲领。1977年10月工党通过了新的纲领。

收入较低的人可以分享他们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得不到的福利待遇，国家的财富已经分配给广大群众。在战争之中和之后，许多新的见解已经导致政府有意识地去承担提供就业机会和确保生活的责任。政府已经掌握了一些权力和手段，来大大地稳定经济发展，并从而确保就业机会。在战后的体制中，再也没有发生深刻的危机，这种危机曾经在历史上是资本主义最主要特征之一，并且曾造成大批人失业。历史上的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性质遭到了成长起来了并走向独立的前殖民地人民的谴责，在国际资本的往来中，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所起的支配作用也使帝国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已成往事。

资本主义的另一一些特征仍然存在：特别是在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存在着生产的无组织状态；财产和收入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别；不受监督的权力被集中于大企业的领导人手中；一些人为了谋取私利牺牲社会的利益。当然，衡量资本主义势力继续起作用的程度和与此相对立的社会主义力量及成就都是主观的事情。我们今天的社会表现出许多与历史上的资本主义不同的特征，人们进行了各种尝试来给它确定一个正确的名称。伯纳姆谈到了这是管理者的社会，英国的社会党人克罗斯兰建议把它称为国家主义，即由国家支配的社会。弗拉蒂耶提出的是服务社会，即一个以其意义日益重要的社会服务工作和以提供这些服务的人的支配作用为特征的社会。运用最多的是福利国家这个术语，它指的是拥有大量的社会福利设施的国家，即国家愿意为人民的福利负责的社会。一个特点是，这些叫法中的绝大多数都反映出人们都试图说明国家的意义已经大大增长。在这种情况下，继续谈论“真正的”资本主义是否还有意义，只是一个具有次要意义的问题。为了使历史概念保持纯洁，可以拿出许多理由来为反对以那种方式使用资本主义这个概念的做

法进行辩解。

同时，不应忽视，在五十年代下半期中，到处都出现了对福利国家的成就的尖锐反应。这种反应的部分目的是恢复战前的关系，但是，它的主要特点是削弱政府和工人组织的影响的愿望。如果没有福利的进一步普及和大企业的民主化，削弱政府的影响必然意味着要限制政府的影响，这则有利于强大的经济集团，从而也就使我们社会中的资本主义力量重新复活。目前，在美国和西欧国家里都在进行争取限制私人企业主的权力和继续使经济民主化的斗争。能否说或者在多大程度上能说资本主义有意义的问题将取决于这个斗争的结果。我认为，由于提出了关于“在已改变了的社会中也仍然存在强大的资本主义力量”的说法，新的原则纲领是在现实的基础上阐明问题的。

为了征服仍然很强大的资本主义势力，纲领阐述了一整套方法。其中，进一步的社会化，即公共部门的扩大，具有自己的地位。在新的原则纲领中，社会化并不是无条件地受到赞扬的。它只是许多不同办法之中的一种办法，它的有效性将一再地需要受到检验。社会党人对这种方法的重要性没有一致的看法。人们对于经济体制必须为之服务的经济项目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有人认为，通过社会化方法本身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因而必须进一步阐明应当用什么样的方法管理已经社会化的工业，也必须进一步阐明，在已经社会化的企业方面，应当执行什么样的投资、价格和工资政策，对于这种认识，人们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致的。但是，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始终存在着这样一种流派，他们不相信，在没有对工业、商业和交通方面的主要生产资料进行社会化的情况下，经济权力地位是可以受监督的，财产占有关系可以改革，发言权可以付诸实施。然而，大规模的社会化又带来很不利的条件（由政府赔偿损失，经济权

力集中了),以致人们必须具体权衡继续实行社会化的利弊。在我们的社会里,有着自己的思想情绪和动机的私人企业部门仍然超过公共企业部门,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是,如果要我们强调动机和思想的话,那么这样的事情同样是正确的,即不通过对财产的社会化来实现生产过程的社会化,也确实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事情。对经济秩序的调整和发言权制度的建立已经在促进朝这个方向发展。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对手们很喜欢谈论缓慢的社会化或向前爬行的社会主义。只要这种说法指的是在迫使政府在管理生产资料时,首先应照顾公众利益这件事,那么这种说法也就是我们要努力达到的目标。如果我们可以不通过象社会化一向意味着的那种深刻行动实现这一目标,那就更好了。但是,有人从原则纲领的新提法中得出结论说,工党已从它的武库里抛弃了社会化。这种说法表明了这些人的阅读能力特别差。至于一些党员由于热衷于维护老一套而促使人们产生误解,这正是对社会主义运动中左的倾向的作用的自我讽刺。

那么,纲领提出了哪些方法来铲除我们社会中的资本主义因素的残余呢?那首先是“在国内和国际上,有计划地建立生产和分配方面的秩序”。这种秩序的建立并不意味着政府包办经济生活中的一切事情。它也不意味着政府对投资、生产规模、生产方式以及价格作出详细规定。认识和经验已经导致了这样的结论,即在政府作出一些关键的经济决策的条件下,实现稳定的经济发展是可能的。政府应当作出决策的方面是消费和投资之间的比例、工资总额、政府和私人投资的比例以及价格水平和工厂的厂址。这就包含着这样的情况,即除了政府要作出决策以外,还有让各企业作出决定的余地,也就是进行竞争的余地。在这样的经济秩序中,也有消费、职业和企业几方面的自由的余地,尽

管这种自由不是无限制的自由，因为政府直接地或者间接地把这些自由纳入自己能够控制的轨道。

在理论上，有关政府在经济生活中调节秩序的任务方面，西方世界主要政治流派并没有重大分歧。但是，我们在政治现实生活中却看到了人们不断地致力于破坏和实际上取消政府调节经济秩序的权力，社会主义运动因此也就处于争取维护和改善可用来调节经济秩序的手段的不断斗争之中。在这场斗争的背后，人们可以看到，在对有意识指导我们社会的经济活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认识方面存在着更根本的分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社会主义运动就已经使关于计划的思想具体化，现在，它正在把这一思想扩大到国际范围，并正在把经济计划的思想同我们社会其他部门的计划统一起来。有计划地调节经济生活的秩序正在受到私人大企业的权力地位的威胁，看来，在即将到来的时期中，围绕着社会改革的斗争正是将集中到这点上。

在我们今天的经济生活中，决策的重要部分是由大企业中小一批掌大权的经理和经济董事作出的。这一小批人仍然表现出小宗派的一切特性，它们是我们社会中的闭关自守的集团。这种情况是完全不能被接受的，因为从长远观点来看，它是我们有计划地调节经济的道路上的障碍，因为它是对我们企业内的民主的一种嘲笑，因为由于存在这种不受监督的权力地位，我们社会的收入差别一再地被扩大了。因此，纲领在第三十条中指出，必须对最重要的企业进行结构改革，以致除了实现向该企业提供资本的人的利益以外，也实现工人们和社会的利益。

正如维亚蒂·贝克曼基金会^①关于企业改革的报告所记载的那样，这意味着，必须建立一种使劳方、资方和社会几方面至

^① 荷兰工党理论研究机构。——译者

少能平等地商定应在哪些方面作出决定的大企业管理形式。从三种意义上来说，实现这种改革将可能意味着对生产过程的重要社会化。第一，使企业政策面向国内和国际经济目标的努力将更有保障，私人和社会的利润可以经常被拉平，从而使老社会党人确认的在为需要而生产和为利润而生产之间的矛盾得到克服。第二，在生产的领导中将出现责任的被分散和对决策的民主监督，这样做将使私人和社会生产之间的旧矛盾变得空洞了。第三，由于使政府和雇员们参加企业领导，就可以结束大企业中向一些人提供高收入的情况，这种高收入既没有经济根据又没有社会根据。从形式上看，这种高收入是对(经理)向企业提供的领导和对(董事)向企业提出的建议的报酬，因而也是劳动中得来的收入。实际上，这些收入是以垄断主义和寡头政治的关系为基础的奖金，它因此也就构成了晚期资本主义结构的一种典型因素。

原则纲领所主张的对企业生产的改革可以导致社会化。这种改革是否将导致人们达到所谋求的目标，取决于政府、企业领导人和雇员们在新的结构中所实行的政策。任何社会结构都不包含对一种公正社会政策的保证。在已经完全社会化的企业生活的基础上，也可能出现巨大的收入差别、对集团的和地区的歧视、剥削和僵化。为了能建立更人道和更公正的经济体制，社会改革只能消除现存机构中所存在的障碍。原则纲领中已经被修改了的关于社会化的提法表达了这种认识。

对财产的更公平的分配也同样是构成实现更公道的经济体制的条件。现在的分配方式是以财产集中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为特征的，这种分配方式是收入不平等、在资本占有基础上行使私人权力、机会不均等和各种各样的特权继续存在的根源。应当通过限制遗产继承权和提高对大笔遗产的遗传税来实现对财产的

更加平等的分配。在我们现在的制度中，最奇怪的现象之一是各种人“不通过劳动”而获得的遗产收入每年约达七亿荷盾，而为此需要支付的税却平均不到百分之十四。同对劳动收入的征税方式相比，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歧视，是继续存在的极端不平等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另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对用私人财产得来的收入不征税的情况。估计在过去的十年中，一个人数相当有限的财主集团由于这种情况所获得的财产约达一百亿荷盾。除了实行更正确的征税办法外，必须通过使全体工人对在企业中建立起来的财产拥有所有权，来实现财产的普遍分配。在最近几年中，仅仅是在股份公司里，就有利润中的大约二十亿荷盾被分配给股东们。如果这笔钱的重要部分被用来为雇员们造福的话，那么，对财产进行更合理的普遍分配的前景就变得可盼了。

对秩序的调节、对公共部门进行有意识的指导、改革企业和普遍分散财产都是为了建立这样一种经济体制，在这种制度下，更多的平等将伴随着更大的繁荣，同时，广大人民群众目前还如此极其有限的发展机会将获得更加丰富的内容。更大的繁荣和更多的平等会产生自己的问题。在一个物质上更加平等的社会里，等级的差别是不会自行消失的，这时仍存在着出现建立在不同于财产占有的其他基础上（例如在追求名利地位的基础上）的新等级制结构的危险。更大的繁荣不能保证创造性劳动不再受不断破坏，从而也不能保证职业劳动的非人道化。企业生活的精干组织可能是调节秩序的一种理想手段，但是，它不能保证消费者不受剥削。所以，新的原则纲领也就反复地谈到了分散和监督责任的问题。也就是说，这种经济体制把有计划地领导生产的社会责任同促进个人主动性相结合，它从法律上承认公共企业组织，同时又把它同加强消费者地位相结合。

如果要对在技术和变化多端的动机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经

济生活秩序进行有意义的调节的话，就必须从更多的角度来看待它，这些角度是：有效性和民主、平等和生气勃勃的成长、劳动精神和消费者的利益。新的纲领包含着这样的多元主义的解决办法，这种办法可以避免教条主义。这个纲领勾画了进一步进行结构改革的轮廓，同时也起了防止机会主义的作用。

生活的质量

(1963年)

改变了的出发点

战前社会主义纲领^①中的许多主张，在战后的发展中业已大体上实现，这是众所周知的。充分就业、社会保险、改善劳动条件、权利平等和提高生活水平，这一切在所谓的福利国家中都有了改观。这一社会发展是在大战前和大战中进行思想上的准备的，并在1945年之后，在没有发生革命动荡的情况下实现的，它确实十分恰当地被称为“静悄悄的变革”。

《走向自由之路》这个纲领是社会党人的尝试，其目的是越过战后恢复工作的范围，探讨世界上是否产生了新的文化形式和另一种世界关系。

的确，世界关系业已改变。在新的力量平衡的范围内，人们更加重视共产主义和自由世界之间的经济政治较量。殖民主义的没落和数十个年轻国家的崛起给世界力量对比增加了新的因素；在中立国家的态度和克服世界上的繁荣差别的努力的结果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不发达地区的援助已成为当代的社会问题；只有在有组织的世界经济的范围内，这个问题才能解决。

国家之间和人民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常常使各国国内问题退居次位。欧洲一体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对有关国家人民

的繁荣水平和生活保障,产生了决定性作用。

在这些变化的背景下,应当使国家政策适应完成国际任务的要求。这意味着,荷兰的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必须考虑到荷兰作为共同体成员国的责任。这也意味着,荷兰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应当使荷兰能够对减少世界上的繁荣差别,作出有效的贡献。鉴于世界上各种关系,荷兰国内穷富差别的情况和私方使自己利益服从社会繁荣的诚意如何,这些同样都具有重要意义。我在下边将努力试图指明一条能使一个国家获得更大繁荣的社会发展道路。我这样做是为了让荷兰能够对维护世界自由的事业做出贡献。对国际关系的观察表明,社会主义原则和出发点远远没有实现。在对目前的事态发展进行批判性检验时,可以立刻看到它们在国内范围的意义。

西方社会日益繁荣

西方社会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变化是繁荣的持续增长。尽管有1952年和1958年的经济衰退,从1950年以来,我国按人口平均的实际国民收入仍然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以上。这个数字只说明了繁荣增长的部分情况。特别是由于社会保险的扩大,繁荣的分布更加广泛。失业几乎完全消失,因此,生活在最低生存标准边缘的一批人也消失了。许多消费品的质量提高了。劳动时间缩短了,业余时间更多了。劳动条件在许多方面都有了好转。教育事业的规模扩大了,在某些方面,教育质量也提高了。三十年代的社会是闭关自守、自我纠缠和有大量失业的社会,而六十年代的社会十分需要劳动力,青年人有机会学习和晋升的机会,

① 荷兰工党于1935年制订过题为“劳动纲领”的纲领性文件。——译者

真想不出有比这两个社会之间更鲜明的对照。

这里有意把过去十年的繁荣增长和社会发展说得好一些，因为本文要研究的恰恰是当前的繁荣增长的不足，而所使用的标准是自由和平等。在目前情况下，货物供应和服务行业的扩大带来了朝着更公道的关系的发展、更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以及个人和集体的更强烈的责任感。有些人似乎认为，消除残余的社会弊病只是不断扩大繁荣的事。他们认为，我们的混合经济体制——它包括自由企业式生产和其收入大约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五的公共企业部门——消灭贫困和短缺的残余，只是时间问题。根据这个观点，我国目前的结构中的内在力量，将努力追求更大的平等、权力分散和扩大个人发展的机会。但是，这样一个问题被强烈地提出来了：不符合标准的繁荣增长，或者说得更明确些，不比现在的社会秩序更有针对性和调节得更好的实际人均收入的增长，能否导致更大的繁荣和更加合理的关系呢？

福利国家的社会主义因素

关于现存的社会秩序的可取性的问题，只有当把该秩序放到国际关系的范围内，才能解答。不能脱离高度工业化的西方社会在六十年代的状况，来看象我国这样的小国家的社会体制的作用。在世界政治关系中，福利国家的成就的价值，首先取决于这些成就对更公道的世界关系所能起到的促进作用的程度。工业化社会的繁荣的持续增长和不发达国家的繁荣的缓慢增长，都同样给人们以深刻的印象。战前，工业化国家的平均生活水平比不发达国家的高四倍；而在战后的发展中，这个差距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幸亏克服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距的问题引起的重视已大大加强，以开始克服这个鸿沟为目标的政治和经济活动，

特别是由于美国的贡献,也日益重要了。

但是,如果把发展援助只看作是贡献资金和人力的事,那就错了。有效的援助政策不仅对工业化国家的现行政策,而且也对它们的经济结构会产生反作用。首先,富国的内部结构应使下述做法成为可能,即要通过征税获得有效的援助计划所需要的大量资金。要实现这一点,光靠政府和简单的决定是不够的,因为在大多数福利国家里,目前的税收水平已经引起人们的强烈反对。毫无疑问,如果公共援助用掉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二十的话,那么,这将波及社会制度的许多方面。第二,有效的发展援助是以工业化国家愿意调整经济结构为前提的。只有发展中国家参加工业化进程,并生产目前主要或仅仅在工业化社会中生产的货物,援助才可能长久。工业化国家应当愿意把自己的市场向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品开放;这有时会导致工业化国家本身不得不对生产制度进行困难的调整。

把世界关系中的社会问题摆在首位,并不意味着西方国家社会问题都得到了解决。相反,应当指出,特别是在过去几十年中,不管取得了怎么样的进步,十九世纪的最大弊病有些仍未被克服。收入差别只是慢慢地缩小,而且仍然很大。事实表明,关于在战后的事态发展中引起突破并大大拉平了生活条件的拉平过程的广泛议论,多半是建立在表面观察的基础上。情况的确不断变化,这些变化导致了全体人民在社会生活起点上更加平等。教育事业的扩大对此作出了最重要的贡献。税收政策、工资政策和社会保险,对磨平不平等的最锐利的棱角作出了贡献;但是,绝不能说,生活条件已经非常平等,社会主义运动的奋斗目标已经实现了,即一切人已经基本平等。导致生存机会严重不平等的一些最主要的原因依然存在。财产分配的不平等几乎没有减少;财产继承权的作用对某些人明显有利;国家财富的增

长集中在较少数几个人手里。在欧洲市场范围内，不受监督的经济权力的集中，似乎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

能够在企业界和我们社会体制的各个大的机构中获得领导职位的，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那些传统的特权阶层。

尽管做出了许多努力来改善工人子女接受科学教育的状况，但是和战前相比，这方面简直谈不上有什么改善。目前，有强大的势力力图维护现存的特权地位。现有的一整套财政、金融和经济手段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这些努力。

在繁荣增长和与之平行的改善社会状况的过程中出现的新的事态发展，要求对其内部发生这种繁荣增长过程的社会结构进行检验。

私人收入的增加和群众性宣传工具的普及来势凶猛，使公民改变了对社会的态度。人们强烈要求也能按照不久前看来还只是少数人才能有的生活方式生活。不管这个要求是多么可以理解和令人欢呼的，它却导致了对耐用消费品、旅游和娱乐以及更好的住房的强烈追求；简而言之，导致了对不久前还未曾体验过的发展的强烈追求。要满足这些需要，就要求大规模扩大社会的各种设施，而建设这些设施的基金有很大一部分应来自公共事业费。这方面却出现了严重的障碍。在政府和私人提供的劳务方面，有时可以看到比平均繁荣水准较低的时候还要大的缺陷。住房的扩大没有跟上对新住房的需求，这种需求是人口增长、特别是人口组成的变化和其他生活习惯的出现所导致的。对符合其他生活条件的住房的需要没有得到满足。贫民窟里也常常摆着代表一定生活水准的耐用消费品。在对病人和残废人护理这种社会性服务中，存在着严重的缺陷，特别是同奢侈品的超额供应进行对照的话，这种缺陷使人十分痛心。公共交通运输大大落后于私人汽车交通运输的发展。公路建设赶不上日益

加剧的交通压力。交通警察的工作也落后于日益发展的交通所带来的需要。

卫生保健事业的改善带来了平均寿命的不断延长。老年人在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增加。

改进卫生保健事业的一个结果是政府建立了昂贵的设施来照顾越来越多的需要照顾的老人。教育的扩大——也许是我们现代社会中最有革命性的因素——带来了另一种生活方式：夫妻都会讲外语的家庭，他们都认为到国外旅行是理所当然的，他们要求有更宽敞和更好的住房，有私人汽车和利用业余时间从事娱乐活动，简而言之，是一种使自己生活可以发展得更加充分的生活方式。

人们没完没了地重复说，劳动时间的缩短造成了人们更加需要一些设施，以便能够更有意义地利用业余时间。不管是建设第二个或第三个电视网，还是大规模的造林、改善公路、建造联合会大楼或体育设施，都属于这种需求。但是，业余活动和它所带来的物质好处，也受到不能满足需要的公共设施的压力的。

不协调是正在发展的社会的特点。在私人可以支配的收入分配中，存在着巨大的不平等；在一小部分可以私用的收入方面和用于公共设施的收入方面，也存在着分配上的不平等。在福利国家里，政府致力于充分就业，也主张使现在的收入分配状况保持不变，这样的国家不应当是最终目标。所需要的是能够控制繁荣增长的内在力量并使其以扩大共同福利为方向发展的措施。

如果归纳成一个简单的公式，就可以说，我们的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确保了持续不断的繁荣增长，但是没能在这种发展中，实现社会的公正和个人及集体的和谐的发展。人们只能在自由和同更大的共同体的团结一致之中实现自己的本质，新

的关系应当根据在社会主义思想中始终处于中心地位的这样一个观点来检验。这种更大的社会共同体的来临已经离我们更近了,我们必须在国内和国际上实现它。

新关系下的旧目标

非常说明当代特点的繁荣的增长倾向于掩盖我们社会的缺陷。因此就更加有必要用个人和社会的自由的发展水平这个尺度来衡量当前的发展。《走向自由之路》在五十年代初提出的目标是:

以相当的生活水准和合理的收入分配作为生存保障;

行使权力的人必须承担责任,权力的集中不能超过完成任务的需要;

每个人应有同等机会来在社会里发展自己的个性;

建立一种扎根社会的文化;

建立一个有秩序的国际社会。

这些目标依然有效;但是,它们赖以实现的社会条件却发生了变化。消除不平等和排除阻碍平等发展机会的社会和财政障碍的必要性,依然如故。在权力的行使没有受到充分监督的地方,应当创立适当的责任制,这样做的理由绝不比当初提出这一目标时少。但是,这些目标的实现必须是在这样一个社会中进行的,在这个社会里,生活水平大大高于战后恢复阶段,收入的使用比收入的获取更加重要,国家必须根据国际关系来制订自己的政策。

在目前情况下,怎样才能建立一个能够实现社会公正、经济稳定发展有保障、公共设施发挥良好作用、民主机构对技术经济的发展起领导作用以及在发展和享受文化方面存在平等机会

的社会呢？

只有研究了现存社会秩序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关于自由和平等中的发展这一基本要求，才能回答这个问题。

社会主义思想的出发点始终是要使生产满足人们的需求。不是为生产而生产，而要使生产力从属于人类在精神和文化上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马克思所说的“自我异化”指的是人同自己本质的异化，这种异化是在这样的生产过程中发生的，这种生产过程的目的是满足人类的生活需求，它本身已成为目的，它的目标是利润、金钱和权力。只有在劳动被视为人类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的一个因素，并能够被体验为旨在克服困难和短缺的共同努力的一部分地方，才有可能铲除这种自我异化。

在一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的影响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得人道了，它比较多地以满足生活需要为目标。实现这一变化的方式——制定劳动法、实现社会保险、实行政府的明确的经济政策、建立秩序——无须赘述了。另一方面，社会主义认识到了，提高生产和扩大繁荣的价值在于它们是更好地满足需求的条件。

由于技术发展和人口增长——西方社会经济进步的巨大动力，根据需求来调节生产这个老问题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西方社会进入了大规模消费时期，广大民众买得起耐用消费品（它们并不直接属于生活必需品），并逐步参加到奢侈品消费中去。这个时期的特点并非不再有贫困了。在美国，在有些部门，奢侈品的消费已经达到了荒唐的地步，“垃圾制造商”如果说不是控制消费状况，也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消费状况；与此同时，在美国却有三千万人，也就是居民的百分之十五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国家的生产力足以使每个公民达到合理的生活水准。不管繁荣是多么相对的概念——它是需求和用以满足

需求的手段之间的关系,在说明目前时期特点的时候,有一个客观因素可以并且应当被用来作为标准。如果经济增长的进步已足以保障每个公民有较高的生活水准,那便应当有意识地利用繁荣增长使个人和社会获得最大好处。“在福利国家里,经济上的问题是要在不顾生产什么东西的情况下使生产机器保持运转的问题。但是,这些国家的重要问题不是经济问题,而是如何为全民福利服务的政治问题。在这方面,计划是最主要的手段。”^①

只有当生产力的发展方向是这样的,即它消除了富裕之中存在着贫困的状况,才能在原则上克服资本主义的状况。

只有当在要进行的劳动和社会对劳动成果的使用之间建立了一种关系的时候,才有条件来克服自我异化,或者更确切地说,克服目前经济体制中大量劳动的盲目性。根据目前的技术和组织能力的状况,在扩大国民生产的意义上进一步扩大繁荣,看来几乎是确定无疑的。国际上的不景气可以使经济增长的速度发生波动,但是,在二十五年内把生活水平翻一番看来是做得到的。但这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水平呢?在缓慢增长的有关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的数字中,电动牙刷和护理、长效镇静药的广告费和剧场门票价格、董事们的津贴和盲人的补助金,都一样重要。按每人平均的实际国民收入的增长本身并不能保证精神繁荣和生存质量的改进。在工业国家目前所进入的经济发展阶段,社会主义政策表现为在如何使用增长的财富问题上的明确选择。

按照历史上的资本主义概念,供货者完全是为了满足有利可图的、有购买力的需求而进行生产的。与此相反,计划经济的基本思想是要目标明确地对销售和支出的方向施加影响。从技术上看,我们可以多生产一些产品,我们生产体制的内在力量则

^① W.H.费里:《富裕生活的俘虏》,1962年出版于纽约。

决定把它们投入市场的地点和形式，这往往无助于减少发展中地区的困难或提高工业化社会的公正、战斗力和文明的水平。只有通过计划经济才能防止发生这种情况。

现在已开始的繁荣时期使得人们有可能而且有必要把注意力从生产转向花钱、从生产者转向消费者。在以第一次工业革命为开端的历史进程中，生产的职能和生产者的利益一直居于统治地位。社会主义运动尽管在思想上同合作运动很接近，但它仍然未能摆脱生产者的利益对自己的束缚。看上去，只是进一步的繁荣和业余时间的增加，才为一种面向作为商品和服务使用者的人的新方针，提供了余地。对消费者问题的兴趣，尤其是对工会运动问题的兴趣，是正在发生的这种转变的特点。把它说成是由贫困经济向富裕经济的过渡是不正确的。后者只代表着美国经济的表面现象。但是，现在确实已经有理由去打破资本主义制度下如此严重存在的为生产而生产的倾向。本文的目的就是试图要求人们首先考虑把生产什么、为谁生产以及使生产规模从属于这两者这三个问题的意义摆在首位。它是力求系统考察今后年代中的需求、说明在这些需求中应优先考虑的事情以及最后指出实现所建议的预算计划的途径和方法。

在目前这个时期中，使生产重新面向需求也许同过去实行的旨在保障高水平就业的明确的政府政策，具有同样大的意义。事实上，指出这后一条道路的凯恩斯，也已经就繁荣在技术进步基础上的进一步增长的社会前景，发表了如下看法：

“……我们将能摆脱许多虚假的道德原则；它们跟随了我们二百年，并使我们把许多最可恶的人类特性奉为最高尚的道德。这样，我们就有可能摒弃我们不惜任何代价维护着的各种社会习俗、做生意时的经济手腕以及企业中的各种奖惩制度。”^①

^① 凯恩斯：1931年出版的讲稿。

有计划的经济的发展

上述观点的含义并不在于社会发展已使提高生产、保持充分就业和控制总的经济局势失去了重要性。西方社会并不处于可以允许自己丧失生产能力的地位。世界上许多地方的基本生活需要远远得不到满足，而美国的钢铁工业多年来只有一半开工，美国的失业率有长期保持在百分之五至六的危险，这是西方的耻辱。这个情况倒是加强了论点，即所有工业国现在比过去更应当改变其生产方向。

对不发达国家的有效援助要求充分发挥现有的生产力。其重要性可见于下述事实：在1959年和1960年两年中，美国未加以利用的生产能力至少相当于二千亿荷盾，这相当于已用在发展合作上的款项的许多倍。如果不重新制定西方生产方式的基本方向，那么，克服西方世界的内部矛盾和浪费现象，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鉴于苏联集团的国家在经济上的迅速增长，这种调整也是必要的。这些国家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本身是令人高兴的。但是，扩大西方国家向落后地区提供的经济援助的规模，以能够防止这些国家被迫去乞求苏联的经济援助，对整个西方和民主来说都是有利的。

人们正确地把穷国和富国繁荣之间的鸿沟称为当代的社会问题。这正如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问题。在没有对十九世纪社会的生产和分配结构进行根本性变革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对富国生产结构进行根本调整和根据明确的计划使用这些国家的国民收入的话，目前也不能解决世界关系方面的社会问题。

鉴于发生综合性的经济衰退的危险将继续存在，这种对经济增长的有计划的领导也是十分必要的。海运市场几年来已经出现了供大于求的状况。战后建立的油船队中有一部分已经被弃置不用。在国际造船业中，有明显的迹象表明，造船能力日益过剩。航空事业在同由于运输能力扩大得太快而产生的危机现象作斗争。西方农业在为处理剩余产品作斗争。在能源供应方面，新能源的出现给煤矿带来了严重的困难。这一切都说明过度投资和经济下降可以造成危险。面对这种情况，西方世界在国际上没有足够的应付手段。

荷兰在这方面尤其脆弱，因为它的经济非常开放，进出口总额加在一起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1960年)的百分之七十七。荷兰的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出口的可能性，也就是取决于世界贸易的发展。

如果人们主张有计划地领导经济增长和根据有意识的选择来使用国民收入，那么这不仅是为了尽可能好地满足需求，而且同样是因为这样做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和保障就业机会。为此，有必要协调国家预算计划。实现欧洲范围的协调，是欧洲委员会的首要任务之一。欧洲的社会党的纲领在这方面提出的关于建立一个欧洲计划局的要求因而是合理的。

生存质量问题的一些方面不仅包括要使生产以满足最紧迫的需求为目标，而且包括在此范围之内实现尽可能高的生活水准和充分就业。关于必须明确确定在繁荣增长情况下，应首先在哪些方面花钱，这方面的主张并不是为了反对普及可以使人们生活得更舒适和更方便的商品而提出来的。电视机和汽车本身是很好的东西。但它们是可以被滥用的，这同其他更容易买得到的耐用的和不耐用的消费品也可以被滥用的情况是一样的。特别是小汽车的问题，应当注意到，它一般不仅是有用的和灵便

的交通工具，而且特别适于作娱乐之用。在美国可以看到这样一种事态发展，即上下班方面，公共运输的意义有所增强，而小汽车愈来愈多地被用于娱乐。

上面的论述并不是反对普及典型的同繁荣有关的商品，而确实反对让下述情况任意发展，即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不平等被扩大以及奢侈品的浪费和许多社会福利的贫乏形成鲜明对照这样的情况。

如果主张把这些福利设施摆在优先地位，那就意味着要为了扩大公共福利去减少私人消费。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在私人生活领域中，更确切地说，在家庭中，存在着严重的困难，特别是在那些低收入的家庭（老人、领养老金者、中间阶层和从事副业生产的农民、收入最低的工人、上学子女多的家庭和残废者）情况更加困难。但是，不加区别地扩大私人消费一般恰恰不会使这些人得益；而扩大社会福利设施所创造的可能性，至少特别可以使这些人获得好处。

扩大公共福利设施是否意味着要对消费自由进行无法接受的损害？

人们普遍认为，政府可以通过其税收和开支政策干预私人的消费选择，但是它必须尽可能克制自己不去损害消费自由。

这种思想是建立在这样的设想之上的：在政府不插手的地方，消费者可以自由选择。正如我还将进一步阐明的那样，在现存的经济体制中，消费者的选择自由受到其收入水平的限制，因此，政府通过提高累进税和收入补贴，恰好可以扩大选择自由。此外，操纵着广告、价格和产品差别的生产者的优势，通常严重限制着消费的自由。

消费自由很简单，它可以显示出个人的自由和禀性。这种自由应当受到公正的要求的限制；在目前的生产关系下，不能过

高估计这种自由的意义。

总而言之，我们因此主张，对国民收入增长部分的使用，应以下述原则为目标，

一、在保持充分就业的情况下使经济进一步增长；

二、使现有私人收入分配进一步平等；

三、把资金平等地用于家庭和社会机构；

四、从国民经济增长额中抽出一部分，并把它转移到欠发达地区，以促使生活水平进一步拉平。

福利国家的贫困

(1965年)

这篇研究报告是围绕我们社会的贫困这一概念的若干错误解释而展开讨论的。这些错误解释也是对繁荣的错误解释，因为两者互有联系。这是1963年对阿姆斯特丹市最低收入者生活情况的调查报告。

那次调查所提出的基本问题不是现在条件下还有没有人挨饿、存在不存在营养不良现象、还有没有人衣衫褴褛、有没有人住在破旧房屋，一句话，还有没有过着缺少最必需的东西这种传统意义的贫困生活的人。该调查报告选择了另一种出发点。该调查以一批低收入者为出发点，调查了他们的家庭收入有多少，接着进一步调查了这些人的活动习惯、愿望和看法。通过这样的做法，问题的提出就转移到了贫困概念的实质和它对认识社会问题的意义上。

总的说来，报告得出的结论对前途是忧心忡忡的。从严格的物质意义上来说，尽管很少存在贫困，或者说不存在贫困，但是事实表明，低收入者的发展机会特别少。他们用钱不合理，他们自己及他们孩子没有远大的抱负，他们脑子里充满了社会不公正的认识和关于他们要过二等的生活并无权选择头等生活的思想。

对低收入者的活动习惯的调查应当赋予什么样的意义呢？

这次调查不是为了考察遗留下来的传统意义上的贫困的规模。它不是对低收入者在社会上的比例的调查。调查的出发点是居民中经济上活跃的人，而且是其中最“正常的”那批人，即孩子还住在家里的家庭。因此，它也不是对贫困的表面现象的调查。在当前的事态发展中，制定社会政策的人都对它很感兴趣。

应当老实承认，福利国家还有“沉默的穷人”，这是一个使人感到有点可怕的概念，因为它使人们想到一些贫穷而正派的人，这些人在圣诞节前夕，通过一些报刊或委员会的募捐活动得到一些小礼物。这些穷人是教育不够和顽固的等级意识的产物，这些穷人也不是上述调查的研究对象。它也没有调查人们承认的、在低收入者多的地方出现的靠补助生活的人、残废人、领取利息和养老金的人这些非本质的情况。同这些人有密切联系的是“社会受害者”的情况，这里，事故、离婚、犯罪、破产、酗酒和各种反对社会的行径可以造成正常收入被切断和出现严重的贫困局面。

虽然更好地认识预防我们社会里标准贫困的规模和严重性是多么可取的，但这仍然不是这次调查的目的。一再发表的说法认为，在不断提高生活水平的前提下，仍有许多“被掩盖起来的贫困”，这种说法大概不会没有根据。但是，人们可以合理地预料，进一步提高最低工资、增加社会保险和扩大社会保险将导致社会福利国家中遗留下来的贫困进一步缩小。

在导致进行这次调查（本文报告了调查情况）的许多考虑中，处于中心位置的是一个属于完全不同的范畴的问题，经济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否导致了在资本主义历史中处于支配地位的贫富矛盾已被消除呢？经济增长是否意味着从根本上打破了有无产者存在的局面？阶级矛盾消灭了吗？社会一体化过程和新社会的建设已经在进行之中吗？新的福利事业意味着向

平等方向的发展吗？这一切都是关于富裕社会的社会主义因素的问题，在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它们必将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对社会主义政治来说，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具有重大意义，但这也是因为，这种方法也许可以对许多人（也包括社会党以外的人）产生不满情绪的原因提供线索。这是对民主意识的削弱、民主机构的失职和文化意识的缺乏的不快情绪。用这种办法也许还可以找到一些线索来说明象世界最富裕国家的贫困这样引人注目的现象的原因。林顿·约翰逊^①是在《向贫困开战》的口号下进行竞选的，这个口号受到了在贫困线上生活的、占居民的百分之二十五的人的欢迎。通过调查一座大城市最低收入者经济总局势长期达高峰后的生活，也许可以略微弄清，朝物质自由的成长过程在多大程度上是同社会意识的成长一致发展的。

这份调查报告调查了家庭收入在五千到九千荷盾之间的低收入者的生活情况，先后调查了他们在物质（收入水平）、结构（社会地位）和文化（消费习惯和欲望）方面的特征。调查结果表明，由于做额外劳动和配偶及子女们也参加工作，这些人的家庭收入平均以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超过男户主的毛收入。可以用这些家庭收入达到的满足需求的水平，意味着对物质上的贫困的胜利。现在已没有人受饥挨饿，最主要的生活必需品可以得到满足。那么，这样使用贫困这个概念是否还恰当呢？

调查报告指出，象各种社会机构那样使用的最低生活水平概念，不断发生了变化。按照目前关于社会救济的思想，这一概念是与平均工资水平的发展相联系的。它包含着对作为“贫困”最高界线的最低生活水平概念的承认，这种承认则可以发生变化。西博姆·朗特里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根据他所看到的情

^① 指美国前总统约翰逊。——译者

况，提出存在着解决生活必需品的问题和最低限度地参加社会交往的问题，他以此区分了主要方面的和次要方面的贫困。个别人认为，摆脱贫困状态在大多数情况下就是要多挣百分之十至二十的钱，这就是说，要转入临近的、收入更高的阶层的生活水平上。这种人的想象力几乎没有达到更加深刻的地步，但是，百分之十到二十的差别对他来说，就是受压迫的处境和有限的自由之间的差别。

社会主义从来没有把贫困这个概念同最低物质生活水平相联系起来。社会党人抗议的矛头就是针对“富裕之中的贫困”的，因此，实质上就是指向不平等和它造成的价值不平等。根据时间和地点，满足需要的程度有非常大的差别。凡是生存机会和发展可能性的不平等被人们体会是一个障碍和限制的地方，凡是一些人的富裕致使另一些人能感觉到不富裕的地方，都存在着贫困。

工人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无疑是一场要求提高工资和缩短工时的斗争，但除此以外，它更是一场争取平等权利、普选权和公民地位的斗争。只有消除了“两个民族”，即受金钱、地位、特权和传统束缚的人构成的“民族”和无产者、无文化者和无传统者的“民族”这两者间的隔阂，才能够消除贫困状态。在我们所处的情况中，克服贫困状态与其说取决于工资的提高，不如说取决于地位、身份和“受教育的垄断地位”被打破的程度。

从调查给我们的印象来看，最低收入者是几乎没能消除历史烙印的一批人。只是在耐用消费品供应方面，他们的情况同过去明显不同，在这方面也就明显存在着用过度的消费掩盖自卑心理的情况。根据这种情况来重新概述他们的情况是有益的。

无论是在职业范围内发迹的可能性，还是改变职业的可能

性，都是很少的。特别是没有受过教育者的情况更是如此。子女的深造机会同样很有限。人们的自由受到了苛刻条件的限制。生存圈是很狭小的，而且是关得紧紧的。现实就是人人都被束缚的王国。只有通过提高工资，人们才能达到物质自由的王国。尽管人们还是关心政治的，但是他们不相信可以改变社会的命运，因此他们也就不参加社会政治活动。

人们花钱更多地是为了有饭吃和购买耐用的日常用品，而不是为了布置住房和为了在更晚的时候才能带来好处的个人和儿童福利。

人们对于工作、收入和子女教育的要求是不高的。虽然人们的阶级觉悟并不高，但对社会的不公道的认识的确存在。但是，阶级敌人已变得无法认识和无法找到。同左邻右舍团结一致的精神是有的，但是认为自己是更大的集体的成员这样的精神并不存在。

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拉平了的中产阶级社会”（舍尔斯基^①的名词）。社会矛盾缓和了，但是，过去被社会排挤的那些人的阶级觉悟的削弱并未导致无产阶级各阶层同更高的阶级建立联系。

对情况进行这样的归纳，可以使人觉得好象进一步增加收入，对于消除上述贫困状况，似乎没有什么意义。为了消除这种误解，指出被调查者在物质上的几个特殊方面，是有益处的。

首先，引人注目的是，通过加班、干零活以及让妻子及儿女们都干活，未受过教育者能够达到可以同受过教育者相比拟的家庭收入水平，电视机、洗衣机和电冰箱并不是单纯用分期付款的方法买来的。它们也是用牺牲休息时间、参加额外劳动和母

^① 1912年生，联邦德国社会学家，专门从事对青年和家庭问题的研究。——译者

亲及孩子们提早上班所挣来的钱买来的。

第二,在这个低收入阶层,我们遇到了人人几乎完全没有可观的存款的情况。只要不占有财产的情况持续下去,应急存款的缺少所造成的事实上的不自由、对改变工作环境的限制以及没有可能干额外劳动的情况,都将继续成为无产者状况的特征。

第三,必须指出,我们缺乏关于住房情况的详细材料。住房情况没有列入调查的范围之内。但是,几乎在同一时期,阿姆斯特丹中央房管局所进行的调查清楚表明,虽然房荒和住房难的问题不局限于最低收入者,但是,这种情况在这些入中间比在收入较高者中间更经常地出现。虽然调查表明,最低收入者确实买得起许多耐用消费品,但是,购买最重要的耐用消费品,即质量较好的房子仍然是遥远的事情。除非在国民收入的使用方面发生巨大变化,还需好几十年,才能至少在大城市里使低收入者买得起好房子。这样,也就同时指出了低收入阶层继续处于贫困状况的主要原因之一。

贫富差别最终不应当用基本收入来衡量,而应当用被消费的收入、生活方式和生活条件来衡量。在住宅方面,贫富差别极大。这些差别不仅在于住宅本身,而且同样在于住宅的环境。现在的住房都表现城市建筑学上有差别,例如有院子的别墅和根据革命性的建筑政策建造的住宅之间有差别,这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状况的特征,社会只是慢慢地摆脱这种状况的。

正是城市建筑学和住宅建设政策方面的这两个例子可以说明,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增长,社会组织对收入的使用的影响,将对打破低收入者阶层的毫无前途的与世隔绝的状况,产生决定性意义。电唱机和洗衣机不能冲破这种圈子,一个有足够的文化娱乐设施的高质量的新住宅却可以冲破这个圈子。

在这个问题上,有人可能会反驳说,所观察到的有关支出和

要求不高的现象，是低收入者智力上和精神上能力差的表现。自古以来，在争论社会问题时，这是一向被一些人提出来的说法，以便有理由不改变情况。保守主义根据《圣经》里关于“您周围总是有旁人的”一段话、遗传理论和“最低阶层”中明显存在的冷淡情绪，一再指出，统一社会的努力都势必要滑到“自然的”不平等道路上去。在一般人的用语中，过去反对提高工资的理由是：反正工人们会在酒吧间里花光这些钱的，现在的理由却是，这些钱他们只会用来买没有用的东西，或者，这些钱只会使他们变得又懒惰又要求高。在一个世纪以来的社会解放的影响下，许多这类说法已经消失了。社会党人已从马克思那儿学到了，通过旨在提高政治和社会觉悟的工作，可以克服这种“该死的无所追求的思想”。

但是，正是在迅速的经济增长的背景下，可以重新问道，怎样才能解释物质性的经济增长为什么并没有导致低收入者的生活情况从根本上改变。首先冒出来的，不是反对进一步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的理由，而是这样的结论，即福利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仍然没有走出死胡同，政府的活动对有天才的人和中间阶层比对没有天才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更有利。

不可否认，以“福利国家”这个概念归纳的社会革命，除了增加物质福利以外，也已经使人们更有可能享受平等。它使繁荣分布得更广泛和缩小了相对的收入差别。但这种发展并没有消除收入较低者在资本主义局面下的特征。当然，“机会均等”的口号是很有欺骗性的，由于消除了财政上的障碍，这个口号导致了现有的智慧被利用得更好和垂直的社会流动性略有扩大。

但是，把“机会均等”解释为对财政障碍的补偿，这种做法本身只意味着用智慧的不平等代替财政上的不平等。因此，还谈不上每个人可以用同样的方式为自己创造符合自己性格和品德

的发展机会。因为，后者正是意味着，才华差的人应当比很有才干的人获得更多的帮助和条件。现在的情况恰恰相反。就想一想上学和做工的青年人之间假期长短的差别吧。

除了继续存在的这个对摆脱贫困处境的障碍以外，还必须把仍然是“庞大”企业界特征的寡头政治结构指点出来。把经济权力集中于在我们的生产过程中占有关键地位的企业领导人手里、大企业领导人的财产占有和发言权的相结合以及在企业政策上劳方缺少发言权的情况，这一切使得在少数有发言权的人和多数正在幸运地或不幸运地等待为自己或对自己作安排的人之间，继续存在着一条深深的鸿沟。

最后，人们体验到的异化，即对他们如此依赖的经济和企业生活的异化，发展成为对社会本身的异化。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排除了在利益、看法和行为方面低收入者同我们社会领导阶层互相统一的可能性。如果说社会一体化的意义是要人们为领导阶层和主管部门的所作所为共同承担责任，那么由于人们体会不到有共同的利益，这种一体化已经失败。对议会及领导机关的作用的较低评价，显然同收入水平低有联系。

在现今的社会中，低收入者的地位同以前相比，没有根本的不同。他们在物质生活上是有提高的。他们的收入状况有所改善。充分就业和社会保险已经从根本上加强了这些人的生活安全感。但是，尽管如此，事实表明，在社会和经济方面他们仍然处于较低的社会阶层。只有在对我们的社会制度采取彻底的措施的情况下，他们才能够摆脱这种处境。

在政府行使职权、支配大部分国民收入以及指导私人企业利用开支的方法的影响下，经济增长过程的社会条件不断地发生变化。在社会秩序中，仍然存在作为十九世纪资本主义残余的若干主导因素，它们阻碍老百姓克服工人和其他人之间的分

裂状况，还使没有受过教育的人的社会地位维持原状。旨在消灭这些残余的改革，必须首先从三个方面去探索。这三个方面是，培养和教育、企业民主化以及政府有意识改造社会环境的努力。

如果我们的社会有更好的流动性，有更好的和时间更长的学制以及更好地利用潜在的智力储备，我们就可以促进减少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的过程。当然，智力上的差别将继续存在下去。关键在于，不应当让这种天赋差别(与其它差别一样)导致现有的社会后果。因此，应首先研究的是培养的问题，也就是教育形式的问题。应当用它去扫除障碍。今天的对最低收入者阶层子女的教育，经常是在旧的居民区和学校里进行的，这样做至少在较大的城市里造成一种明显的社会隔阂。

学习的欲望也很差，这有时甚至是教员们的无能造成的。初等技术教育和初中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同阶级相联系的对阶级起束缚作用的。普及和提高这种教育是不够的。只有改变学校类型才能提供根本的解决办法。必须把各级教育和一切可能的横向区别统一于一个整体之中。应当使人们有最大的可能实行横向和竖向流动。

沿着这条道路，教育可以触及不平等的文化基础。条件是要扩大职业教育和专业教育中的普及教育因素。

除了改变高等教育典型的资产阶级性质以外，继续改变企业政策、工会政策和企业生活的社会政策，也可以对此作出重要贡献。报告中援引了“在工人头顶上有穿不透的天花板”这句话，范·多恩在分析工人和雇员之间的地位差别时指出了这一点。这里存在着企业内部传统因素的相互影响，这些因素使过时的分工得到保持，并使工人的地位被固定起来。只有当企业政策很明确，并且使地位和劳动条件符合职务为目标时，才能越

过工人和职员之间的过时的分界线。这样一项政策当然会影响企业内部的代表制度和晋升政策。如果把企业看作是一个合作的整体,在其内部没有一个成员是可以缺少的,门房工作同经理工作一样不可缺少,那么,走向相互关系方面的另一种精神的道路也就畅通无阻了,平等的基础也就找到了。

在这样改变企业内部的合作关系以后,紧接着应当通过实现劳方的参与决定权来改善发言权。幸亏人们都非常关心修改企业结构的问题。在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检验企业政策(无论由企业董事会在企业内部,还是由工会在企业外部进行检验),可以使企业克服认为自己是不可触犯的思想。在这种思想影响下,雇员群众都觉得,他们很不了解在如此大的程度上决定着他们的命运的这些力量和势力。

我已经指出过,企业生活的气氛,要对较低收入者体会社会整体的方式负大部分责任。在首先是训练和教育、此后的工作环境以及对“社会”、行政领导和民主机构的态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联系。对“社会”、行政领导和民主机构的态度是学校和企业经验所致。政府在具体建设住宅和生活环境方面有可能采用特殊的办法,即在新住宅区可以建造混合住宅、提高住宅质量以及可以建造特别是向较低收入者展示很大的发展机会的娱乐设施。

消除以上突别提出来的鸿沟,确实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在探索建立真正的社会时,地位差别、无数等级的爵士勋章、严格的礼仪,以及谋求地位的人总是要耍的新花招,有时好象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只是当我们越过了这些障碍时,对“贫困”的最终胜利才能成为事实。

社会主义运动和新的社会批判理论

(1970年)

今天,每当举行讨论劳动青年教育、大学管理形式或对幼儿园的资助的会议时,几乎总有人站起来,说作报告的人和参加讨论的人都在说废话,因为只要不改变社会,什么事情也办不成。社会制度不行,必须建立另一种结构。政党、工会、议会和政府都是一个运转良好的机器的组成部分,这个机器就是现有社会秩序。在这个秩序内部可以解决这个或那个小问题,但实质性的变化是没有的。因此,你最好不要去考虑政治家们积极主张的那些小小的改良。改良削弱反对现存结构的反抗,它们麻痹人并掩盖问题,而所需要的正是两极分化、加剧矛盾和使人们意识到这些矛盾。

批评家进行活动时很有把握地认为,他是作为少数人的代表同很大的阴谋集团进行斗争的,在斗争中他还得不断防止自己被封锁。因此,他不致力于讨论问题,而致力于证实问题和提出抗议。每个人要么是现存制度的一个成员,要么是新社会或新人的先驱。你要么维护现有秩序,要么参加反对现有秩序的斗争。

以上是对新近提出来的社会批判理论的非常有限的描述,对新式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各种特征谈得极少。德莱克^①对马尔库塞^②的社会批判理论模式进行了概括的阐述。该理论认为,

人人都是无能为力的,因为在复杂的社会里,人人都没有什么发言权。该理论反对人人都认不清其面目的权力。在现有的制度里,任何人不为社会的缺点和不平等负责。在这个制度里,最可恶的因素是民主的机构。一种忍让精神压制了人们,它维持了人们和制度的无能为力的状况。只有在制度的范围内才允许批评。民主是假的。科学是为现有秩序服务的。大学是当前的当权者的一个再生产机构。专制性的关系是借助于制度化了的权力维持的。只有通过能解放人的暴力,才能冲破这样封闭的、自我调节的体系。同制度的关系最不密切的边缘阶层(艺术家、大学生)承担着采取解放人们的暴力行动的任务。

马尔库塞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

为了能够评价对社会的批判,需要认识到,除了这种马尔库塞主义模式外,马克思主义也复活了。这两个模式有许多共同点,但不能因此把两者混为一谈。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问题不在于人们的发言权太少,而在于错误的人拥有发言权。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权力完全不是他们认不清其面目的一个东西。掌握权力的是大财主、大康采恩和他们的帝国主义走狗。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议会机构虽然不能解决一些实质性的问题,但作为一个论坛也不能抛弃它。他们不嘲笑忍让精神,而很愿意利用它。他们反对现在的专制主义者,但认真地培养将代替他

① 荷兰学者,在1970年12月的荷兰工党理论刊物《社会主义与民主》发表文章介绍马尔库塞的理论。——译者

② 德国出生的美国学者,“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从激进的立场出发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但认为工人阶级已不革命,知识分子是主要革命力量。他对1968年西方学生运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译者

们的其他专制主义者。他们不相信自发产生的旨在解放人们的暴力行动，而相信顽强坚持进行阶级斗争的作用。他们常常闭口不谈采用暴力手段的问题，但并没有说在决定性时刻不把它作为夺取权力的手段。“共产党人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可鄙的事情。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那些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①《共产党宣言》就是这样说的，这句话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在1968年的法国五月风暴中，这两种社会批判理论形式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来了。在辩论阶段中，法国共产党没有参加辩论，甚至明显鼓励法国工人不要去参加街上的暴力活动。当各种力量似乎要互相进行真正的交锋时，共产党人却赶紧争取掌握对起义的领导权。这时他们也考虑到了采取暴力行动的必要性，尽管后来的事态没有发展到这一步。

使共产党人和马尔库塞主义者联合起来的是他们都完全指责现存结构和他们都有可能在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中把暴力当作手段。因此，他们在一定意义上会互相影响的，他们有时会暂时结盟。例如，在我国，荷兰共产党在比较晚的阶段中支持过大学生的反抗。反过来，大学生反抗运动的领导人在1970年上半年的大选中呼吁选民投荷兰共产党的票。其实，这时社会批判理论家们都指责了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制度是专制的、官僚主义的机构。

政治现实是，无论在观点还是词汇方面，新式的社会批判理论和新马克思主义是互相贯通的。这又导致持自由主义和持极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04页，195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译者

权主义社会观的人以奇特的方式在反对现存社会的斗争中互相合作,而实际上他们应当是死敌。毛泽东的小红书和学生的小红书^①似乎可以互相替换,但这是一个错觉。枪杆子里出政权和学生从学校的专制统治下的自我解放本来是互不相干的。然而,由于两者之间的界限已模糊了,用民主的方式革新社会的努力遇到了很大的困难。

民主社会主义和结构改革

在马尔库塞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兴起时,民主社会主义似乎不存在了。例如,在五月风暴的时期里,它的本质没有表现出来。然而,(民主)社会主义运动过去和现在都采取了致力于结构改革的立场,这同那些通过学生的抗议、议会外行动,以及威胁搞暴力而在政治舞台上取得了进展的流派是完全一样的。这是因为我们认为,结构这个不可思议的名词所指的是制度化了的社会权力分配状况。这种社会权力分配状况是反映巨大的不平等、由少数掌权者和大批无权者构成的图象。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的行动曾致力于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权力分配状况,以使广大居民群众从无权状况中解放出来。权力属于人民。目标是:普遍选举权、保护公民自由、社会法制、限制人人对自己私人财产的发言权、更平等地分配权利。资本主义的结构改变了、瓦解了。一个不仅仅承认形式上的平等权利的法律秩序已经发展起来了。

但这种事态发展中断了。五十年代的社会福利国家是相对

^① “毛泽东的小红书”指《毛主席语录》,“学生的小红书”指荷兰学生在六十年代末的学生运动高潮中编的小册子。——译者

和谐的，并且可望逐步地成长为更加平等的社会；现在，这种情况已被彻底干扰了。丹尼尔·贝尔^①最近在英文刊物《遭遇》里发表题为《不稳定的美国》一文说，至少对美国来说，五十年代的相对稳定和对更和谐的社会期望，都应当被视为不合乎总的模式的例外情况。二十年代的动荡和三十年代经济危机的灾难比起艾森豪威尔时代的安定更是美国社会的发展过程的特征。1963年（肯尼迪去世）后的混乱关系是一个陷入了绝望的内部冲突的国家的典型特征。人们强烈地感觉到了美国同西欧的共同点。社会福利国家的受控制的资本主义取代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充满经济危机的资本主义。由于实现了充分就业、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社会保险，现在可以喘一口气。现在，社会福利国家好象陷入了根本的危机之中，这个危机同三十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几乎完全一样。设计并建设了社会福利国家的各国社会党因此受到了指责。受左的社会批判理论家们最激烈指责的多半是各国社会党，因为这些党通过对社会秩序的调整和改良掩盖了仍然存在的权力方面的不平等。

这种批判常常是不正确的，但确实是可以解释的。象社会党人所做的那样，即在现存结构内部开展改革这些结构的工作，包含着使自己同这些结构等同起来的危险。这样，虽然确实有文件记载着长远的纲领和社会主义的社会观，但它再也不是识别社会党的特征。荷兰工党在把生活水平放在中心位置之后的遭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工党首先认识到了繁荣对福利的威胁^②、为了保证良好的生活环境而限制毫无约束的经济增长的必要性、有意识扩大征税额的必要性以及压缩私人消费的必要

① 美国学者，专门研究意识形态问题。——译者

② 意即社会繁荣不一定会使福利增长，相反，由于要管理更多的财富，国家也可能减少福利开支。——译者

性。在1963年议会选举时，工党在全国散发了题为《为了生活的质量》的竞选纲领。这个口号没有受到人们欢迎。许多人把工党在大选中的失败归咎于工党不停地提出的、令人愤恨的、关于扩大保护环境的政府开支和扩大征税额的要求。然而，在刚刚投入政治斗争的新人的心目中，识别工党的特征不是为保证生活质量的斗争，而更主要是工党的市政官员们不顾工业造成的环境污染仍然为吸引工业投资进行的活动。

这种效果的出现同大规模发生的联络渠道的堵塞有密切关系。社会福利国家的设施的建设首先意味着要使组织结构拥有数量巨大的细微的分枝。于是，除了内行外，其他人很少能纵观全局，更不用说了解内情。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异化到处发生。社会批判不是作为人民反对某个权力集团的斗争，而作为反对已变得不受个人支配的经济和政治权力机构的反抗表达出来的。这种反抗的特点是对等级制度和中央集权主义的反感、关于直接民主的要求、对自发性的强调和对形式主义的拒绝。“对现存政党的怀疑使人们普遍地讨厌组织这个现象。许多人认为，组织本身就导致僵化、追随者在政治上的麻木不仁和保守主义。”（W. G. 沃尔特尔斯，《无权和大权》，荷兰文刊物《向导》1970年第6期）

在这方面也应当提到，各国社会党都低估了技术革命的结果。社会主义运动一般都赞扬了技术的发展，因为它使经济增长了，并且同时使人们从肮脏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了。事实证明，担心机器会带来失业，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没有根据。通过资助和教育，技术的发展是受到鼓励的。但是，它所选择的方向和它所造成的技术治国结构都没有受到干预。结果是，促进了企业的集中和经济权力的集中。在大企业内部，只有懂得了技术人员的秘密语言的人才拥有发言权。生产的方向很少是由消

费者决定的，而更多地是由技术上需要的利润决定的。因此，反对民主模式的斗争就变成了反对专家和技术狂人的斗争。

技术的发展本来是对人民有益的事，但缺少人们的监督和发言权的技术治国的社会模式却使社会出现了一种“真空”，而不信任和怀疑的情绪就会填补它。在缺少进行合理监督的地方，富有侵略性的不合乎理性的情况就发展起来了。反对 1970 年的人口普查的斗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社会主义本能地喜欢对社会秩序进行合理的整顿，如果社会主义运动想掌握或恢复对事态发展的控制，那么它必须用有意义的东西填补政府及技术治国主义者和大批消极的人之间的巨大的“真空”。

只有在民主化了的社会主义运动放弃的领域里，粗劣的反对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致力于动员反理性主义的力量和社会批判理论才获得了机会。因为比传统的社会主义运动更“右”的力量有时比大的社会党的庞大机构更早和更快地认识到了民主方面的缺陷，所以社会党的处境有时特别困难。

对新的社会批判理论的民主的答复

面临着技术治国主义的社会发展和由此形成的社会批判理论，社会主义运动应当怎么办呢？这可以用以下主要的几点来归纳。

一、要有意识地同资本主义制度强加给社会主义运动的盲目追求扩大繁荣的思想决裂。社会党人本来不是那么愚蠢的。不仅教会的社会主义者，而且象托尼那样的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家也都把关于社会目标的选择放在第一位。不是权力和财产，而是人们的自我发展和服务精神应当是社会发展的尺度。把经济发展置于从属于对“自然”环境和生活条件的保护看来目前

是人们已普遍接受的准则。但是，如果在经济制度本身内部不把这个准则作为制度的组成部分的话，那么上述的一切只是玩弄词藻。企业的改革是这方面的试金石。企业里关于投资的决定必须服从用民主的方法确定的生产目的，只有这样才能结束经济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生活条件的支配。

二、为了监督军事工业体系需要有一个合适的监督机构。武器和军事装备的生产不应当只由私人企业掌握。在本国范围内，这个问题只能部分地得到解决。如同对跨国公司的控制那样，只有通过创建新的超国家权力机构，才能通过公布实际情况、检查和领导工作，对国防费用和私人经济权力的关系进行民主的整顿。

三、优先发展长期的教育事业。要把职业教育和为了教育而教育明确区分开。教育的所有“部门”都要体现学员选择教育的形式和程度的自决权。

四、对工作环境和目的的自决权。要从基层开始发展这种自决权，要进行关于工人自治的试验。

五、人们关心自己的前途。从事对未来的研究的政府机关、大学和私人机构都应当成为决策机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六、补充和改革议会民主模式。要使选民有条件直接影响组阁工作。要使议会具备联系议会外活动的工具。要通过保证当选的人民代表也能长期代表人民来使代议制民主的内容更加丰富。

社会改革的方法

然而，人们可以问道，以上所述的不革新自己的社会主义

能否保证权力和发言权分配得更平等？这种方法能改变社会结构吗？走教育改革和实现对劳动条件的自决权的道路能保证人人树立新的工作目的吗？它能制止竞争，并且使合作成为主要的动机吗？通过改革现有机构能不能克服异化和在互相排挤和侵略似乎是其固有特征的社会里给“没有异化的人性”发挥作用的机会呢？

左的革命者们对此作了回答。但对他们来说，西方社会已完全不行了。只有推土机可以帮点忙。象曼德尔^①那样的新马克思主义者都盼望着大暴动的到来，在这次大暴动中，工人和无权的人将用暴力夺取权力，并由此解放自己。在他们的心目中，工人群众在一天的毫无意义的劳动之后，麻木地坐在电视机面前，从而很容易受保守党之害。在他们的心目中，普选权和以它为基础的议会制度不是改变权力关系的有效工具。改良主义的政党没有什么机会，因为工业和金融巨头们控制了联络机构。面对着掩盖真实情况的独裁，只有觉悟了的工人、大学生和造反的知识分子为解放人们而采取的暴力行动才是合适的。通过占领工厂和向现存权力机构的认真的渗透，应该有可能大规模地强行剥夺资产者的财产，并由此打开通向自由王国的大门。

在最近同曼德尔的一次讨论中，我把这种受人们欢迎的观点称为失望的哲学，指出其基础是对社会现实的歪曲。

应该使结构的观念非神话化。包括权力结构内的一切结构都不是不可动摇的、固定不变的已知的东西。权力的分配状况处于不断的运动之中，关系在不断地变化着。大体上说，本世纪的事态发展就是对资产者和统治者的权力进行了限制，而有组织的工人、公务人员、知识分子、中级职员和“高级”职员的权力

^① 比利时经济学教授，当代主要的托派分子之一。——译者

增加了。由于权力落到了政府机构里专家们的手里，这种事态发展受到了阻碍。这样，在社会民主制度几乎还没有建立起来时，政治民主已被瓦解了。因此，“西方的民主制度”的确遇到了严重困难。但没有理由感到失望。富有批判精神的一代人的成长是时间更长和质量更好的教育、更繁荣的社会和更多的表达愿望的机会。这种事态发展是不可逆转的。只有权贵们才有民主的不健全的制度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当时，争取每天有饭吃和有保障的生活的斗争是支配一切的。不管什么样的复辟浪潮向我们冲过来，我们的社会是不会倒退到那种制度的。民主化了的教育为使权力更进一步从少数人手里转移到多数人手里创造了条件。它也为企业里对劳动条件的自决权转移到所有在企业里工作的人手里创造了条件。沿着政党民主化的道路，政治民主可以活跃起来，技术治国的状况可以克服。大学生人数的巨大增长为使被少数人垄断的知识（在目前的阶段里，对知识的垄断比起对金钱的垄断更有利可图 and 更重要）由社会来掌握创造了条件。情报机构和联络渠道的普及使突破各个集团的传统的道德和比较普遍地接受新的生活形式成为可能。新的思想和新的动机扩大了自己的地盘，这带来了重大的政治结果。现在，制订保护环境的政策已成为无法推脱的任务，这正如争取减税的长期斗争现在看上去很庸俗和过时那样。把这一切说成是幕后操纵的资本主义先生们为适应形势而狡猾地想出来的花招是不行的。

采取始终一贯的民主形式的社会主义制度还要走漫长的路程才能抵达没有阶级的、人人都有良好的条件来建设自己生活的社会。议会民主是人们通过大量牺牲获得的宝贵的社会革新工具，谁也没有任何理由来阻止人们从事采用这种工具的合理的政治活动。在这方面也不能无视六十年代的社会批判理论，因

为在这种批判堕落成为失望哲学的地方，社会主义运动自己造成的盲目性对此也是有责任的。但是，社会党人应当抵制力图把科学工作同一个事先确定的科学或社会理想结合起来。有意识地为一种新的社会形式服务的教育和科学同维护现有社会形式的教育和科学同样严重地威胁自由和开放的制度。

社会主义运动应当反对中断历史，要反对有意地同历史决裂，要反对认为必须先破坏现存结构才有可能实现自由发展的想法。在废墟上面生长的东西毕竟很少。任何结构改革只有当它是建立在对支持现存结构的机构和思想的变革的基础上时，它才会有持久的意义。现存协商和咨询机构的错误不在于它们的存在，而在于它们起着脱离人们的官僚主义机构的作用，它们本来应当为人们服务。这对社会经济委员会、荷兰足球协会和一千多个其他的机构有效，这些机构的确生产产品，但生活得非常困难。而且，他们的产品逐渐地也中毒了。

我们也不能在破坏或瓦解现存生产组织的基础上更平等地分配权力。从技术上说是能够办成许多事情的。组织应当民主化。然而，为福利、保护环境和把经济置于次要地位的斗争不能忽视在社会繁荣方面仍然存在的巨大差别。更确切地说，如果要实现有益于人类生活的环境、更人道的劳动条件和世界财富的更公平的分配，就需要极其合理的生产和计划组织。因此我不太明白一些人主张让雇员决定生产什么的意图是什么。我理解他们为了让雇员参加作出关于投资的决定而作出的努力。但是，生产的秩序不能依赖于一个企业的雇员集体作出的决定。我认为，关于工人生产的东西到底有什么用处和它们的社会效果如何的问题，工人们应当作为一个政党的党员在政治秩序内部提出意见。我同样地认为，主张企业应当支付集体设施的费用这种思想是随心所欲地组织社会秩序的一个例子。我对菲利浦公司的

学校和体育俱乐部已经够讨厌的了。不过，我提出这种指责是为了说明，具体地建立“人人都能尽量地对政策负责”的社会关系是非常困难的。

这不要紧。走向自治的道路是漫长的，我们是从充满许多错误的形势出发的。新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兴起迫使各国社会党重新考虑他们想建立的那种社会。它发动了一个思考和重新确定方向的过程，这个过程远未结束。由于社会主义运动的行动，社会在一切方面都在彻底变化，社会主义运动就是在这个社会里搞政治斗争的。上述变化不是抛弃过去时期里的认识和成就的理由。但确实应当把新的社会批判理论中的一些因素转移到致力于进一步改革社会的政治斗争。

社会批判浪潮将发展到多大的规模是无法预言的。它将退缩吗？这个浪潮会高涨吗？是否有可能把合理的和不合理的因素互相分割开来？能够防止暴力吗？争取新的社会形式的斗争是在两个超级大国都面临着互相有共同点的尖锐的内部矛盾的形势下进行的。考虑这种情况是有好处的。在两个超级大国内部，都开展了反对技术治国主义统治和限制自由的气氛的斗争。阿马尔里克^①谈到了苏联的地下刊物运动，他所使用的术语常常很象美国青年人谈美国的运动时所使用的术语。使他们联合在一起的是争取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斗争。在西方，只有利用已获得自由，才能使这场斗争获胜。这正如智利总统阿连德在答复社会党国际给他的贺电时所说的那样：“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的政府所主张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民主的范围内和在尊敬法律及公民自由的情况下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① 逃往西方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译者

社会主义和自由企业式生产^①

(1974年)

贵党主席来函邀请我在贵党的大会上发言，我现在援引他的话，即“从我们给您选择的课题您可以理解到，我们对此进行了认真的考虑”。我们扪心自问，他说的那种考虑究竟包含着什么意思。

也许是需要看到有一位崇拜社会主义的主教在这里披红登场？

或许是希望能够仔细地看一看，在本届内阁中合作的社会党人和天主教民主人士到底有多大分歧吧？

吕贝尔斯先生^②去年不是曾作为客人在这里发表了关于大体上是同样的课题的讲话吗？

因此，为了稳妥起见，我把吕贝尔斯先生的讲话又查阅了一遍，我可以向你们郑重地保证，在今天的具体政策问题上，我们俩的见解殊途同归。

但是，视角和展望将肯定有差别，这是真的。贵党主席通过选择《社会主义和自由企业式生产》这个题目，也迫使我们在这一谈谈视角和展望的这些差别。社会主义运动致力于建立没有阶级矛盾，不再有人剥削人，也没有一些人由于有财产而统治其他人的现象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收入的不平等只不过是不同职责的相对的反映，在这个社会里，一切社会领域中都实现了自治。

社会主义运动同自由企业式生产的关系是有矛盾的，这是毫无疑问的，虽然社会主义运动并不想用国家社会主义的中央集权制代替那种自由企业式生产。

让我试一试把我国民主社会主义的发展向你们作一个概述。

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

当社会化的浪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席卷欧洲的时候，在社会主义思想中，向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进攻处于中心位置。社会民主工人党^①和荷兰工会联合会的《关于社会化的报告》可以证明这一点。

十五年后，1935年制定的《劳动纲领》大谈特谈实现充分就业，以反对三十年代的大规模失业。又过了一个时期，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1952年发表社会主义纲领《走向自由之路》时，重点放到了后来被称为“对生产资料的支配权的社会化”问题上。具有实质意义的并不是所有制本身，而是迫使这种所有制的运用必须为社会选择的目标服务的法律条文。社会选择的目标是充分就业和公正的收入分配。

再过了一段时间后，即1959年，维亚蒂·贝克曼基金会发表了题为《企业改革》的报告。这时重点落到了这样的愿望上，即不但要从企业外部用法律条文使企业实施的政策为谁服务的问题有个标准，而且也要从企业内部通过在企业管理体制内部建

① 登厄伊尔在荷兰天主教人民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译者

② 基督教民主联盟政治家。七十年代初曾任登厄伊尔内阁的经济大臣。1982年担任基督教民主联盟和自由民主人民党联合组成的内阁的首相。——译者

③ 荷兰工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前身。——译者

立“总利益委员会”的制度来实现这一点。

又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到了1972年，当环境污染造成的危机可以明显感觉得到时，重点再次转到在企业外部制定法律条文上，以便使企业活动符合保护清洁的环境和谨慎地对待短缺的原料这个标准。

这时事实再次表明，在这些法律条文中，企业决定权及其中的投资决定权这个最主要的决定权的集中，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我可以举出一个例子，即《曼斯霍尔特^①的报告》，这个报告如同我刚才提到的战后那些报告一样，上面也有我的签名。

今年，维亚蒂·贝克曼基金会发表了一篇题为《走向劳动自治》的研究报告，该报告的重点是要在工厂里实现民主，消除资本主义因素在企业管理中的影响和把自治企业纳入整个经济的过程中，实现决策过程的分散化。

如果你们纵观一下我试图用几句提纲挈领的话加以概述的1920年至1974年这一时期的发展过程，那么你们可以看出这样的突出特点：这些发展过程重点不断变化，但一直受这样的坚定信念的鼓舞，即最终决定生产的不应当是市场上存在的那种供求关系，而是被视为与此相矛盾的用民主方式检验的共同决策。

生产体制的发展

纵观半个世纪以来的发展情况，应当指出，不能再说我们今天的生产体制是“自由企业式生产”了，实际上，我们今天的生产

^① 荷兰工党主要政治领导人之一，农业专家，曾长期在欧洲共同体任重要职务。他在报告里主张加强对环境的保护。——译者

体制是由不断变化的平衡构成的。我想,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假如你们想换一种说法,也可以称它为一次停战,其中一方是政府对于经营企业的条件所作的法律规定和政府为了疏通市场渠道而通过征税、补贴、财政调整 and 价格政策进行的有意识的干预,而另一方是保留下来的决策自由和企业领导及提供资本者的活动余地。在许多方面,关于自由企业式生产的模式已被毁掉。

同时也很清楚,近几年来有一些东西在促使人们重新认识现在的社会关系,人们更热烈地讨论生产制度本身。

现在我要直接补充说,我认为,这不是给小企业“找麻烦”的问题,也不是要使本来已负担沉重的高级官员的生活更加困难的问题。经济秩序和我国的生产体制问题一次又一次地成为讨论题,而且现在比以往更甚,这同我们社会里和世界上已经发生的技术和基本经济关系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我想试试解释一下这一点。

我们这一代人亲眼看到了这样的情况,即技术的飞跃发展已经导致了关于投资的决策涉及到越来越大的单位。这种事态发展还导致了大企业,而且常常是非常大的企业,在经济生活中占有相对重要的地位。

五十年代末,同市场,即销售市场的规模相比,大企业的发展已经引人注目,但当时人们还可以怀疑这种发展是否导致了人们不妨称之为企业决定权集中于少数人手里这种状况。

我本人在五十年代末对这个问题的答案还是颇为怀疑的。但是,我认为,六十年代的发展已没有留下怀疑的余地了。六十年代,西方工业世界的特点是合并和集中化的过程。跨国公司的作用颇为显著。这个时期我国独立企业的总数减少了几万个。

我看到了,技术的发展和技術对就业机会的影响以及关于

投资的决定由此而产生的越来越大的意义，这一切大大地促成了政府方面制订明确的工业政策。这项政策就是今天人们熟悉的政府的“部门结构政策”。这项对各个企业部门的发展进行相互检验、衡量、鼓励和制约的政策意味着政府有了一个新的活动领域。工业的结构改革政策也是以这种衡量为依据的。

这意味着，在技术发展的基础上，在自由企业生产方式中形成了一项常常是指示性的，但又毫无疑问是崭新的政府政策，从而使生产体制本身又进一步发生了变化。

但是事情并不仅仅如此。随着大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的发展，对控制和检验这些大企业的决定的需要，也在继续增加。今天，我将不为所惑，不会根据联合国专家们（他们美名为“杰出人物”）关于跨国公司的作用的报告对上述问题进行进一步的论述。但是我必须指出，为政治目的运用经济力量和损害消费者利益的情况下运用经济力量，都是引起不安的原因，幸亏这些同时也是研究对象。在我们这里，有一个由经济事务大臣领导的专家小组正在从事这一研究。在能源危机期间，各个方面都感到很难看透石油公司的政策，这使得这一研究的需要变得大大现实起来。

这不是对石油公司的政策的指责，相反，这个政策在某些方面显然还有令人满意之处。但是该政策模糊不清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因此，欧洲共同体和美国首创的能源协调小组也提出要弄清跨国公司的决策过程，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为了避免任何误解，我要说：以上的说法听起来可能有指责的语气，但这肯定不仅仅是针对跨国公司的，而也许倒更多地是针对国际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各国工会运动、政党和政府的那种落后状况。

跨国公司已经建立的组织是各国的和国际的民主管理机构都无法相比拟的。

这并不证明跨国公司不好，但却表明它严重缺乏民主监督。因此，应当清楚地认识到，在象石油危机这类局势中，各国政府产生无力、失望和不满的感觉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这种局势中，各国政府在涉及到跨国公司的所做所为的问题上，履行自己对本国人民的责任的能力只是有限的。

在这方面，人们也不能忽视这样的结论：自由企业式生产体制极少保证自己的情况可以被人们认识清楚，也极少保证人们对它进行民主监督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看，国际上通行的自由企业式生产体制是一种有缺陷的体制。

新的短缺

几年前，对新的短缺的认识象晴天霹雳冲进了政治与现实生活中来，它所引起的对生产体制的抵制，比起我所说的那些同技术发展有关系的后果，更加深刻。

1971年夏天，有人到处兜售罗马俱乐部报告的观点^①，以为这样一来自己手里就有了一颗可以改变世界面貌的炸弹。我相信，在这些人中间，已经有许多人对于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提出了失望的疑问。

我觉得，虽然对这种短缺的认识带来的震惊作用也许已经逐渐消失，可是重新确定我们生产体制的方向这一挑战的迫切性却丝毫没有因此而减少。我想，这涉及到三件主要的事情。

第一是关于生产程序必须服从新的准则，以避免污染和窒息环境的认识。我当然知道，增加这些新的准则并不意味着生

^① 该报告提出，大自然的资源是有限的，若人类毫无限制继续发展生产，并为此掠夺大自然的资源，资源就会严重短缺，人类就会遇到严重灾难。——译者

产体制本身将由此而改变。相反，生产体制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吸收了新的准则，其中有些是在劳动关系的发展中产生的准则。但是，上述认识确实意味着，除了在安全、劳动和创办企业方面对企业业已生效的法律规定之外，又增加了一整套新的准则。这是无法否认的。这些准则是旨在阻止污染和保护不可代替的自然风景区的新准则。其实，已执行多年的防止污染法是这一整套准则的前身。然而，这些新准则意味着，政府要始终如一地杜绝环境遭受无法容忍的破坏和企业应担负由于它损害环境而造成的社会费用（我同意这一点）。它还意味着，企业的活动过程变得困难了，因为在生产和销售产品的时候要不断考虑到其社会后果。

我承认，企业活动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更简单。关于有选择地安排投资的决定就是运用这些新准则的一个例子。它是防止沿海城市出现拥挤不堪的情况和促使人们均匀地在全国居住和工作的一个手段。我知道人们对这个手段的批评。我想，人们可以对这个手段的有效性进行争论。但是对这个规定所追求的目标的正确性却不宜争论。

第二个起主要作用的因素是我所说的“对新的短缺的认识”。这关系到节约使用短缺的原料和能源。

8月，天主教民主人士的科学机构（你们应该懂得，我是带有一些爱护它的感情提到这个机构的，因为我前面已经提到了维亚蒂·贝克曼基金会）发表了一篇题目富有感染力的报告《有道理的怀疑》。

我发现报告中对节约使用短缺的原料和能源的必要性有一个分析，其观点和我的观点很相似。报告的结论是，实行有选择性的增长是有必要的，必须把它运用于我国的经济中。

这样做对在你们给我确定的讲话题目中被作为讨论对象的

我国生产体制有何影响和后果呢？

在《有道理的怀疑》这个报告中，人们反对把决定权集中于政府手中，而主张赋予“人人都有责任的社会”这个概念以具体内容。

你们知道，这个“人人都负责任的社会”的概念曾经是世界教会理事会战后召开的头几次国际性会议中的一次会议的宗旨。

我虽然十分体会到运用这个概念是很有意义的，但是我必须补充说，我认为《有道理的怀疑》这个报告在这方面特别含糊，而且实际上回避了选择的问题。

曼斯霍尔特委员会的报告提出，在短缺的原料和能源使用问题上，人们不能只依赖价值规律的作用。该报告接着主张，重大的决定，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应转给政府去作。我认为，在这方面，转移决定权是不可避免的。我也认为尽可能地分散决定权是上策。对于庞大臃肿的机构，不管是政府的、企业的，还是社会机关的，我概不信赖。然而，要是比如在能源供应方面，不把决定权交给受民主监督的政府，那么很难设想如何才能实现“人人都负有责任的社会”这一思想。

我认为，吕贝尔斯大臣的能源备忘录也包含着这种观点的因素。

应当让国家垄断核电站的建设，要把进口、出口和使用天然气的决定权交给政府，应进一步集中电力供应。

这一切并不是因为内阁喜欢中央集权制，而只不过是因为在生产、能源消耗和与此有关的繁荣这三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越来越密切的那种情况下，必须让一个受民主监督的政府在各种力量的相互斗争中起核心作用。

应当限制经济增长。要节约使用短缺的原料和能源。在这点上，经常有人援引我关于经济增长的必要性的语录。这些语

录来自我早年曾参与起草的关于荷兰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的备忘录，有一些人认为，这是一份出色的备忘录。

尽管如此，今天我还是认为，我们绝不能对限制增长的结果掉以轻心。这种经济结构——下边我还要谈到它——常常是很深刻的。但是我对这个事实毫无愧感，即我认为自己今天非常了解能源和原料的严重短缺，而在1966年，我未曾看到，至少是未曾清楚地看到这种短缺。

我要提出的第三个因素是这种基本的短缺，是关于西方工业化世界对自然资源的占用已经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程度。

富国的人口占世界的百分之二十，而它们消耗的原料和食品占全世界储备的百分之八十。《有道理的怀疑》说这是一种“令人担忧的发展”，这话说对了。即使谈不上那种基本的短缺，西方世界也应该重新确定其生产和经济增长的方针，以结束现存的寄生状态。这不仅——也许甚至不首先——是一个增加发展援助的问题，而是一个西方世界自觉地限制膨胀的问题，因为这种进程现在和将来都要破坏人类的绝大部分人的生存机会。

我们长期自我安慰说，只要西方生产的东西越多，它给穷国的东西当然也会越多，这是一个童话，这个童话已经破产了。不仅过去二十五年的情况不是这样，今后也不会是这样。

只有西方自我限制，才能给发展中国家的自身发展提供必要的余地。

收入分配

下面我来谈谈这种认识对自由企业式生产的作用的影响。我要再次引用《有道理的怀疑》的起草人的观点。对于我这样不厌其烦地引证一份天主教民主人士的文件，我希望你们不要见

怪。在一定的场合下说话，是必须有充分根据的。

按照《有道理的怀疑》的起草人的思路，我提到的那些考虑的结论是：如果我们展望一下我们的社会，就会看到，在私营部门里，职工们可以自由使用的工资收入实际上被冻结了，出现这种情况也是不可避免的。

这就是说，在可以自由使用的工资收入范围内，还有可能进行某种再分配，但是该报告说，这种可能性是有限的。

我认为，“在私营部门里，职工们可以自由使用的工资收入实际上被冻结了，出现这种情况也是不可避免的”这个说法，是用消极态度表达重要内容的说法。这是主张从现在起直到你们可以任意确定的时间为止冻结工资的说法。

然而我也认为，在有选择的经济增长这一体制内，可以自由使用的收入的增长余地只是很有限的。但是我想，如果不提出几个有关的推断，就不可能和不可以合理地提出这种论断。这些推断涉及到我国的经济秩序。

第一个推断是，这种可以自由使用的收入的冻结状态，只有在始终一贯地贯彻缩小收入差别——现内阁的出发点之一——的情况下，才是可以被人们接受的，只有这样，人们也才会真正接受它。

在过去的年代里，可以说是过去的几十年里，经常有人正确地指出，围绕着收入分配的斗争，从许多方面讲，与其说具有实际意义，不如说具有心理上的意义，因为在经常的不断增长过程中，低工资由于这种增长的提高总是比任何一种再分配导致提高要多。

但是这种令人安慰的状况已不复存在，如果提高可以自由使用工资的余地确实很小的话，那么不可避免地要实行提高最低收入和多少降低较高收入同时并举的办法。我再说一遍，这

不是我发明的办法。只要象天主教民主人士的报告所说的那样，认真对待——我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严重短缺的根源、有选择的增长的必要性、限制对自然资源的占有和对第三世界的态度，那就不可避免地会得出这个结论的。

对投资的发言权

第二个推断是，如果还有增加投资的余地——这种余地应当是有的——而不再有增加可以自由使用的收入的余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对关于投资的决定、规模及方针的发言权就不能和不当仅仅是企业领导的职权范围了。

其原因在于这里涉及到的是把潜在的工资收入用于其他目的的问题。这样做虽然有道理，但是不应背着雇佣劳动者们去这样做。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可以自由使用的工资收入外，象利润分红、财产增长额的分配、养老金等其他收入，也需要重新得到足够的重视。

这也是我在天主教民主人士的报告中看到的论断，对此，我完全赞同。如果忽视这一点，那就等于——我想用夸张的语言来说——否认了时代的特点。事态的发展要求雇员们对投资的决定也拥有发言权。

我这句夸张的话涉及到了几个现实问题，对此我想根据刚才描绘的事态发展谈几点意见。我可以把这种事态发展归结为这样几句话：技术的发展、基本短缺的发现以及我们同第三世界的关系，这些都要求我们认真检查一下我们的企业生产体制的功能，并在该体制中增加新的准则和内容。

当我在这种背景下评论现实问题的时候，我愿意首先承认，我可以想象得出来，企业主们会把这一切看成是给他们提出了

相当苛刻的新准则和规定。现在本来就已经有那么多准则和规定。一个人如果必须在这样的压力下工作，他会垮成什么样子呢？我认为，我有点理解为什么当政府表示打算扩大发言权、重新详细审查企业理事会制度和重新研究企业结构的时候，企业主们作出了不愉快的反应。

然而，我恰恰愿意就企业结构问题再谈点意见。

企业结构

贵党主席把他的讲话稿寄给了我，对此我十分感谢。关于这个讲话，我至少可以说，它促使我予以驳斥。贵党主席在这个讲话中说：1971年在企业结构方面才制定了一些新的法律，为什么现在就要做这一切呢？难道连通过实践来检查这些法律的时间都不给我们吗？

对此，我想回答说，法律常常是多年的思考过程的产物。这样，当法律形成的时候，它又往往落后于事态发展了。举个例子说吧。我记得在五十年代，各种形式的国家委员会曾就制订一项新的高等教育法的问题进行过无休止的讨论。这种讨论导致了在五十年代末——我想那是在1959年，也可能是在六十年代——产生了一项新的高等教育法。

但是我想，从事后的情况来看，我们大家完全可以一致认为，在这项法律制定之时，它已经完全过时了。因为当这项法律经过多年讨论和思考之后被制定出来的时候，各所高等学校已经开始骚动起来。比预料的多得多的大批群众涌入了科学教育界，对传统的管理方式的大规模进攻开始了。六十年代的这一运动最终导致了大学管理改革法的制定和科学教育结构的改革，这个改革无疑还没有结束。

我认为,在关于结构和在企业中的发言权的法律中,许多方面的情况不会有很大差别。1971年的那些法律确实不应当被抛弃。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它们在许多方面是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所进行的思考的产物。

费达姆领导的国务委员会起草的关于修改公司权利的报告至今已发表十年之久了。维亚蒂·贝克曼基金会关于同一问题的报告已发表十五年了。企业联合会的报告已发表十二年。我附带说一下,在此期间,在企业中也换上了受到了更多的教育和训练的新一代人;人们相当普遍地接受了关于有选择的生长的思想;对于新的发言权结构的需要在一个广泛的社会范围内表现出来;比如今年春天以来,在德国已有人建议,要在整个企业界实行由劳方和资方均等地组成委员会的办法。尽管我们的企业法不久前刚刚受到新的法律的充实,但若是以为它可以不受这种事态发展的影响,那是幻想。

因此,对于法律在刚刚制定后不久就要修改的情况提出抱怨是没有道理的。

在我描绘的事态发展中,我觉得,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的重要性在过去几十年中减少了许多。但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而当我谈企业结构发展的问题时,那就不能不谈尚未解决的所有制问题的几个方面。对我们社会中资本货物储备的发言权仍然是归一方所有的事情。正是因为我们迄今为止未能消除这种归一方所有的状况,我不能有其他看法,而只能认为,从长远来看,发言权将进一步转移到最广义的劳方。这些权利包括领导和施工两个方面的权利。由于占有资本而产生的权利将不可避免地继续减少。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我又步了象奥斯瓦尔德·冯内尔布罗伊宁那样的天主教社会学家的后尘了。

发言权问题,也就是企业中劳资双方关系的问题,仍未解

决。

现在人们常常指出，对经济秩序的看法具有相当多的学究气。节日演说家在漂亮的讲话中提到了它，可在实践中人们很少感到它的存在。

我承认，我对这个问题的阐述也有些学究气。我知道，用具体的形式彻底解决发言权问题是很困难的。

但是我要指出，从上述的对经济增长的限制和随之产生的结果这方面看，这种对经济秩序的观察，已获得了新的现实性和迫切性。我认为，朝着长期限制可以自由使用的收入的未来事态发展必然导致企业权利和责任比今天更进一步分散。与此相反的情况是不可思议的。

正因此，女王在（1974年的）议会开幕式讲演中才提到了企业结构和共同发言权。

就业机会和技术

下面我来谈谈与上述分析不可分割的另一个现实问题。这就是失业问题和就业机会不足的问题。首先我要指出，毫无疑问，在主张实行有选择性经济增长的政策和创造并保持充分就业之间存在着有时是潜在的，有时是尖锐的矛盾。换句话说，我不能把象目前在我国表现出来那样的失业问题的严重性，看成是同过去几年中对自由的经济增长——包括工业增长——所加的种种限制互相割裂开来。人们正在开展关于所谓的结构性失业的讨论，这是合理的。如果我们说结构性失业，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生产的供给方面，而不是生产的需求方面。供给方面指的是生产所提供的就业机会。这样，我们碰到了新工作岗位的创造有所减少的趋势。其实，这种趋势在我国早就可以看到了。

据中央计划局估计,从1974年以来,我国私营企业部门就业机会的增长,平均每年不超过一万五千个。我们应当把这个增长率和从五十年代到1964年的发展做一个比较,当时平均每年增加了六万六千个工作岗位。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就业机会增长趋势的减弱,也就是新创造的工作岗位的减少,多半和1964年以来这个时期的实际工资成本的大幅度提高有关系。我不想否认这个关系,也不想试图证明这个关系没什么作用。但是我必须对此作出一些说明。

首先要说明的是,如果存在不安——很难设想,企业界人士对实际工资水平的不断提高会不感到不安,那就要同时明确断定,从我们的出口在后一个时期的有利发展来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总的说来,我国工资成本水平的提高并不比对我们有重要意义的外国来得快。但是我承认,这在我国的对地位方面——我国对外国的经济地位方面——是会使人感到安慰的,不过,工资成本的这种提高,很可能确实导致了就业机会的减少,即导致了从广泛就业到采用可以代替人的机器的投资的转变过程。那么,我认为,这个现象不可否认地出现了,对此应予以特别重视。很长时间以来,人们认为,采用节约劳力的技术和为此进行的投资在经济上是可取的和在国际竞争中也是有力的这一观点,是不言而喻的。我承认竞争的现实,我接受这样的情况,即这种竞争对自己确定技术革新速度的自由产生了一定的限制。荷兰实际上比哪个国家都更依赖出口,因此它不能为了有更多的就业机会而单独地放弃节约成本的技术。但在另一方面,这不能,也不可以意味着我国应当让自己毫无主见地被技术上办得到的革新的速度牵着鼻子走。如果我们是根据浪费的情况,也就是从节约使用原料、材料和能源的角度,检验我们的生产过程的,那么,把技术上几乎完美但经济上过时的机器替

换下来的做法,应当具有什么意义呢?

调查表明,各企业中机器的寿命仍在继续缩短。扭转这种情况,更多地注意机器的技术寿命并略微地减少那种用资本去代替劳工的做法,会不会是必要的呢?经济规律告诉我们,如果市场上出现一种更加有利可图的、更加便宜的设备,那就应该尽快把它买下来并投入使用。对这条经济规律,应当有清醒的认识。

我知道,当我谈这番话的时候,我又是在无可奈何地说大话。因为,实际上,只有在国际上有效的安排和协议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企业政策的这种变化。起规律作用的不应当是私有经济的利益,而是社会上的有利效果。这种安排和协议意味着,我们又抛弃了自由市场制度中的一个因素。

但是,当我们谈到就业机会的长期发展趋势的时候,我认为,在我国经济,特别是我国工业中,对技术革新速度进行有意限制的问题,是无法回避的,这意味着——我完全有意地把这个观点同我国令人不安的发展状况联系起来——由于承认节约使用原料、能源和材料的必要性,已经产生了一种新的审查投资决定的迫切要求。这也许是令人不愉快的,但我认为是不可避免的。

就业机会和有选择的增长

我还想谈谈需求同失业的关系。之所以说需求方面,是因为我认为,在需求方面有的因素同自觉选择的政策有着密切联系。人们或许可以说,目前表现出来的失业,同近几年来让可以自由使用的收入增长得少一些的抉择有某些联系。请想想看,从1966年到1973年这个时期里,我国私人消费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五点五。1972年之后,包括1975年,如果事实同预测相符,增长速度实际上至少将降低一半,即每年平均增长百分之三。这种下

降是1973年和1974年有意试图减少私人消费的结果，同时也是降低居民可以自由使用的收入的结果。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情况的结果是，特别是在国内市场上，对消费品需求的增长，缓慢下来了。不是主要或不完全为国内消费市场工作的企业部门受害，这也不是偶然的。正是在这个市场上——许多小的和中等的企业在这里活动——出现了严重的灾难，这也并不偶然。人们可以想想纺织工业和服装工业。因此，出现了企业倒闭和失业的情况，这种情况同可以被称为增长的“减慢”、或有选择的增长、或限制国内消费的努力，有联系。引人注目的是，在过去几年国内消费增长减慢的同时，政府的物资支出却没有相应增加。在过去几年中，政府投资在国民生产中所占的份额，甚至还有某些减少。因此，中央计划局说花钱太少是有道理的。所以，不能把所遭到的损失同这一情况割裂开来看。

毫无疑问，在以下两个方面之间存在着矛盾，其中一个方面是政府的要求和社会普遍承认的保持充分就业并用一切手段抑制失业的必要性，另一个方面是有选择性地开展工作的必要性、在扩大生产问题上对环境保护的标准的注意以及节约使用短缺的原料及能源的问题。因此我刚才也就说过，我决不想简单轻率地谈限制增长的问题。要使我上述目标协调一致是对我们的挑战，是我们的任务。我认为，做到这一点并非不可能。但是，在进行这种努力时，也许有必要有意地减少劳力的供应量，例如通过让老一些的雇员有可能早日离开工作岗位。

我希望，我对参与决定权、企业结构和失业问题发表的几点看法，可以清楚地表明，在我看来，我们的经济正在经历一个出现了需要作出明确冷静分析的新现象的发展过程。我认为，倒退到使用专家们或不是专家们提出的关于增加购买力、减轻负担和改善社会情况这种老套套的做法是不能克服今天明显的弊端

的，其中特别是失业问题。我觉得，似乎有必要对这种现象的新特点做另一种分析。

雇员和雇主之间的关系

我既然用了气氛这个词，当然就不能不进一步说说“企业气氛”概念，这个概念常常被用来表示影响企业的投资愿望的全部政府措施。于是有人提出，使投资愿望有所减少的，主要是不断降低利润限额的情况和对私人企业的不断的批评，甚至也许是对私人企业的敌对情绪。

我不想完全否认这些。但是我对这是否起主要作用持怀疑态度。因为，近几年引起人们担心的，并不首先是投资水平本身，而是投资本身明显地从广度转向深度的情况。我并未由此断定，政府因此不需要关心比如人们（包括企业领导者在内）在工作中是否高兴的问题。女王在议会开幕式讲话中说，政府想铲除阻碍政府和私人投资的障碍；例如烦琐的程序和混乱的批准手续中就可能是这些障碍存在之处。

让人们能够迅速和有效地工作的情况，肯定是具有最大意义的。我也没有无视领导企业的人们目前所面临的许多问题，我至少争取这样做。这些问题就是：管理和劳动纪律问题、劳工市场问题、承担企业风险问题；今天似乎没有什么人为这些问题而感谢领导企业的那些人。我心中的印象是，许多企业主感到，各种建议意味着对企业主们在企业中行使决定权的自由的干涉，从而是对自己的威胁。

我很愿意承认这一切。但是，对此我还要说，在工业劳动过程中，许多雇员同样感到不幸。工作的条件使许多可以干得更多的人感到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很单调和自己在那巨大的企业组

织中是无能为力的；这在许多情况下导致了对企业、企业主本人和最后是对整个社会的消极反应。在这种背景下，人们泡病号，消极怠工，找工作的人也不接受分配的工作。如果我把雇员的不满和企业主的不满这两个因素摆在一起，那么我就会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必须清醒过来，必须进一步清醒地考虑企业的和我国经济秩序的结构。

我刚才试图说明我认为必须进行深刻改革的事情。在目前的经济秩序中，雇员和雇主还是相互对立的。一方给，另一方可以拿。但是，你们一定知道，给比拿更高尚。我主张的是一种消除了对立的结构。当我为进一步改革企业结构和使生产过程进一步社会化进行辩解时，我心中想的就是这样的经济秩序，即在这种秩序中，在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上工作的人，都共同管理资本，同雇员之间的矛盾也已被消除了。

我是提到了生产的社会化的，并且坚持认为，它是不可避免的。由于以上被描述的事态发展，它变得更加确切了。但是，我知道，你们中也许很少有人同意这种看法。我要补充说一句，这未必意味着，即使我们所谋求的未来目标不同，我们就失业、通货膨胀和对短缺原料的无限占有这些当前的具体困难的解决办法，不能达成一致意见。

主席先生，无论如何，您在讲话中曾以责备自己的心情问道：我们企业主是否一般都对政府太好了？我因此要告诉您：至少就本届政府来说，您再也不必这样责备自己了！在我没有作出这样的回答前是不愿意结束讲话的。

好好读书是创造性的活动^①

(1975年)

我认为，我这次主持图书馆委员会的成立仪式至少有三个充分的理由。第一，一个致力于实现普遍分配收入和权力这一目标的政府首相不能回避普及知识的工作。这种普及知识的工作则与图书馆事业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第二，我越来越得出这样的印象，即荷兰已分成两个阵营：一个是经济学家们的阵营，他们很了解荷兰情况，但现在还是在互相辩论；另一个是福利工作者的阵营，他们本能地爱谈论事情，但是他们并不十分了解荷兰情况。我作了几次小规模抽查，结果发现在政府任职的经济学家中几乎没有一个人研究过社会文化计划局1974年关于社会和文化问题的报告，而我的印象是，在福利部门工作的政府雇员中很好地读完了中央计划局的1976年的宏观经济学调查报告的人就更少了。也许现在应当是有人至少在这方面试图使政府的桥梁作用免于消失的时候了。

我同意在这儿发表讲话的第三个理由是，我需要作出表达纯朴的谢意的行动。我曾在希尔维瑟姆市的格拉维兰路公共阅览室和图书馆里度过了许许多多小时，这是我年轻时代最宝贵的经历之一。在那里我勤奋地读完了1900年前后几年的德国的《新时代》^②。了解了达姆斯坦同考茨基的斗争、正统马克思主

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推翻社会同改革社会之间的斗争。

我在这里学会了区分科学马克思主义和庸俗马克思主义。我真诚地建议所有专题小组和所有荷兰从事高等教育的机构也来读一读这一刊物。好多年我都在那里度过周末，读了《新声》、《新向导》、《使命》和特别是《大荷兰》、《小笔记本》，以及杜佩隆的著作和德布拉克的著作^③。我当时感到遗憾的是，每到星期六晚上10点钟，或也可能是9点钟，这对我来说是不可想象的早，当闭馆的时间到了，我便被形式主义的工作人员赶出图书馆。

所以我承认，我是爱读书的人。但读书是一种危险的活动。目光短浅、教条主义和愚昧无知的情况中有多少不是读书造成的？你这时还用不着想到数百万册的《我的奋斗》和诸如此类毒化人们思想的书籍所带来的致命性的影响呢。促进读书的、对图书馆事业给予重大财政支持的政府手中操纵着一种可以对自己有益但也可以有害的武器。我一向认为，六十年代中期的革命同一般教育的普及和大战后图书馆事业的兴起是分不开的。提供情报不是一种没有代价的活动。知识既可以用来干好事，也可以用来干坏事。普及知识对于社会安定一点也起不到保障作用。我认为，情况恰恰相反。然而，内阁即政府还是选择了积极的情报政策，选择了普及知识。但正因为知识和情报不仅可以利用，而且也可以滥用，所以必须对政府在这方面的行动提出两点要求。

第一，政府应当实现在获得情报方面人人都具有平等的权利。第二，政府应尽可能保证情报的多样性和完整性，如果读者

① 在荷兰图书馆委员会成立仪式上的讲话。——译者

②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刊物。——译者

③ 杜佩隆和德布拉克是荷兰作家。——译者

欢迎的话,可以用教育上的术语说,要保证情报的可靠性。这是政府在普及知识方面所应当掌握的两个中心出发点。我坚信,“知识就是力量”这句古老的格言,今天也许应当解释为,知识开辟着获得权力的道路,权力又为知识的开发提供可能性,而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便导致财产和收入的积累。而由于有了财产和收入的积累,又可以获得更大的权力和更多的知识,这样循环过程也就完成了。这是一个不断自我加强的过程,突破这一过程是保护和加强民主的一个关键条件。因为,民主所主张的正是应当使每个人都在平等基础上参加政治和社会生活。自治能力和平等地位是民主能否发挥作用的条件。这种自治能力和平等地位可以用普及知识和分散权力的手段来培养和促进,而图书馆正是这一手段的重要部分。

我想,这一点今天比以往更加紧迫。因为我们正在经历一个社会变革加快的过程。人们可以说,在过去的世纪中,一次变革过程往往也需要一代人以上的的时间。那时候,关于社会变革及社会状况的知识和有关的情报都是缓慢地和逐步地传播到人民中去的。当时对社会变革的起因和原因的认识常常只局限和保留于少数几个学者中间。事实上,今天世界上有大约七亿五千万文盲,肯定也有这么多人只学过读书的基本原则,在这些人中间,上述情况仍有效。今天,社会的变化情况每天都通过电视传送到我们的家中。这些变化涉及到每一个人。对情报的需要因此也变得大多了。因此,改进教育的宗旨应当是,要使人们对变化和干预这些变化过程的可能性有所认识。

对变化过程的性质的更好的理解,还可能意味着,可以根据许多人或少数人的利益更好地控制这些变化过程。这同时又一次说明了,在我们这个时代里,知识的普及、情报的客观性和完整性、情报的可靠性和获得情报的可能性,都越来越具有重要的

意义。那么,我今天上午讲话的基本论点是,知识、力量、收入和财产的循环过程很容易变成一个封闭的过程,我们却能够而且应当通过有目的地提供情报和教育过程打破这种封闭的过程。普及知识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普及教育和情报、为自由获得材料和了解事实创造具体的可能性以及教会人们独立地和有批判地使用可掌握的情报。而且,要从儿童时代和最初的小学阶段,也就是从基础教育的年代起,打好这个基础。

扩大受教育的机会和进一步开放情报正是有利于迄今为止还很少尝到过普及知识的甜头的那些人,即处于落后状态的人。这些人中既有成年人,也有孩子,既有要求受教育者,也有提供教育者。

出生环境对一个孩子能产生非常强大的限制和鼓励,这是一个尽人皆知的事实,在这里我几乎用不着解释了。例如,一项对阅读行为和图书馆利用情况的调查表明,在今天的图书馆的成年利用者中间的百分之三十八的人,其父母也是定期在某一图书馆借书的人。在不在图书馆借书的人中,这个比例只为百分之十一。幸亏今天也可以通过其他的各种渠道启发孩子们读书。今天开始的儿童图书周便是这方面人们最熟悉的和最好的例子。另一个例子是承担讲故事义务工作的妈妈,她们或者在学校,或者在图书馆,或者在阅览室里给孩子们讲一些故事。这是让学生的父母亲在学校和校外参加教育工作的一种方式,这种小组活动的办法还是直接同孩子们在家里熟悉的生活环境相联系的。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起点的水平仍然是极其不平衡的。我们试图通过延长学制、通过运用其它的教学方法、通过利用辅导的办法帮助学校,来消除这种起点不平衡的不利影响。教育应当有意识地致力于培养能独立思考和有批判能力的人,使他们

毕业后能够独立地获得他们在社会中充分发挥作用所必需的知识 and 情报。我想，范凯梅纳德^① 大臣和他的国务秘书在《概貌纪要》等文件中所描述的那种未来教育政策中占支配地位的思想主要也是这种思想。但是我要补充说，内阁决不是光起草纪要的，尽管某些人认为这样做是有益的。内阁采取了许多政策措施，例如开展小学和中学方面的试验。我正在考虑成立开放性的小学、对低能儿童的教育特别照顾、以及改进青年职工的教育的问题。

也是这样的背景导致了图书馆已向十八岁以下的青年免费开放。例如阿姆斯特丹公共图书馆的迪门分馆于1972年实行免费开放后，有关其读者的统计数字就说明了免费开放的有利影响。1974年，在那里的十四至十七岁的青年中，就有百分之九十八点五经常到该图书馆借书，而在更年轻的青年和少年中，有百分之七十四经常在该图书馆借书。这同1973年，即实行免费开放前的一年相比，实际上翻了一番。当然，对于培养能够自己去寻找和找到所需要的情报的年轻人来说，学校图书馆和资料中心也做出了贡献。学校和公共图书馆的良好关系也促成了在1974年在公共图书馆登记借阅图书的全部二百二十万人中，青年人差不多占了一半，而实际上青年只占荷兰人口的三分之一。今天，青年人去图书馆比老年人多。谁在年轻的时候学会了把图书馆和资料中心作为提供情报的来源来使用，谁就在后来的年代中可以毫不费力地获取资料 and 情报。

我们正在根据长期教育原则进行工作，以具体实现我刚才描述的对成年人的教育和发展的设想；我已明白，“长期教育原则”已经逐渐地成了一个标准术语，其含义是“活到老、学到老”。

^① 七十年代初登厄伊尔内阁的教育大臣。——译者

也就是说,要使每个成年人有平等的受教育和发展才能的机会,并促使他们也去利用这些机会。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已设计了包括公共学校(接在小学之后)、教育网和学习假期的三结合成年人教育制度。除了象学校和教育中心这些机构外,这方面又要有图书馆和资料机构这些情报中心的参加。

参加这项工作的应当有电台,其中肯定应当有地方电台;此外,按照我的想法,还应当有电影。如果你纵观一下这方面的情况,那你一定会断言说,设备总的来说是有的。最主要的是横向的和垂直的分布。我断定,目前有八百个图书馆设施分布在全国。1950年时只有一百六十个。它们现在总共拥有约二千万册图书和其他资料。这种藏书量同1968年比翻了一番,同1950年比翻了六番。其中书籍仍然是主要成分。我几乎一直在谈阅读,这样太片面了。作为图书馆收藏品中的正常组成部分的直观材料的数量也增长得很快。读者成了听众和观众。此外,由于有了唱片、盒式录音带和电影等,图书馆对那些如果图书馆光有书就不来的人来说,也变得有吸引力了。

事实上,图书馆内容的扩大和相应的读者范围的扩大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事态发展,它肯定比图书馆不久以后是否应该叫做新闻机构的问题更为重要。图书馆和阅览室正在发展为人们会面的场所。我记得,很多年以前我曾把全家带到华沙度假。有一天,雨不停地下,动物园在华沙的另一端,一切都很困难。当时我们就在市中心跑进了一个阅览室,多亏那里有各种各样的新闻资料,使我们能非常愉快地度过了好几个小时。我承认,那里的荷兰报纸只有《真理报》^①。但是,在休假期间,该报也是很宝贵的。

^① 荷兰共产党的日报。——译者

我们力求通过地方机关的辅助职能使科学文献更加直接地送到公众中间去。此外,通过各个图书馆互相之间的图书交流,可以使科学的和许多专业的图书馆共同储藏的书刊向那些不能直接去这些图书馆看书的人开放。具有中央目录并附设交流办事处的皇家图书馆在这方面起着极其重要的沟通作用。这样一来,各个科学图书馆的共同藏书量(1974年约一千三百万册图书、七万七千种杂志和丛书)便可以象盲人图书馆一样对普及知识作出贡献,虽然两者作出贡献的方式截然不同。

在公共图书馆那儿已被视为和已被承认是极其重要的向读者和借书人提供建议的图书馆职能,将在知识的进一步普及中,在图书馆工作中,起越来越大的作用。我还要指出这样一种事态发展,即为了把专业知识用于具体实践,越来越多的人来到了“教育商店”、“法律商店”、“福利商店”和许多其他受欢迎的“商店”^①变种。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商店”制度始终还是受欢迎的。

事实也一再表明,作为新闻工具的电台和电视台的一方面同读书和图书馆的另一方面之间,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在电视兴起的初期,许多人预言它将对读书产生消极的影响。事实正好相反,但这是在不同于格劳乔·马克思^②所指的那种意义上来说的。他在电视时代初期说,电视对于读书有极好的影响,在我家,每当一间屋子里放电视的时候,我就到另一间屋子里去读书。事实似乎是,在电台和电视如此重要的情报作用的影响下,需求已逐渐向非虚构性文学作品的方向转移。电台和电视节目

① 这些“商店”向群众提供教育、法律、福利等方面的帮助和服务,因为象商店一样向群众开放,而且也为所提供的服务或帮助要报酬,所以这些机构也被称为“商店”。——译者

② 美国著名的滑稽戏演员。——译者

对人们的启发，使人们接着向图书馆提出要求。这对许多知识性和情报性的阅读资料有效，但也对象库佩鲁斯的《小心眼的人》和安娜·德弗里斯的《小巴尔特》那样的系列电视片有效，甚至是引人注目地有效。因此，在电台、报纸和图书馆这些新闻机构之间存在着在更广泛意义上的联系。范多伦大臣^①的新闻工作纪要讨论了这种联系。政府方面肯定将促进这种关系。但具体的合作应由这些机构本身来搞，在建立公共学校和所谓教育网时，特别应得到地方政府关心的正是这一点。

人们可以要求从事上述三结合成年人教育制度工作的各种委员会对每一种新闻工具、图书馆、电台、报纸以及电影到底在什么地方和在发挥什么作用的情况下，才最有效地作出自己贡献的问题作出解释。当然，最终一再被提出来的问题是，到底不应该对居民中某些处于最落后状态的人给予更多的关心。我想指出的是，如果今后普及知识的工作同在教育及培养工作中独立学习使用情报资料的联系能受到特别重视的话，那将是很好的。从历史和社会结构上看，政府对教育比对情报供应的关心多得多，这是一个突出的事实。这也许同我国宪法明确规定政府要关心教育，而对于情报，宪法只保障言论自由这一事实有关。对待我们基本权利的这种不同态度导致了比如教育方面的广泛立法。义务教育法、低等教育法、连续教育法、科学教育法，我几乎用不着一一例举了。保障言论自由实际上导致了政府采取不干预和放任态度。

一个迫切的问题是，我们可否就我们的法制下结论说，公民不仅应当有受教育的权利，而且同时也应当有获得情报的权利。使获得情报的权利具有法律基础，难道不是立法者要管的事情

^① 七十年代初登厄伊尔内阁里的文化、娱乐及社会工作大臣。——译者

吗？根据这种权利便可以制订出具体措施来保障行使这种权利的可能性。当然，这方面已经有了开端。比如，1967年的广播法就规定要播放知识性和情报性的节目。有人向议会提交了一项主张行政应当公开的法律草案，按照这项法案，每个人在法律上都应当有权利来了解政府文件。还有范多伦的新闻工作纪要。从今年7月1日起，公共图书馆工作法开始生效，通过这项法律政府明确承认和批准公共图书馆也开展提供情报的工作。我想，在适当的时候对科学图书馆事业作出法律安排是有充分理由的。在大量的情报资料突然进入市场的影响下，图书馆机构逐渐获得了某种独立性。图书馆已变成了为压倒一切的资料洪流疏通渠道的工具。图书馆工作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和一门有自己研究对象、方法和技术的科学。越来越强烈地被提到的一个问题是，防止情报资料过剩这项任务是否特别是图书馆承担的和也应该承担的任务呢？情报资料极其大量的供应在许多方面引起了情报资料过剩。这种情报资料过剩又不断导致了很大的干扰，使人们找不到真正需要的资料。情报的意义在于，它应该是可以理解和被人们听到的。长期培养、不断受教育、终身学习的原则要求使每个人在其一生中都能获得学习的机会，也就是获得情报的机会。在这方面，我仅仅要指出的是，比如说大学图书馆晚间向白天工作的人开放这个人们争论不休的老问题。为了实现知识的普及和获取情报的平等机会，有必要使规模较大的情报中心，例如大学图书馆，也明确地对外开放。这一点也许可以通过建立一个相互联系的图书馆系统的办法来实现，这个系统可以使人们源源不断地借阅荷兰的一切文学作品，并且还可以提供利用国外大规模情报中心的可能性。这里最终涉及到双重意义的开放。一方面是不把任何人排斥在外的思想上的开放，另一方面是技术手段上开放，为此，发展有效的、便于掌握

的目录索引工具,都具有实质性意义。而在这里最终也要注意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同其他教育和情报系统的发展之间的关系。政府成立了图书馆委员会,这既是为了研究我所列举的那种性质的问题,也是因为需要利用图书馆科学的专家和其他学科的专家的成果。谈到图书馆事业的未来,我在建立图书馆委员会的这个仪式上,不能不提出下面的一个非常具体的看法。1974年,国家、省、市资助图书馆的费用达二亿三千五百万荷盾,其中有一亿是国家支出的。同时我们还看到,图书馆的藏书量赶不上借书的发展,人手又落后于借书。毫无疑问,在这个部门中我们的主观愿望同可以使用的手段之间也是有矛盾的。如同在政府工作和私人服务供应部门的各个领域一样,在图书馆事业这个领域里,也应该权衡轻重缓急的情况。我们应该自问,政府的活动对我们本来想帮助的人有好处没有,我们帮助最多的是弱者吗?对于图书馆业的这个特别重要的方面,也应当予以批判性的考虑。

今天早上我们讨论了情报供应、它的必要性和意义、书籍和其他辅助工具以及要使每个人都能利用它们的必要性的问题。这当然不应导致这样的误会,即认为智慧只来源于书本。星期天中午我从阿姆斯特丹中心驱车回家时,我在霍伯马码头那儿驶过了很大的一道墙,墙上有人很早以前就用石灰刷了几米大的大字:“人们要死的,他们不幸福”。这道墙大概座落在海奈根斯酿酒厂和国家博物馆之间。是哪个行动小组用这句话来表现自己,这并不完全清楚,但是,从这句话写到那道墙上已有那么长时间而又没有被人粉刷掉这件事来看,我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一件广为人们所熟知的事情。读书可能是一种消极的事情。作为这样的事,读书应当获得重要的地位。它既是一种消遣,一种娱乐,是进入梦幻世界的大门,也是一种自我保护。这些是读书的不可忽视的作用。如果我们今天在谈论图书馆时光联想到有促

进作用的情报，那么我们这种思想也就是极其狭窄的。这里也确确实实地涉及到读书可以提供的自我保护和消遣。但是，读书不仅仅是这些。关于读书问题我要援引本世纪初一位荷兰诗人的这句话：“如果您读我的诗，那么您必须一起来作诗，而且要沉醉于我的诗。要好象是您自己创作了这首诗，好象不是我，而是您作了这首诗。”好好读书就是参加一项创造过程。良好的读书就是创造。

那种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1977年)

在思考关于议会民主是否无能为力的一系列问题中的一个课题时，我感到，若议会能够控制政治选择，这将对履行议会职能具有根本意义。尽管人们对前几年的内阁^①的政策有许多反对意见，但该内阁的目标无疑是很清楚的。收入、知识和权力的普遍分配曾引起一些人的反抗，也博得了一些人的赞赏，这种做法过去和现在都是一种明确的政治选择。不过，矛盾经常有集中到次要问题而忽视有关社会发展方向的核心问题的危险，这也都是事实。我将试图阐明这个问题。

在《经济统计报》上，范德兹万以《继政策提供的狭窄余地之后，现在出现了政治选择变得日益模糊的危险》为题，发表了一系列引人注意的连载文章^②。这一标题给我的印象是，他对我提供的狭窄余地不表示感谢，但同时他却很担心我们在选择根本政策时会在政治上的空白领域里迷路。我也同他一样担心。

世界一直在努力克服1974年开始的危机所造成的冲突。经济理论上也是如此。1972年，约翰·罗宾逊写了《经济理论的第二次危机》一书。正好一年前，德里豪斯^③在他的演讲中断言：“然而，可以肯定，正如经济科学在它存在的大约二百年中一再遇到的那种情况一样，它现在又面临着一种被一些人称为危机的、它本身无法给予明确和始终令人满意的解释的严重不平

衡局面。”德里豪斯认为，宏观经济学相对贫乏，他还把这个意见同上述论断联系在一起。“为了制造模式而制造模式已成为一种目标，人们在这个过程中对这些模式所依据的假设是否与实际有充分联系并没有产生怀疑。”总的说来，应当责备经济学家们没有充分重视决定着经济行为的制度结构。依我看，这种责备恰恰是人们应对社会经济委员会的经济专家们进行的责备的要害。这些专家们光从他们的模式和关键材料中得出结论，似乎社会的经济政策是在脱离社会的真空中实施的，他们因此也就忽视了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决定着企业主、雇员和政府的经济行为的制度化的结构。看来有许多迹象表明，说经济停滞和社会思想僵化是同时出现的事情的范德兹万是正确的。

以上援引的语录已足以证明我在百忙之中坚持读了一些批判性的文献。我更愿意试一试谈谈我自己为什么认为；从许多方面来说，把1973年至1974年的转折看成是一个时代的终点是有道理的。

危机的开始

工业化国家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惊人的经济增长，是从战后的恢复和社会福利国家的建立的刺激中得到了其最主要的推动力的。在战争年代中被迫加速发展的工业技术，在战争结束后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因此前景似乎无限光明。前所未有的增长数字实现了。大批就业于农业的人以惊人的速度转到了

① 指1973年至1977年在荷兰执政的登厄伊尔内阁。——译者

② 参看荷兰《经济统计报》，1977年第8095、8096、8097期。

③ 荷兰经济学教授，1976年5月29日在阿姆斯特丹发表题为《论宏观经济理论的性质及其对经济政策的意义》。——译者

工业,然后又转到了服务行业来。这一特点在日本尤为明显。

六十年代初期很短的时期里,似乎可以看到这种增长缓慢下来了,这一现象大约与冷战结束同时发生,人们往往把苏联在古巴危机时撤回其导弹看成是冷战的结束。但是,后来又立刻出现了越南战争的升级,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这场战争使美国每年耗费了五百到六百亿美元。这些巨额款项大部分是用赤字开支的办法支付的。这就造成了支付平衡方面的巨额赤字,并导致了1971年的美元贬值和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确定下来的固定汇率制度的崩溃。

这是大危机的真正开端。尽管当时已有少数人注意到了这一点,可我并不属这少数人之列。1972年和1973年,在货币的不稳定局面出现之后,接踵而来的是原料价格的飞速上涨,这一涨价于1973年至1974年以石油价格涨了四倍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接着世界上的购买力出现了大变动,有效的需求的相当可观部分消失了。1974年,危机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美国钢铁工业只以生产能力的三分之二运转。在基础工业中,到处可看到大量的能力过剩。1975年,世界贸易下跌了百分之三。危机造成了经济上的不景气。

我之所以列举上述几个事例,是因为我感到,仅仅在持续的大幅度通货膨胀和利润的减少中寻找经济不景气的原因的做法是相当目光短浅的。通货膨胀和利润的减少当然也在起着重要作用。但是,范登杜尔^①说:“通货膨胀不会引起社会不稳定,它是社会不稳定的结果。通货膨胀不会造成经济崩溃,而是经济崩溃的结果。”这时范登杜尔基本上是正确的。各种事态发展是互相交错的。除了我所列举的几个现象外,在大众消费品的销

① 荷兰工党经济问题专家。——译者

售方面出现的饱和现象,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战争、人口增长和家庭的松散所引起的住房紧张现象不是那么严重了,汽车和电视机的普及也不那么快了。在家用器具方面,重点正由增添新器具转向更新旧器具。与三十年代的区别是很明显的。当时出现了物价猛烈下跌,现在出现的是通货膨胀的急剧上涨;当时出现了对贸易潮流的自我毁灭性的限制,现在占支配地位的是维持贸易自由的努力;当时有些企业部门的失业率达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现在达百分之五十。

但是,由于同三十年代的比较是不足的,我们也就很需要充分研究现在的危机与战后几次经济衰退的不同点。人们相当普遍地意识到失业和增长缓慢下来的状态的顽固性。人们多半倾向于把一切全部归咎于前几次的长时间的通货膨胀和利润的减少,然后他们却还是以回到老的一套去的主张去继续自己的争论。他们硬说,只要利润恢复了,一切就会好的。其明显的例证就是伦敦经济首脑会议的公报,该公报简明扼要地概括了自我鼓励的许多例子。

一个同样很说明问题的例子就是前财政大臣、自由党的维特芬^①的观点。在他的一次值得听取的讲话中,人们可以发觉他对问题也没有把握。在说明去年后半年生产的突然停滞时,他谈论了什么“1976年内某些令人迷惑不解的事态发展”。他让人们在确定价格的过程中注意到“预测”的关键作用,并以此解释了投资者方面的观望态度。

关于必须考虑到原料和能源的根本性短缺这种深刻认识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罗马俱乐部的论点起初似乎只是被一些爱

^① 荷兰自由民主人民党人,在七十年代长期任国际货币基金主席。——译者

思考问题的人所接受。但事实表明，那仅仅是一种假象。早在六十年代后半期，西方工业国的生产的社会费用负担就已经增长了，在七十年代，它们的生产便被限制、推迟或取消。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宇航技术若干年以来一直吸引着世界，现在人们却认为完成这项工作是没有把握的，所以现在这项工作已停滞不前。

是终点还是转折点？

有人把上述同时发生的许多变化看成是综合经济局面的漫长的、上升的浪潮的结束，这是可以理解的。作为曾经在大学里愉快地度过了许多时光来听萨姆·德沃尔夫^①的演讲的人，我对上述看法不是没有同感的。特别是基础工业能力大量过剩的出现使人们回想起那种情况。但是，即使在某些方面可能有可以相互比较的地方，但这次和以前的几次经济总崩溃之间也有深刻的区别；而我认为，我们必须认清我们目前所处的世界经济发展的这一方面的完全独特和奇特的性质，以便能够理智地确定我们自己国家的可取的社会发展。然而，萨姆·德沃尔夫仍然坚持预计工业国的工业生产将能恢复百分之四的增长率，这一增长率比六十年代的低一点，但仍然完全没有脱离旧轨道。

实际上，这种看法只考虑两个因素，即作为石油涨价的结果的通货膨胀和购买力的转移。我认为，这种研究问题的方法是有缺陷的。在前经济事务大臣、基督教民主联盟的范登布林克的观点中，我发现了一个明确的、更为现实的观点。他断言：“绝大多数高度工业化国家已变成其许多市场呈现饱和现象的福利

^① 荷兰经济学家。——译者

国家。如果不及时出现新的外来刺激，我们就将面临经济增长缓慢、投资速度很低、失业率很高、通货膨胀有所减少、利润不能令人满意和经济上要冒较大危险这样一段相当漫长的时期。”

范登布林克认为社会不会接受这种事态发展，并下结论说，正如人们需要两条腿走路一样，工业世界和发展国家的经济是互相需要的。“而在完成我们目前面临的漫长的经济征途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一条腿肯定同工业国家的一条腿一样重要。”

读者不会感到奇怪的是，甚至在高级银行事业方面，我觉得我自己同基督教民主联盟的范登布林克比起同自由民主党人维特芬更接近。同时，范登布林克也把所发生的事情说成是经济总局面的现象，而且是一种深刻的现象。我的估计与此不同。我认为，上述现象中的某些现象是永久性的。我认为，其中就有消费品市场的饱和状况、能源和原料的根本短缺和人口增长的缓慢速度。

几年前退出政治舞台的联邦德国发展援助部长艾哈德·埃普勒写了一部题为《是终点还是转折点》的十分吸引人的书。那么，我似乎觉得，从某些方面来看，以上所描写的现象意味着十八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并作为工业革命载入史册的那种光辉灿烂和戏剧性的发展，现在已经结束了。

在竞选迫在眉睫的时候，我特别反对以预言家的姿态出现，但是，当我总结这些现象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在许多方面已经进入了古典资本主义的末期。

或者换句话说，作为西方二百年来发展动力的帝国主义制度已达到了以前并不是如此近得可怕的界限。工业世界的生产能力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销售问题；面对西方的扩张主义，一个自给自足的中国和一个已非殖民化了的第三世界组织了自己的石油和原料卡特尔，来同西方进行谈判，并迫使西方同它们进行互

利的交易。

永久性的变化

我的看法是，以上提醒人们注意的事态发展在性质上不仅涉及到经济的总局面，而且其中也有一些是永久性的变化。由此可得出下列一些结论：

一、造成了 1974 年出现经济倒退的某些事态发展，将在较长时间内导致更缓慢的经济增长。

二、必须永远考虑到原料和能源的短缺，也就是更加昂贵的能源和原料价格，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工业国的繁荣的增长的限制。人们越来越多地被迫在服务性部门，特别是非市场部门寻求就业机会这一事实，强迫人们永远保持这样的状况，即集体部门占整个经济的比例相对高。

三、不论从使工作更人道，还是从节约稀少的原料和矿产，还是从实现全面就业的角度出发看问题，在生产过程中有选择性地采用新的技术发明是可取的。

四、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我们至今成功地实现了全面就业，现在我们必须比以往更缓慢的经济增长的基础上，满足人们对全面就业的要求。

五、在缺乏象工业革命中产生的那种在工业世界内部能刺激需求的因素的情况下，就需要使需求社会化，也就是说，社会本身应创造需求。这种需求主要应当在服务性部门中寻找。

六、通过有目的地扩大发展中国家的有效需求来恢复传统的市场经济，似乎还是可能的。维特芬暗示了这一点。在最近几年的几次经济首脑会议上，这一点也确实被当作一种可能性提出来了，但是迄今为止，这一点并没有导致有深远意义的决

策。我当然认为，作为这样一种新措施的一部分，象荷兰这样的有盈余的国家应当真正地增加发展援助。

政治选择

从这些经济分析的结论可以很容易地引出下列政治选择：

- 一、赞成还是反对从结构上提高发展援助？
- 二、赞成还是反对大大加强资本在生产中的作用？
- 三、赞成还是反对检验私人投资在创造就业方面的实际效果？
- 四、赞成还是反对减轻私人企业的负担？赞成还是反对根据社会的条件系统地管理投资？
- 五、赞成还是反对把现有的工作有意识地分配给所有的劳动者？
- 六、赞成还是反对把节约能源消耗置于首位并始终一贯地把选择能源同其对就业机会的影响相联系的能源政策？
- 七、赞成还是反对在政府指导下对经济秩序进行调节和制订计划？
- 八、赞成还是反对全面的收入政策？赞成还是反对有意识地使经济决策组织民主化？

各个政党的政治纲领必须受到这些政治选择的各种可能性的检验，这些可能性是对目前形势的分析的结果。

这里所阐述的思想，实质上并没有偏离我比如在1974年10月1日的奈梅根会议上谈过的那些东西^①。我暂且不谈这是由于思想贫困呢，还是由于思想上的一贯性。

^① 参看本选集中《社会主义和自由企业式生产》一篇的内容。

我甚至还可以说，多次被断章取义的我于1973年石油禁运期间发表的电视演说的意思也是这些。那样一种廉价能源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前几年的情况只不过证实了这一点。

1973年是一个长期发展的终点。这个终点能否成为建立新秩序的转折点，这要由我们去进行选择。我在奈梅根的讲演中被攻击最多的一点是，我对技术发明的运用速度应当受到批判性检验的观点的辩解。我当时补充说，应当在国际上进行这种检验，但这并没有能阻止许多人大喊大叫：“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这种做法不是会使自己的商品在市场上卖不出去吗？”然而，对技术发明进行批判性检验的思想近年来仍然渗透到了广泛的领域中去。在国内和国际上，技术发明减少了，同时却出现了保持小企业的生产的愿望。

政治上最现实的选择，是在要么只依靠减轻企业界的负担和提高企业界的利润和要么应当由社会确定资本来源和投资决策的方向之间的选择。人们经常把这种选择同私人部门和集体部门之间的矛盾相联系起来。在许多方面，这种矛盾只是一种假象。我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集体部门的扩大，几乎都没有导致政府投资和消费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有所增长。政府和保险部门的再分配职能倒大大加强了。但是，税收的增长仅仅意味着政府作为中间环节在各个方面之间起到了杠杆的作用。中央计划局在《1980年的荷兰经济》这份调查报告中断定，根据几十年来的数据，在抽税之后，国民收入中私人所占的比重一直引人注目地保持稳定，即一直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七十八。

我并不想否认政府作为中间环节的意义，但是，政府的直接开支的增长只是有限的。

我因此认为，害怕正在威胁我们的官僚主义化和害怕集体部门的增大会意味着个人自由的结束，都是没有实际根据的。

政府的影响

在所有谈论社会福利国家危机的人们中间，许多人担心作为领导中心的国家会负担过重。他们主要担心的是过分的官僚主义、杂乱无章的管理以及对事务的漠不关心态度，他们认为这是福利国家的特点。

我请大家听听我对上述看法的反驳，我将说明人们说国家和政府都拥有很大的权力这种情况多半是一种假象。在这里，我指的首先不是在这方面经常提到的跨国公司同各个国家和政府相对抗的权力。这种权力不是不重要，但在我们社会中也并不是最重要的。我们有更充分的理由来注视政府在大量的调节机构和组织中间的、多半是活动幅度很小的作用。当我一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又回到了“议会民主是否无能为力”的说法。这正是因为，政府是在同社会利益集团的不断的相互作用过程中行使权力和施加影响的。向政府施加压力的集团这一现象及其影响已多次分析过。

由于政府政策科学委员会系统地归纳了各种咨询机构和磋商机构的情况，该委员会在使人们更好了解所谓的第五种权力的作用方面已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第五种权力^①——这个术语我认为是记者林德内尔那儿来的——在我国的体制中发挥了了不起的作用。在劳工关系、福利政策和教育方面都是如此。人们也同样可以说，国家权力并没有得到加强，相反，应当更多地认为，由于第五种权力的发展及其相互间的联系，国家权力瓦解

^① 指各种咨询机构和磋商机构的权力。其它的权力机构有政府、议会、大企业、群众组织等。——译者

了。各种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地成体系的结构——这种结构例如在教育领域中远未消失——已为此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因此，如果人们注意到，政府和国家是怎样必须——以一切可能想象的磋商方式——同私人组织、大型企业以及代表各种利益的机构共同掌权，而且也确实是每天同它们共同掌权的话，那么，在这种背景下惊呼这里有一个魔鬼般的、至高无上的管理一切的国家，也就是相当愚蠢的了。卡夫卡^①式的情景在政府机构中是找不到的，但在第四种^②和第五种权力的互相交错的地方却可以找得到，在这两种权力交错的地方，政府机构和私人组织是互相配合的，是经常进行磋商的，在这里，已无法追查各种政策是在哪儿准备的和决定的。凡是政府权力被私人组织——在福利国家里人们把这些私人组织称为“机构”——共同掌握的地方，就是要出现模糊不清的情况的地方。磋商式经济、联合政府的模式、卡特尔式民主这些概念则都是表明政府在行使权力方面的实质上有限性的名称。对此，我要补充说，社会福利国家并没有触犯某些资产阶级的自由，实际上却加强了他们的自由。正当我们处于转折局面的时候，以国家的咄咄逼人的过于强大的权力，或以令人窒息的官僚主义作为论据来反驳主张政府对资本和投资给予指明方向性的影响这种观点，反驳主张在国内和国际上建立检验经济发展的可能性的机构这种观点，都是无济于事的。在我们的社会中，可以找到许多形式的官僚主义，但是，我重申，它主要出现在私人机构同政府共同掌权的那些地方。

我认为，作为对以上描述的形势的回答，政治家的任务是，

① 1883—1924年，捷克作家，超现实主义，专门描写生活在杂乱无章的、无法理解的世界里的人的绝望，使人感到生活是一场恶梦。——译者

② 指群众组织和群众运动。——译者

应当重新制定政治方向，应当致力于在新关系下实现全面和合格的就业机会这一目标。而第一个必须做出的选择，就是在有关的认识方面的选择。我丝毫没有令人怀疑地说过，根据我的看法，只有通过政策进行结构性调整才能克服目前的经济停滞。我已经极其简明扼要地列出了供选择的因素。这里涉及到的是能使购买力以比过去更大得多的规模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去的选择。这涉及到我们在考虑到接受从发展中国家来的进口的情况下，要不要对我国自己的经济进行调整，布隆克^①和吕贝尔斯已为此采取了某些极为慎重的步骤。这就需要重新制订技术发展的方向，迄今为止，技术发展的目标几乎完全是代替体力劳动和谋求大规模的生产，这也需要人们希望并争取实现加强对经济的管理，以致重点被转移到了劳动密集的生产部门。这就要具体制定符合节约能源的需要和致力于最大限度地采用对就业能作出贡献的技术的一项能源政策。这里涉及到对需求具有重要意义的社会化，也就是在已说过的那种意义上的社会化，即政府不应当不愿意自己去创造通过市场创造不出来的那种需求。但是，这里也关系到要获得能实现进行这种重新制订方向的手段的愿望。因为，政治上的试金石很少是关于目标的问题——每个人都希望幸福和和平——而几乎总是创造和使用必要的手段的愿望。登厄伊尔内阁向议会提出的所谓改革法案却被说成是社会主义信条的教科书的产物，我对此很痛心，而且也认为那种说法是不正确的。这些改革法案同社会主义教条很少有什么联系，实际上是毫无联系的。这些法案完全同我们为了能实现一种旨在重新分配收入的政策而迫切需要掌握的可以用来管理资本和投资的具体手段有联系，而这种旨在重新分配收入的政策则

^① 荷兰工党经济学家，1973至1977年任荷兰政府发展合作大臣。——译者

是重新确定生产方针的条件。这些法案包括投资帐目法、扩大企业委员会的职权和独立自主法、财产增长分配法、收入公开法。我仅提这几个。它们一个一个都是不可缺少的手段，如果缺少了它们就无法实现必要的重新确定方针。

各种政治流派和政治选择

如果范德兹万关于在狭窄的选择余地出现之后，必须警惕政治选择方面的模糊情况这句话是正确的话——我在开始讲话时就已赞成他这种意见，那么，我也许可以再次以普通经济学家的身份提出这样的问题：在所必须做出的政治选择面前，各种重要的政治流派采取了什么样的态度呢？

一、自由主义流派的态度

至于所谓的自由主义方向（在我国，它经常根据某些我认为有时是不可靠的理由，被人们同自由民主人民党这一政治组织相联系起来），我是作为局外人提出看法的，这样，我就可以对它进行评头论足，但是必须承认，这种方向的选择是清楚的。总的说来，该方向选择的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提纲。如果看一看特尔德尔基金会关于经济秩序的报告，就可以发现它主要相信的是市场机制的作用。一切都是为了恢复市场机制。它认为减慢增长速度阻碍经济发展，它不认为我们可以有意地致力于减慢增长速度，也不认为，从根本来说，减慢增长速度是不可避免的。该报告没有给一项包括所有收入阶层的收入政策留下余地。他们认为，目前的经济秩序已使我们大获其益，保持和维持这种经济秩序是最明智的做法。

二、社会主义流派的态度

在社会主义的流派中，我发现了一些与上述相反的观点。我不能总是弄清那儿究竟在谈论一些什么；社会主义流派的变种也很多。但是我自负地认为，我对在荷兰最大的政党内发生的事情还是有一定了解的。那么，可以突出看到，该党内是非常明确地为建立一个以变化了的世界力量对比为基础的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为有意识地把权力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和为建立一个合理的国际秩序而系统地实现再分配的手段进行选择的。这些流派十分明确地接受和强调选择性增长的必要性并愿意为此创造必要的手段。它们也高度重视劳动的再分配。它们对需求的社会化寄予很大的希望，也许寄予了过大的希望。它们把所需要的旨在重新分配收入的政策置于一项总政策的中心位置，该总政策涉及一切收入阶层。它们强烈希望劳动的人道化和改善劳动质量。它们致力于把按量计算报酬的劳动政策变成按质计算报酬的劳动政策。

三、基督教民主主义流派的态度

描述基督教民主主义的流派要更困难一些，但还是可以在离政治中间派领域不远的地方找到这一流派的，读者们对此可能已经猜出来了。谈到纲领时，又应当把这一流派同自称它是基督教民主主义原则为依据的最主要政党联系起来，这时我不得不下结论说，该纲领的主要制订者、阿姆斯特丹的哥德兹瓦尔特教授所采用的许多想法，都同我在今天上午这极短的时间内试图提出来的观点相一致。但是，这么说并没有把这流派完全描绘出来。在经济统计局 1977 年 5 月 11 日所提供的一份文件中，我看到了一份由基督教民主联盟主要候选人、“神圣的国

家基金会”的律师所写的经济纲领。当然，我以极其赞赏的心情阅读了这份纲领，当我听到自己发表司法方面的言论时，我也是经常孤芳自赏的。但是，我也看到了一小段关于今天上午如此吸引我（我希望读者也和我一样）的问题的解释，即有关结构性失业的最重要原因的解释，在这段解释里，我看到了：集体部门同私营部门的比例、劳动收入的份额、技术和社会基础结构都发展不够的问题。这样一来，我找到的不同于关于利润的减少、利润的不足和与市场协调不足的发展这些一般思想所包含的因素的其它东西并不多。因此，我感到，我没有找到必须进行哪些政治选择的明确答复。当谈到手段的问题时，情况更是如此。在我看来，在基督教民主联盟的这份纲领中，就目标而言，它的确存在着许多同我们相同的思想。就手段而言，我认为，如果把重新确定我国经济的根本方针当作目标的话，那么，那份纲领中提出的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也是不够的。旨在重新分配收入的手段几乎完全没有谈到。这份纲领主张严格地依赖市场机制。我认为，尤其从议会民主的有权与无权的情况的观点来看，这种做法是会造成问题的。

这样，我又回到了读者们的一套报告和我的说教的开端：议会的权力取决于政治选择的明确性和可观察性，也取决于检验它的可能性。作为一种制度，议会民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政党和各政治流派是否愿意在必须作出重大抉择的问题上，及时地和明确地表明自己态度的问题。那种发展和潮流在六十年代末、在整个荷兰政治中是存在的，而且还有某种狂热性——这是为了使自己的纲领更为明确和为了能在大选前向选民们说清楚，自己准备同哪些政党合作以及合作的条件。在近几年的时间内，它们却被挤到了后面了，我对此是很遗憾的。我的看法是，这种情况对议会民主发挥良好作用的情况是很大的威胁。要确

切地说明哪个政党在其中表现好，哪个表现不好，这不是我干得了的事情，尤其是此刻不是我干得了的事情。我最后的印象是，在这么多年的大学里的民主化过程之后，有些事情现在不需要由我来说明了。

确信我们在经济上已进入一个转折点的人都会知道，政策变动的余地也是很少的。象我提出的那种变动和重新制定方向，只能在克服巨大的反抗和采取一项特别有针对性的政策的情况下，才能实现。今后几年，开展工作的余地确实是很少的，只有当方向和政治选择很明确时，在只有很小的余地的情况下开展工作才有意义。我非常明确地说过，我的看法是，必须选择对生产和消费进行进一步调整和计划的方案，选择社会化和劳动的人道化，我还认为，几天后将要举行的大选，除了是受人欢迎的民主精神的节日以外，还将就要不要进行我提出的选择这个问题作出决定。

欧洲市场经济的未来^①

(1978年)

近几年来，人们又讨论在自由企业方式生产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事例来说明这种讨论的情况。从全球范围来讲，就有1975年秋的联合国特别会议关于促进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决定。对许多人来说，这种观念始终犹如一种灾难。实际上，建立这种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是穷国和富国之间进行的最重要的谈判的议题。

在我们这些国家里，人们正在围绕着政府对经济生活施加影响的程度以及将强加给企业的约束的程度进行斗争。实际上，这场斗争很早就存在。人们可以心安理得地说，这场斗争从上个世纪七十、八十年代实行社会法时就开始了。因为现在在许多国家里，集体经济部分占国民收入约百分之五十或百分之五十以上，这一场斗争是在发生了变化的背景上进行的。许多人把政府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的增加看作是自由企业方式生产的结束，是对议会民主的威胁。

持后一种看法的一位显赫人物就是米尔顿·弗里德曼^②，他在1976年底，题为《我们不敢逾越的界线》一篇评论中断定说，在集体经济部门的比重接近于国民总收入的百分之六十的时候，民主制就要完蛋，一个富有强迫性的国家就将产生。

这种评论方式确实也在企业主中间受到欢迎，仅仅因此人

们就应当力图尽可能清醒地正视事实。

对于市场经济这个概念，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进行理论上的讨论。我不相信，这个论坛是讨论这个问题的场所。我满足于断言，这场世界范围的讨论的主要问题是，究竟是应该制止近几十年来出现的政府对经济发展的越来越大的影响，还是应该实现我国经济制度的社会化呢？

为了不使人们对我在这次讨论中的立场产生误解，我要强调指出，我认为，为了能由全世界的、欧洲的和国家的社会机构对经济进行整顿，自由企业方式的生产必须进一步后退。假如我们不肯这样做，那么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经济停滞现象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紧张局势就将日益加剧。

建立经济决策机构问题不可能同目前西方经济所遭受的严重困难割裂开来。1974年和1975年开始明显表现出来的经济增长和世界贸易上的衰退，最初被看作是我们在战后时期所经历过的许多局部衰退之中的一次。

实际则不然。尽管美国经济有某些复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国际收支的巨额赤字为代价的，但是前景仍然是暗淡的。我觉得，现在毫无理由指望在近期内恢复我们在五十、六十年代所经历过的那种经济增长。

我们之所以这样说可以列举出三点理由。首先，绝大多数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都已经变成了福利国家，在这些国家中，特别是耐用的消费品市场表现饱和现象。当然，人们可以想到象我

① 登厄伊尔 1978 年 1 月 27 日在“欧洲管理论坛”在瑞士举行的国际会议上发表的讲话。——译者

② 1912 年生，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长期在芝加哥大学教书，创立了“芝加哥学派”。强调货币的作用。1957 年发表《消费职能理论》，1962 年发表《资本主义和自由》。——译者

们在工业发展初期所经历过的那种新的、可能导致需求膨胀的、外来刺激。依我看，只有当富国更多地把收入转让给发展中国家，才有可能获得外来刺激的可能性。但是工业化国家方面并不具备转让收入的政治条件。在这一方面还应当提到西方国家的人口增长的缓慢得多的速度。

第二个原因是罗马俱乐部已向我们指出过的能源和原料的根本短缺。因为能源短缺，能源现在就贵了，将来还将继续是昂贵的。不管选择什么样的解决办法来满足我们的能源需要，都可以肯定地说，以能源危机告终的廉价能源时代已从1973年起，一去不复返了。

从保护环境的必要性派生出来的要求也属于这个范畴。环境保护迫使我们采用有选择性的增长率和在发展我们的经济，特别是发展工业时，注意一切条件。

第三，技术的发展导致了就业问题发生很大变化，以致在未来几十年中，无论如何也要把劳动市场上供应的劳动力转移到没有利润的经济部门。这就意味着，相对地说，提高生产率和恢复较高的增长率是不可能的。

最后，应当考虑到，过去，刺激资本主义增长的许多因素是殖民主义大国打开新市场带来的。由于在世界大战后实行了非殖民化，现在这种可能性也就不再存在了。在许多方面都应断定，曾在西方工业发展的二百年中存在的那种动力已经消失。

这种看问题的方法是有争议的。在麦克拉肯去年因受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之托而发表的报告^①中，一些有才干的经济学家们得出结论说，恢复过去那种高增长率是可能的。但是，我在这里要补充说，麦克拉肯的报告也主张采取一系列措施，特别是

^① 该报告的题目是《走向充分就业和价格稳定》。

控制需求的措施，这些措施将会导致市场经济相当可观的进一步调整。同时，不可否认的是，现在人们正在提出另一种经济活动的动机，这个动机与长期以来西方经济界梦寐以求的那种无限制的增长是背道而驰的。这种动机并不排除增长，但确实要求不断地根据其对就业、收入差别、劳动质量方面的效果检验这种增长。

我认为，在欧洲肯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受这些标准的约束。但总的来说，并不是政府干预使经济增长下降了，而是进步的动力枯竭了，才导致了政府影响的扩大。

在工业发展过程中，市场经济受到了许多方面的限制。政府作出了规定，以保护工人的健康和安全。缩短工作时间、社会保险以及为保障就业的积极努力都导致了我們称为社会福利国家的那种制度。

人们一般可以说，绝大多数企业主也接受福利国家的基本原则。他们的反抗是针对政府的进一步插手、政府对经济的引导和政府对企业活动自由的打击的。几年以前，亨利·基辛格在关于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讨论中指出，“目前这种制度对我们是很有用的”。我并不否认，比如在世界大战后发挥作用的那种市场经济，曾促使福利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同时，我也断言，在一些极其重要的问题上，市场经济严重地失败了。

这首先是指国内的以及国家之间的收入分配问题。关于这一点，我想引用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大约在一年以前，在向世界银行董事会所作的讲话中所说的这番话：“如果我们用现实主义的眼光观察一下当今的世界，那么我们就可以明显地看到，对更多的公道——各国内部的和各国之间的每个人的更公道和更合理的平等机会——的向往，正在成为当代人们最关心的问题。一个世纪或更长时间以来，这种趋势的势头正在不断地增长。工

会运动的兴起、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民权的扩大、妇女地位的提高——这些诸如此类的运动，都有着一个共同的成分，对更多的社会公道和更平等的经济机会的强烈要求。

“在过去的十余年之中，最贫困的国家的十亿多人的每人平均收入几乎没有增加。据统计，他们收入的增加每年只有两美元，从1965年的一百三十美元增加到1975年的一百五十美元。但是，任何统计数字所无法说明的是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人由于贫困而遭受的非人般的歧视。”

麦克纳马拉在全球关系方面断定的东西，在欧洲和各国的范围也同样有效。即使在欧洲共同体内部，各地区之间和各种职业之间，收入差别之大还是罕见的。政府旨在重新分配收入以加强弱小者地位所采取的行动，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对于防止在经济增长甚少的时期出现严重的社会紧张气氛，也是必不可少的。

市场经济严重失败的第二个关键原因是原料和能源的枯竭。1973年石油涨价四次使我们都吃惊。其实，只要稍微计算一下，就会明白，如果自1950年以来石油也随着工业品价格一起上涨的话，物价也会上涨的。现在的物价上涨完全合乎这种计算的结果。换句话说，物价上涨是新的原料短缺的表现。

这一切或多或少地也对1974年和1975年达到了高得多的价格水平的其他原料有效。毫无疑问，如果西方经济继续越来越多地占有能源和原料，工业品和原料的交换比例将进一步朝着有利于相对稳定的、巩固的原料价格比例的方向变化。

谁要是清醒地观察最近几十年中西方经济对原料和能源的消耗的日益增长，谁就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这是对我们自然资源的一种完全不负责的掠夺。

最后，市场经济制度在贯彻其开放和自由贸易原则方面也

同样失败了。由于过高的生产能力支配着工业的形势，关税和贸易关税壁垒正在起很大的和重新是威胁性的作用。资本的“自由”流通并不存在，知识和技术的“自由”交流也不存在。说市场经济是供货者可以平等交往的市场是一种虚假的说法。

特别是收入分配中的不平等导致了人们渴望重建世界的经济结构并致力于发展中国家将能够获得优先地位的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在这方面的进展还是很小的。南北对话没有导致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基础。发展中国家热切希望建立共同的原料基金，以稳定自己的出口，但这种希望也没有导致什么成果。

由于受到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影响，或许可以说，在穷国和富国之间的关系方面已出现某种停战状态。去年年底，石油价格没有提高。这是件很幸运的事，但是我不能摆脱这样的印象，即这只不过是在时间上推迟处决。如果在改革我们的国际机构，首先是在改革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方面，不能取得进展，如果不能通过这些改革保障第三世界国家的平等地位，那么不久前已经表现出来的工业化国家同第三世界之间的紧张关系将再度加剧起来。

在这场改革世界经济结构的过程中，欧洲共同体将要发挥自己的作用。幸运的是，欧洲共同体已经着手制定能源、环境和工业方面的政策。通过制定中期经济政策规划，向各个民族国家和跨国公司提供了确定自己方针的依据。实际上，欧洲共同体建立初期的那种高度自由的制度正在逐步地被一种新的制度所代替，这种新制度的内容包含着欧洲共同体一级的大规模指导和计划。在我们这些国家内部，对经济发展的进一步规划和指导的怀疑集中表现为对进一步扩大政府任务的反抗。我重申，这是一个老问题。一百年前，瓦格纳^①提出“关于国家活动不断扩大的规律”。他当时预言，随着繁荣的增长，人们对公共物品的

需要的增长将会超出正常的增长幅度，公共事业部门也将会不断地发展。熊彼特^②曾认为，由于技术的发展，政府影响的扩大是不可避免的。

导致需要更多地对国际秩序进行整顿的理由，在各国的经济中也存在。在经济增长缓慢的情况下保障就业要求人们严格掌握投资。在传统的需求已不复存在的地方，政府应自己创造需求。技术的发展也同样需要批判性的检验。现在普遍地存在着放弃大规模技术的倾向。我指的是，社会正确地对超音速飞机提出了反对意见。协和式飞机就是例证。社会也反对再搞更大的超级油轮，因为使用这种油轮的风险和社会所承担的费用都是巨大的。我指的也是，宇航试验的经费也已经受到了限制，因为事实表明，这些试验对社会的用途比开始时所设想的要小得多。在这方面，我指的还有核能应用的发展速度缓慢下来的情况。我认为卡特总统对此所提出的警告和保留是正确的。

一个以社会的需求来确定生产、要保护环境、提高劳动质量、对技术发展施加影响、同时又要制止通货膨胀和保障就业的社会，需要一个能够提出明确任务的政府领导。

认为如果集体部门的比重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以上，民主将会遭到威胁，公民的自由将会遭到威胁的看法，无论如何是毫无根据的。

美国人威伦斯基在他题为《福利国家与平等》一书中，竟对整个世界六十个从自由民主到集权主义的国家的性质进行了研究。他得出的结论是，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各国社会保险费用

① 1836—1917年，德国经济学教授，专攻国民经济理论、银行理论、统计学理论，主张取消土地私有制。——译者

② 1883—1950年，现代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原为奥地利人，后入美国籍。——译者

占政府预算的比例同政治制度的性质或同人民所拥护的意识形态毫无关系。事实证明，社会保险费用占政府预算的比例和集体部门的规模都取决于国民收入的多少和诸如人口年龄结构这些次要因素。

一个社会越是繁荣，其服务性行业也越是根据繁荣的程度在经济活动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这既对市场部门，又对利润部门有效。这种发展将不可避免地使集体部门占据很大的比重，企业主们不得不接受这种情况。

凡是建立庞大机构的地方，到处都出现有关官僚主义和有关公民权利的保障的问题。至于这些机构属于个人人寿保险公司，还是属于私人福利组织，还是属于政府，这都没有什么区别。人们处处都需要对决策有透彻的了解和对公民权利的保护。政府组织的好处在于，在议会民主制度中，被推选出来的人民代表可以对此进行监督，并且可以撤换社会制度的管理人员。

对生产工具的占有在这一切中只起次要作用。企业主和企业的作用在这种事态发展过程中已彻底发生了变化。企业主只能在法律和有关规定所许可的范围内执行自己的政策，企业主往往把这种情况体会为对自己的束缚。认为起着保障自由的作用的政府法令一定比竞争者的活动更严重地束缚企业的看法，是很大的误会。企业主们不应当看不见这样的令人感到幸运的事态发展，即除了物质方面以外，每个人的自我发展和发言权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人们不仅要有工作做，而且要有舒适的工作。对更大和更好的事业的信念已让位给对能满足一种社会需求的产品的需求。如果政府和企业领导双方都愿意在伙伴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决策，那么它们事实上也就以此对集权主义的倾向进行了反抗。

将代替自由企业方式生产制度的是企业在其中发挥自己作

用的一种社会化生产制度。决策的自由是受到限制的，这样做是正确的。大规模发展的可能性比过去更少，但是，这样做未必使在企业里工作的人更少有机会满足自己愿望和承担任务。

对生产和分配的必要的社会化的答复是人们对这个过程的参与。无数本国公民的工作一向在于为其他人执行任务。今天我们非常希望这些人可以参加讨论并理解这些任务。实际上，人们对企业主没有其他的要求。

展 望 未 来

(1978年)

我们能活到 2000 年吗？

1978年7月，在举行大国首脑会议的同时，从1968年成立后已存在十年之久的罗马俱乐部在罗马举行了一次会议。经济首脑会议的成果受到了人们的热烈的欢迎。重要的国家联合起来了，并采取了措施以促进它们的经济以及世界贸易的增长。而意大利工业家、罗马俱乐部的先驱佩切伊却在罗马谈到目前世界经济正在出现螺旋式下降的趋势。“十年前，充满着巨大希望的气氛还占据着支配地位。现在世界所处的局势却似乎从根本上恶化了。消极的倾向正在不断地得势。”

首脑会议的目的旨在鼓励人们对复兴经济抱有信心，这个目的也许达到了。而在罗马研究未来的人们认为，如果不进行彻底变革，经济发展将以一次灾难告终。但是，实干家和思想家的两个世界是互不相干的。制定政策和进行分析似乎是相互分离的。在过去的若干年中，人们开始根据世界各地区之间的发展必然有联系这一点，统一抓经济；这些年代似乎一去不复返了。经济发展的第二个十年阶段快要结束了，这个十年阶段将几乎完全没有实现所提出的任何一项目标。南北对话已经告吹。第一次保护环境会议（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已被写进了联

合国家家庭的史册里。看来赫尔辛基会议（1975年）与其说是新时期的开端，倒不如说是一种事态发展的终止。联合国特别裁军会议几乎是无声无息地结束了。

前经济事务大臣吕贝尔斯不久前用来描述经济增长的问题的提法是七十年代末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的典型例子。他说：“现在的情况和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情况不同了。在那个阶段许多人认为，在经济增长和对于人类与自然的谨慎态度之间存在着基本矛盾。当时人们思考问题时实质上是强调矛盾的。对这种思想起关键作用的是对技术的反感和认为福利增长的消极的外部效果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压倒了仅仅是在量上增长的福利。”^①

当时人们确实是用把事情互相对立起来的方法思考问题的。他们甚至对技术抱有反感。那时是两极分化和揭露矛盾的时代。那时人们甚至被迫作出政治和政策方面的明确抉择。许多人认为，幸亏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对国内和国际的安全和安定的要求占主导地位。让我们尽可能地把矛盾掩盖起来，尽可能地使矛盾不带政治色彩。让我们尽可能少地对矛盾进行引导。这样，安定的局面就不会被破坏。杨·范奈伦^②很久以前就曾写道：“这个世界如此悲惨，让我们闭起双眼吧！”

在其他场合我曾解释过，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是人们向往改革的时期，此后，大约在1975年发生了一次转变，这是大家都不得不承认的。现在可以谈到的首先是巩固和停滞。我们有一切理由放开眼界观察未来，并弄清未来的威胁和前景。走向改革政策的最有希望的一个开端，是努力统一解决全球性的问

① 参看荷兰杂志《政治前景》1978年第4期。

② 1884年生，比利时弗拉芒语作家。——译者

题。这些观察未来的努力的成果之一是政府政策科学委员会题为《未来的二十五年》的报告^①。

虽然这个报告的特征是它有意或无意地有些局限性，但它还是一份有价值的考察报告。它所提出的难题是非常令人不安的。举几个例子来说吧！雇员们对他们的工作任务的内容所提出的要求将有所提高。只有大规模改变劳动的安排才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

现有的对社会的领导和管理制度正在失去其合法性。能否及时地采用新的制度是很成问题的。

在未来的头五年之中是否能够把失业人数压缩到十五万人和是否往后在服务部门能够创造足够的劳动岗位，是一件十分没有把握的事情。

在所需要的和所提供的各种工作之间，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差异。劳动力市场提供的劳动力的训练水平在提高，但是，受过某些训练的人材将得不到相应的工作。

没有足够的土地和空间，经济的增长不利于娱乐区域和农业地区。

能源消耗将不按照预计的需求增长。

经济发展将导致对自然和人类生活环境的越来越大的损坏。经济增长的幅度越大，这种损坏也将越大。人们将不可避免地被迫在要么进一步损坏环境，要么彻底地降低生活水平之间进行选择。

政府政策科学委员会对未来四分之一世纪的研究是以下述不同的对经济增长的假设为依据的。一种假设是年增长率为百分之三的经济增长；另一种假设是以到2000年逐步下降到零的

^① 政府政策科学委员会1977年第15号出版物。

增长率的经济增长。在国际范围的讨论中，人们也越来越强烈地提出关于可取的和可能的经济增长率的问题。

什么样的增长幅度是可取的，而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那么提出来的问题便是，这种增长幅度在政治上是否可行。未来的经济发展将在多大程度上仍然是可以控制和引导的呢？这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答复，对实现我以前的文章所主张的那种社会的可能性，具有决定性意义。那种社会的特征是收入、知识和权力分散了，人人平等，公民参加企业和政府的管理，权力的行使受到监督，妇女摆脱了二等公民地位而平等地参加社会交往，简言之，那是我始终仍然最喜欢称之为民主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

让社会朝这种方向发展的机会如何呢？

新的短缺

十年前，罗马俱乐部等机构提出了人类继续生存下去的起码条件。现在却已有人对工业原料的储备作出了更乐观得多的估计。因受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委托而最近进行的调查的结论是，“就可供利用的矿物而言，除了用作能源以外，我们可以说，事实上并不存在绝对或普遍的短缺”。“因此，人们基于关于世界的资源是有限的这一不可否认的、但往往太快地被当作普遍有效的观点而对自然资源枯竭所抱的严重忧虑态度，不应当对近期内的政治决策产生任何影响。”

但是，研究人员通过补充若干事实，使这项令人放心的结论具有相对意义。这些事实是：开发现存的储备首先需要花费大量能源，这恰恰是极为缺乏的东西；它其次意味着对环境的越来越大的损害；第三，它越来越碰到社会上的抵制；第四，由于每一

种仍可供利用的工业原料的开采地总是集中在四至五个国家中,对它的开发引起政治上十分紧张的局面。

能源的情况却有所不同。一般被人们认为是较为客观的“可供选择的若干能源战略方案研究小组”于1977年发表的调查报告的结论是,即使减少能源的消耗和大幅度提高石油价格,就在2000年以前,石油将供不应求。该小组认为,很可能在1985年到1995年之间就可以开始明显感觉到石油短缺;而另一部分人则认为1985年以前就已经可以感觉到石油的短缺。该小组的建议是进一步节约能源和制定大规模的计划来增加煤和原子能的供应,这些计划同时应考虑到太阳能大约在2000年和核聚变在二十一世纪内将会作出实质性贡献的可能性。

人口增长率在一些国家表现出下降的趋势,但它仍然高得令人吃惊。目前世界人口为四十四亿,而每年增加七千三百万人,这就是说,从今天到2000年增加的人口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人口的总和。只有在教育、知识和生存有一定保障的情况下,才能限制人口的增长,但这些保障的普及至今如此落后,以致不能打破恶性循环。

尽管在反对地面、水源和空气的污染的斗争中,损害自然环境的情况有部分改善,但这种损害自然环境的现象还继续存在。适合于农业的耕地开垦得过多,对世界上成片的热带雨林的毁坏现象在继续。

综观这种情况,在对待灾难的威胁方面,人们现在并没有多少理由不比最初致力于统一解决人类继续生存问题的许多人感到更忧虑。

尽管如此,在七十年代中期,所阐明的这个资源短缺的问题被放在一边了,但是这主要是1974年变得十分明显的世界经济萧条的结果。在这方面,原因和结果是互相交叉的。石油价格

在 1973 年上涨四倍,这是突然表现出来的根本性的资源短缺局面的结果。从石油价格上涨四倍这方面来说,它又成为加剧经济衰退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增长率的下降,还有能源消耗以及工业发展的下降又掩盖了供不应求的局势。

就业理所当然变成了核心问题,这是可以理解的。欧洲经济共同体有七百万失业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有一千七百万失业者,几乎没有希望恢复充分就业,这些就是七十年代中期的就业情况。这还不完全。政府政策科学委员会曾估计,在人口几乎不增加的情况下,我国额外增加的妇女劳动力供应量将于 2000 年达到约五十万人。更为重要的是对发展中国家失业人口的估计。有关国际机构估计为百分之三十四。1978 年初,牙买加总理曼利作了一个分类的估计:男人百分之二十五,青年百分之三十五,妇女百分之四十。单印度一国的失业人数已超过了一亿。为了认识同国家的不发达和高度发达有关的就业问题的巨大规模,需要这些数字。但是,不能脱离其他已经指出来的事态发展来看就业问题。

在这一点上,人们不能回避对长期支配工业化社会经济活动的标准进行批判性的重新估计。

经济的增长

西方世界至今或多或少地坚持了传统的经济增长率标准(哥本哈根最高级会议提出,1977 年增长率要达到百分之四点五;经济合作组织提出,增长率至少要达到百分之四点五,才能有减少失业的前景。为了努力达到稳定和持续的增长,人们举出了若干就其本身来说是有力的论据,进步人士低估这些论据的力量,是大家所熟知的事情。麦克来肯于 1977 年应经济合作

组织的要求提出的报告,更为明确地分析了所提出的这些论据。对于要达到百分之四到百分之五的经济增长率提出的论据是:第一,如果不达到这样的增长率,人们就无法说明怎样才能恢复充分的就业;第二,正是为了解决原料和能源的不足,需要有技术上的进步,而这种技术上的进步必然导致经济的增长;第三,如果没有这种增长率,就不可能有世界贸易的增加,发展中国家则将是世界进口的增长发生停滞的最大受害者;第四,经济增长的停滞局面将更进一步使富国提供的发展援助受到压力;第五,收入较低的人,特别是工人,将不会接受冻结其生活水平的做法。

我这篇评论的意图并不是要在某种程度上把这样带根本性的增长率问题探讨得水落石出。在我以前(1977年5月在埃因霍温)就增长率标准提出过那些看法以后,我不能对上述论证不加任何评论,其原因在于规定增长标准的做法在国际上的影响比国内的影响重要得多。

在经济增长很少的情况下,要实现充分就业,实际上需要一种不同于我们历史上熟悉的生产和消费模式。个人消费也必须是以减少劳动强度很大的生产过程和服务工作为目标。此外,增加商品的生产与就业之间的关系远不如以前那样密切了,因为在——大概是结构性的——利润减少的影响下,新的投资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用机器代替人的劳动。由于国际上的竞争,技术革新将仍然是需要的,但也是为了取代肮脏的和不舒适的工作,还因为人们不能否认,技术的发展可以导致节约原料的结果,请看看车床和电子产品的小型化吧!因此,技术革新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但同时伴随着它的是劳动时间或者劳动过程的一些部分被缩短。

拿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为持续增长进行论证是软弱无力的。通过这种合作获得短期效果是可以想象的,但是二十五年

发展合作的结果表明,在这一时期中,发展中国家反而更落后了,按人头平均的收入差别更大了,工业化国家对原料和能源的占有大大地增加了。尤其是南北关系中出现的僵局,迫使人们提出更大的增长率。

工业化国家中对冻结现有生活水平的反抗是很强烈的。在进行观察和比较的可能性更大了这种情况的影响下,低收入阶层和地区提出了提高生活水平的要求,这一方面的压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

因此,如果不大大缩小收入差别,降低增长标准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在工业化国家里,许多贫穷的地区要求平等权利。在经济共同体内,任何降低增长标准的主张,首先受到落后地区,比如爱尔兰、意大利南部、英国等的反对,因为在这些国家实际收入在降低。

各国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及其价值的看法是有天壤之别的。在接受有选择性的增长率标准的基础上,人们可以为各国设想各种不同的增长速度,例如,可以规定富国的增长率为百分之二;东方集团国家以及处于富国和这些东方集团国家之间的国家为百分之四;穷国为百分之六。但是,这种在办公室里制定出来的增长速度过于粗糙了,以致不能符合在这些国家里进行的围绕短缺的原料、就业以及军事和政治权力的斗争的政治现实。

由于在下定义上存在的不同看法和生态学家们不分青红皂白地坚持增长率为零的观点,关于经济增长的讨论十分困难。在经济增长方面,应当把包括基础设施在内的资本货物的生产、物质性消费品的生产和市场及政府都可以提供的服务这三个方面明确地区别开来。登厄伊尔内阁所采用的“有选择性的增长”这个概念致力于把资本货物的生产和基础设施的建设限制在就业

和或多或少地维持已经达到的生活水平所需要的范围内，同时也致力于根据其对社会的好处进一步扩大服务事业。这样一种经过认真考虑而提出来的增长概念必然导致重新制定生产和就业的方向，而且也将导致逐步稳定对稀少的原料和能源的占有，对此，几乎无须论述了。

作为东西方关系中的因素的经济增长

一项旨在避免灾难的政策决不能仅仅以使经济增长减慢或完全停止为主要目标。在世界关系中，美苏之间为争夺势力范围和划定经济与军事实力界线的斗争仍然是占支配地位的因素。那么，虽然生态学家们在美国已经有一定的发言权，虽然卡特也表示感觉到了，更多地应用各种形式的核能将引起某种巨大的危险；但是在苏联，至今仍看不出同样也很关心环境保护事业的人们对经济政策产生任何影响，这种旨在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在共产党世界里比起在西方更是实际的和意识形态上的主要目标。这种情况是很容易被人们理解的。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仍然不到美国的一半。因为相比之下苏联花在基础工业和军备上的费用更多，所以生活水平的差别就更大。

但是，因为苏联花在军备上的国民收入的百分比比美国大约多一点五到二倍，所以两国军备生产的规模是互相接近的。因此，从保持现在的“力量均势”角度来看，美国放慢自己的经济增长也就意味着美国要么必须把国民收入更大的部分用于军备，要么放弃所追求的力量均势。

从上述阐明的关系中得出的结论是，一项要避免灾难的政策必须进一步实现缓和，即东西方缓和。缓和意味着要培养相互之间的信任，互相了解对方的目标和疑虑，划清利益界线以及发

展具有共同利益的方面。这样去做并不意味着对人权保持沉默，而是坚定不移地通过在原料和能源、维护和管理海洋、环境和空间这几个方面的共同安排，使北约和华约国家日益增长的共同利益提出来和具体化。在过去几年中，苏联已建议在欧洲经济委员会的范围内就上述议题召开若干次联席会议。我从来不明白，西方为什么对此作出了如此胆颤心惊和躲躲闪闪的反应。

东方集团也承受了世界贸易停滞所带来的后果，东方集团的失业问题也越来越大。在当前的局势下，一种危险的诱惑是用扩大军备的办法来解决失业问题。大规模地向第三世界国家倾销战争物资的做法表明，这种过程已经在全面进行之中。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和苏联在提供战争物资方面是并驾齐驱的。1977年5月，北约决定在今后几年中每年以百分之三的实际增长率增加防务开支，由于北约各国目前的经济增长率非常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项决定也有令人感到恐惧的方面。

当前，世界国民生产总值(1975年约六万亿美元)的约百分之七，也就是大约四千亿美元，被用在军备上，这在现在和将来都是一种荒唐可笑的情况。美国武器质量上的优势几年以来似乎已被大大地赶上了。同时这就是实现军备控制和裁军的条件。最近十年来，重点已落到谈判战略(中欧均衡裁军谈判、战略武器谈判)上。正是在接近实现均衡的时候，不应当排除由单方面采取步骤的可能性。事实上，卡特推迟生产中子武器的决定是单方面采取步骤的重要例子，这一步骤的目的是减慢正在毫无减弱地继续进行的、直线上升的军备竞赛，即放慢新式武器体系的发展。战略武器谈判是缩减新武器体系费用这件对两个超级大国都有意义的事情所带来的结果。可以预料的原料和能源的继续短缺和涨价同样也有可能成为走向普遍的、有控制的裁军步骤的基础，这种裁军是六十年代初冷战结束时苏联和美国

达成的一致目标(麦克洛伊—佐林声明)。

在这篇文章里，我只能简单地提一提超过限度的武装的规模和影响、核武器的可怕的横向扩散以及裁军的必要性。在这几方面，我将致力于说明，从世界经济发展情况角度来看，限制军费开支的必要性将变得更加迫切。按照某种程度上的辩证说法，人们应当希望经济增长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权力都获得极大的发展，以致两个超级大国都没钱继续搞军备竞赛。

作为实力政策的因素的南北关系

这些机制的作用当然不象这里所描述的那样简单，但是，世界经济和就业问题不能离开东西方关系，东西方关系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南北关系。为了能够防止在石油供应方面依赖于可能受苏联控制的中东产油国，美国用建立国际能源代理局的办法回答了石油涨价和 1973 年的石油禁运。

法国关于举行南北对话的倡议的目的，是以财政和贸易上对发展中国家的让步换取石油供应和油价方面的保障。美国对石油危机的另一个答复是建议大规模地加速原子能的利用（基辛格在克利夫兰的讲话）。卡特政府对原子能的利用强调得少多了，它坚持扩大常规反应堆，但开展了反对更加先进的核技术、加工工厂以及快速增殖反应堆的运动。这一运动还没有结束。

德国和法国扮演了扩大核能的最积极的拥护者角色。如果注意到它们在能源供应上几乎完全依赖于从第三国，特别是中东国家的进口，那末它们之所以要这样做的原因就很清楚了。在这个问题上，联邦共和国的处境无法同超级大国的处境相提并论。无论美国还是苏联的石油和天然气的生产都占世界生产(和储备)的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在石油和天然气涨价以及在日益

严重的能源短缺的后果面前，德国和日本（法国和英国比它们好一些）比美苏无可比拟地脆弱得多。它们强调增加补偿性经济与此有密切的关系。

两个超级大国同次一级大国在原料方面的利益和出发点的差别也是后者对于破坏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收入和原料价格的稳定性持反对态度的原因。在绝大多数原料方面，北美和苏联是共同的获利者和受益者。

因此，特别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过去几年越来越强调应让东方集团参加各种形式的发展援助，这是正确的和可以理解的。众所周知，至今除了对古巴、越南和埃塞俄比亚这几个应“集中援助”的国家以外，对东欧国家的援助是最少的。这里，又起重要作用的是西方担心经济力量平衡将受到破坏。

因此，不能把对增长标准的估计同维持军事和经济权力的分配这一占主导地位的努力分割开来。经济增长政策同防御努力的关系也非常密切。日本的国防开支只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一，绝大多数北约国家的开支只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三左右，而美国的是百分之六。从经济平衡的观点来看，如果在发展援助的规模方面，日本是名列前茅的话，这并不是不合理的。目前的情况决非如此，尽管日本的两个社会党都主张增加发展援助。

1978年春在达喀尔举行的社会党国际会议上，普隆克从根本上阐明了，在迎接第三个十年发展阶段时，重新制定发展战略的标准是必要的。这种重新制定标准的重要内容是对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重新下定义。过去几年中，情况有时似乎表明，西方可以从经济上摆脱第三世界而成立一个实际上是自己的封闭的繁荣体系。石油危机结束了这种虽然从未被明确地说出来但已被付诸实践的观念。交换比例将朝着有利于原料生产国的方向移动。如果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不能更迅速地

增长,世界贸易就不能恢复。

1975年联大特别会议已经决定建立的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必须建立起来,尽管实现这一决定所需要的时间将会比预计的要长。2000年应当成为我们的目标。这里也需要发展中国家对自力更生的意义和结构改革有新的认识。不应当作出会使整个国际贸易自由化的选择,而应当作出有利于有计划、有目的地增加贸易的选择。

事实表明,关于普遍促进经济增长将导致财富会一点一滴地转到穷苦人那里去的思想是软弱无力的。在工业化国家的内部结构和发展合作的效能之间存在着难以否认的联系。只有通过采取有选择性的经济增长政策和有意改变这些国家的消费习惯的结构,才能够避免这些国家把失业转嫁到发展中国家的身上。只有从把公正分配劳动和收入放在中心位置的西方结构出发,才能通过制定出一项正确的政策,防止剥削性的结构在发展中国家本身重新出现。

未来几十年的选择

目前有强大的力量致力于减少经济增长。它们主张缓建大规模的工程项目,而这样做的原因是保护环境、消费方面的饱和状态、经济从工业向服务行业的转移以及原料和能源成本的提高。因此,问题主要不在于我们是否停留在一个较低的增长水平上,而主要在于我们究竟是通过明确的整顿过程,还是通过混乱和不受领导的过程,来建立一种其增长是缓慢的和有选择性的经济制度。选择第一条道路的人必须接受一系列的后果。

这是统一解决我所简述的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案,它开辟了走向制定全世界计划的道路。这样做便要同自由市场经济具有

决定性作用的信念决裂，同时却没有抛弃价格机制的作用。

政府政策科学委员会估计，到2000年能源的价格实际上将上涨两倍。对同一种货币来说，它甚至很可能涨价三倍。政府政策科学委员会预计，能源的短缺将导致交换比例严重恶化，以致这方面的效果相当于百分之八的发展援助。政府政策科学委员会所调查的增长率为零和百分之三的两个方案在消费水平方面的结果没有多大的差别。同以前几十年的情况相比，消费水平的提高（或降低）不可比拟得少得多。更公平的劳动分工、收入分配、知识普及和权力分散，这就是直到2000年的收入政策。再说一遍，要实现这一切，要么为保持既得利益、既得地位和已经受到威胁的特权进行艰巨的斗争，要么明确选择有利于国内外最脆弱的人的立场。

这不是反对继续进行技术革新的选择，但它确实主张根据技术发明对劳动组织和消费格局的价值，来对它们的运用制定方向、进行试验和加强引导。

这是两个抉择之间的选择：要么让事态发展向自己冲过来，并因为它导致失望、反抗和剧烈的冲突而证明它是灾难性的，要么把社会引导到走向其中劳动者有更多的实现自己愿望的机会和自治已成为社会组织占支配地位的特点的另一种社会生活形式。

杨·罗麦因^①于二十五年以前在《人类的普遍模式》一书中提到了以对进步的无限信仰为基础的、独一无二的、极其特殊的西方的扩张，特别是工业革命的扩张。最近，其他人，在我国特别是哥德兹瓦尔特，主张同对进步的信仰一刀两断，^②这一信仰

^① 荷兰历史学家。——译者

^② 见哥德兹瓦尔特：《资本主义与进步——对当代社会的批判》，1976年，阿姆斯特丹。

一直支配着西方的发展，现在有些人主张建立另一种文化并发展对立文化，这些主张虽然论据不同，但都是互相有联系的。这种思想的许多东西同在社会主义思想中起过巨大作用的想法和见解有各种联系。最本质的是关于人同自己劳动产品和合作者相“异化”的思想，马克思把这种“异化”看作是对资本主义性质起决定作用的东西。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中，战胜“异化”的努力并非始终处于中心位置，但是，根据一个世纪来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情况这一背景，人们有理由把今后二十五年的任务描绘成对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改造，以克服资本主义的这种基本特性。

围绕世界经济危机而表现出来的明显倾向意味着，社会福利国家的基础是成问题的，它需要改革。这就是说要改变我们关于劳动、消费和生活方式的概念。对于以改革为目标的战略来说，获得政权是决定性的。

实行改革的权力

我坚持认为，不管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所承担的责任多重，所受的歪曲多大，它无论在提出目标或在组织政治力量方面仍然是唯一有意义的中心。长期以来，只不过是一个信箱的社会党国际在维利·勃兰特的领导下正在从事加强和重新确定方针的工作，这项工作已经展示了美好的前景。社会党国际有计划地抓了上述结构问题。它已经摆脱了似乎长期禁锢着它的欧洲中心论思想。在拉丁美洲、非洲以及在亚洲（在亚洲比在美洲和非洲差一些），它作为反对军事独裁和资本主义政权的力量集结点正在成为一支重要力量。它在严肃认真地对待缓和和寻求同东欧的接触的情况下，明确地反对共产主义的和极权主义的政权

和意识形态。通过这种活动方式，它创造了在国际机构，特别是在经济共同体和联合国内部建立横向联系的可能性。事实将可能表明，在争取改革世界经济、缓和和裁军的斗争中，这些横向联系将越来越重要。

在这些斗争中，欧洲经济共同体具有特殊的意义。在共同体这个由许多力量组成的活动场所，荷兰可以发挥超过国家大小比例的影响，在这里，人们不断地讨论着以引导社会为目标的政策。荷兰工党因此也就正确地选择了积极的欧洲政策。然而，它也说明了这项政策是有条件的政策。对此有人产生了误解。如果这项政策的条件意味着只能同社会主义的欧洲合作，这些条件就是愚蠢的。然而，这里确实还存在一个现实的问题。同欧洲煤钢联营条约相反，罗马条约的基础是主张货物、资本和人员交流的自由化，但同时并不要求通过条约规定用适当的政策手段来调整共同体内的经济事务。因此，有人怀疑，共同市场选择了自由市场经济，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该条约并没有排除建立一整套办事机构，实际情况与此正好相反。因此，工党致力于防止使各国的调节机构名存实亡，并且致力于只以受民主监督的欧洲权力机关来取代这些国家的行政管理机构，这些做法都是正确的。

从政治上说，事实表明，对于促进劳动分工和消除保护主义，欧洲经济共同体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必不可少的机构。而德国的被统一于欧洲的意义更加重大。因为这种统一的意义如此重大，所以致力于缓和和调整经济的社会党应当竭尽全力参加制定欧洲政策的工作。

在今后的几年中，荷兰对国际政治的贡献特别应当体现在欧洲关系上，尽管这样说并不排除在欧洲以外的贡献，例如象1973年至1977年期间的情况所表明的那样。当时荷兰在争取人

权的斗争（例如反对希腊和智利军人政权的斗争以及在赫尔辛基欧安会上的斗争）、争取把核武器问题纳入中欧均衡裁军谈判的斗争和对敏感核技术进行足够有效的监督的倡议几个方面提出了政治建议；荷兰还提出了发展援助的结构和标准方面的政治建议，这些建议的意义在于它们曾经为在已僵化的阵线中打开缺口的艰难过程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

各个政党都面临着抉择

我国是否会在本文所说的重新确定社会的方向的斗争中作出什么有意义的贡献，取决于政府的形式和各个政党的活动。自由党人士和天主教民主党人士在国际上的立场更明确了，这一点本身是令人高兴的。欧洲选举是对他们的一个很好的激励。

把社会党人说成是唯一掌握实现所必需的改革的正确思想和战略的人是愚蠢的。正如在德国和英国那样，在欧洲议会里，社会党人多半将同自由党人相处得好一些，同天主教民主党人和保守党人相处得却不会那么好。在法国，天主教民主党人在党派政治上基本上都加入了自由主义的和保守的政党。德国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奥地利的人民党已经同英国的保守派和法国的戴高乐派一起在欧洲民主联盟中联合起来，该联盟具有清一色的欧洲保守主义思想。众所周知，德国的自由民主党和英国的自由党人同荷兰、比利时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的自由党是相当有差别的。我在五十年代末所作的一个评论中曾试图说明，荷兰自由党人和天主教民主党人在历史上曾经有过某些一致的思想。总的说来，在对待正在被暴露出来的社会问题的态度上，自由党人和天主教民主党人是互相接近的。这种情况导致了两党人员可以互相替换的情况。荷兰自由民主人民党和基督教民主

联盟的选民也很少象近年来这样大量地互相转换选择。

在工党内部出现了关于同基督教民主联盟和自由民主人民党共同组织联合政府的利弊问题的讨论一事，也可以由这种可以互相转换人员的情况得到解释。基督教民主联盟在政治实践中暂时还在急于使自己的形象有别于自由民主人民党。这种努力的结果将为在荷兰如何才能使多数人拥护进步的政策这一悬而未决问题提供有意义的答案。目前的情况还不能说明社会党人和进步民主主义者能够在不同中间派或甚至不同比他们更右的人组织联合政府的情况下，在我国执政。正如在1977年的组阁过程中的情况那样，工党将一再地被迫为建设未来而进行选择，它要么组织联合政府，并因此面临丧失自己特征的危险；要么坚持进行反对派活动，并由此明确保持自己特征。

这个关于必须作出的选择的问题，一向只能根据具体局势给予答复。然而，所涉及到的利益越大，错误政策或者缺乏政策的情况的后果也就越是灾难性的，那么，所需要的政策的可认识性也就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简单地说，正是因为目前和未来几年的决定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工党是执政党一事具有最重大的意义。正是由于所要作出的决定的性质，工党对将要执行的政策必须提出的条件是苛刻的，这也是事实。

在民主制度中，只有当政治受到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推动和支持，政治才能够发挥作用。战后不久，为了能组织力量以便实现社会对核能的监督，我曾呼吁要依靠“普通人、工人、教授、工厂主的革命”。毫无疑问，不应当使在六十年代出现的社会积极性丧失掉。对未来时期最危险的威胁是专家治国论者和尚未被人们认识的力量占据主导地位。如果公民们确实相信官僚主义，而在实际上放弃了用斗争和努力换来的权利的话，那么官僚主义机构也就变成了空架子。

六十年代初，民主尤其受到大量存在的麻木不仁思想和对发言权、对政治本身的不信任的威胁。经过冲突和冲击，各个政党已从当时的创伤中恢复了过来。

在我国和其他地方，主要威胁着我们的事情不是有人把政治往保守主义或者资本主义方向引导，而是根本没有人来引导；是缺乏方向和见解；是不讲政治；是无法驾驭的局面的出现；是不再把社会上的紧张关系看成政治矛盾；是在哄骗人的誓言掩盖下，使人们丧失政治意志而麻痹起来的情况。

对未来作出明确的抉择和尽可能地作出所作的抉择获得支持和力量，这乃是民主的社会党人的任务，不管改革的幅度很大还是很小，都是这样的。只有这样，对形势的认识才能导致对未来的展望。